万卷方法 | 社会测量与评估方法译丛

社会评估：
理论、过程与技术

SOCIAL ASSESSMENT:
THEORY, PROCESS AND TECHNIQUES

C. 尼古拉斯·泰勒（C. Nicholas Taylor）
C. 霍布森·布莱恩（C. Hobson Bryan）著
科林·G.古德里奇（Colin G. Goodrich）
葛道顺 译



SHEHUI PINGGU LILUN GUOCHENG YU JISHU

■ 本书开始于对社会评估历史性背景的回顾和检讨，特别讨论了社会评估存在的一般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解决的新视角——提倡向一种新的、结果导向的方法转型，关注社会评估实践者及其行动的典型工作环境。

■ 随后讨论了社会评估的过程，包括适宜的制度性安排和支撑该过程的能力。接着，作者介绍了社会评估所需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并讨论了收集社会资料的多种技术，包括二手资料、社会测量资料，以及经济影响资料等。最后，结合案例研究，讨论了作为结果取向方法基本原则的定性分析和咨询技术。

发表及参阅相关讨论，请登录：

万卷方法与学术规范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ISBN 978-7-5624-4975-1

9 787562 449751 >

定价：28.00元

万卷方法 | 社会测量与评估方法译丛

社会评估：
理论、过程与技术

SOCIAL ASSESSMENT:
THEORY,PROCESS AND TECHNIQUES

C. 尼古拉斯·泰勒（C. Nicholas Taylor）
C. 霍布森·布莱恩（C. Hobson Bryan）著
科林·G.古德里奇（Colin G. Goodrich）
葛道顺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7)第61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美)泰勒(Taylor, C. N.),(美)布莱恩(Bryan, C. H.),(美)古德里奇(Goodrich, C. J.)著;葛道顺,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7

(万卷方法.社会测量与评估方法译丛)

书名原文:Social Assessment: Theory, Process and Techniques

ISBN 978-7-5624-4975-1

Ⅰ.社… Ⅱ.①泰…②布…③古…④葛… Ⅲ.社会工作—评估—研究 Ⅳ.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3475号

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

C.尼古拉斯·泰勒
C.霍布森·布莱恩 著
科林·G.古德里奇
葛道顺 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罗 杉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7.25 字数:187千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975-1 定价:28.00元

作者简介

C. 尼古拉斯·泰勒(C. Nicholas Taylor),新西兰坎特伯雷市泰勒贝恩斯及伙伴机构(Taylor Baines and Associates)的主任和负责人;曾担任过林肯大学资源管理中心的高级研究官员。他是众多资源管理领域做研究、咨询和培训的领军人物。

C. 霍布森·布莱恩(C. Hobson Bryan),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地理系教授;曾是美国林务局社会影响评估的项目领导人,新西兰福布莱特(Fuibright)高级研究员,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前主席。

科林·G. 古德里奇(Colin G. Goodrich),坎特伯雷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前系主任;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务长。他教授的课程包括环境社会学、社会评估和研究方法。他的研究兴趣覆盖了社会评估实践、能源发展和环境政策等领域。

前 言

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评估方法和技术发展的兴趣持续增大。世界各地正在遵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努力化解自然资源基础正在遭受的不断增大的压力,对政策和工程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估和管理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本书第 3 版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以及世界各地同行的网络工作的经验基础之上,回应了这一不断扩大的重要领域发展专门技术和能力的需要。本书初版于 1990 年,再版于 1995 年。第 2 版吸收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材料,通篇重新编辑。该书第 3 版发行于 2004 年,在第 2 版的基础上再次修订和编辑。

初版仅以新西兰社会评估的背景和经验为主线,但内容具有更大范围的应用价值。现在,社会评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发展成为跨文化的世界性实践和教学的知识平台,这个平台融合了新西兰、北美、澳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岛屿国家的经验。

在本书中,我们采用的概念是“社会评估(social assessment)”,而不是“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旨在克服术语“影响(impact)”常常隐含的消极寓意。“社会影响评估”过多地被当作一种聚焦于负面社会效果的行动,因此,无形中阻碍了对结构性变化的关注。

在许多场合,我们用更加一般性的术语“效应(effect)”替代术语“影响(impact)”以强调我们的观点,即社会评估不仅能够包容那些显性的变迁,而且能够包容那些细微的变异。术语“效应”的使用因此意味着评估方法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而不仅仅是格式化的环境报告或者审计程序。社会评估不仅对公共政策和管理变化的传统性评估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其进行了补充,尤其是对经

济性和生物—物理性评估而言。它在推动预期性和参与性规划领域具有很大潜力,有助于对变迁进行管理以追求其对社会长期发展的最佳效果。

第3版正文以对社会评估历史背景的回顾和检讨开始,对其显现出来的一般问题以及为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所提出的新视角进行了描述。第2章继续围绕这种新的评估思路和方法的规制和前景,对社会评估领域的从业者的一般倾向及对其有影响的主要工作环境进行了讨论,主张向一种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issues-oriented approach)转型,以后各章是详细论述。第3章介绍了从环境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理论创新成果汲取并发展的关于新方法的基本假设,并进一步提出了理论框架。第4章讨论了社会评估的过程,包括适宜的制度性安排和支撑该过程的能力。第5章介绍了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用于社会评估所需资料的收集和处理。随后讨论了收集社会评估资料的多种技术,包括第6章的二手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以及第7章的经济影响资料。最后,第8章讨论了作为问题导向方法基本原则的定性分析和咨询技术。为便于阐述,各章都使用了简短研究案例。

我们的社会评估经验覆盖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项目,包括大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农村和农业发展计划、社区需求发展评估以及自然资源和经济政策评价等。研究生的社会评估课程于1983年在坎特伯雷大学开设,1984年在阿拉巴马大学开设,并延续至今。参加课程的学生来自资源管理、社会学、地理学和其他多个学科。社会评估课程教学为本书建构素材提供了许多机会。

本书的素材同样得益于作者参与的由坎特伯雷大学、林肯学院(现林肯大学)、国际影响评估协会、美国林务局、澳大利亚环境研究所、社会影响评估机构(西澳大利亚)、伊迪丝科文大学(珀斯)和南部非洲发展银行主办及资助的具有领先水平的社会评估在职课程培训。

我们很感谢那些学生和课程的参与者为社会评估实践所付出的扩展性努力。对学生、课程参与者和委托人不断承诺将自己的思考汇聚成文,给我们在面对其他工作义务以及国际合作限制的同时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并修订了两次,提供了莫大的激励。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本书作者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感谢富布莱特基金会1984年给布莱恩博士和1986年给泰勒博士的资

助;感谢林肯大学资源管理中心、坎特伯雷大学社会学系、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系以及泰勒贝恩斯和伙伴机构等给予的制度性支持。这些组织和机构的职员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帮助。

第1版由林肯大学资源管理中心出版。最初的工作得到了来自新西兰政府环境部的财政赞助,同时还有来自汤姆·佛克斯博士的私人资助。在第2版中,有关链接生物-物理和社会变量的新材料从布莱恩博士为美国林务局设计的国家培训项目中提炼而来。我们对美国林务局提供这样的帮助心存感激。有关软系统方法的材料得益于同朱莉·沃伦的合作,该项目得到了新西兰科学技术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另外,新西兰社会影响评估工作小组和1990年以来新西兰社会评估协会即现在的新西兰影响评估协会的众多成员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鼓励。我们特别向评阅了第1版的朱莉·沃伦和玛丽·简·瑞福斯,以及随后的杰米·纽厄尔,迪·巴肯和其他众人致谢。同样地,我们和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及其社会影响评估(SIA)部门的联系也带来了诸多很有见解的帮助。我们还要格外提及拉贝尔·博尔杰、弗兰克·范克里和詹姆斯·贝恩斯的领导和协调。博尔杰博士对我们启动该项目有不少支持,以及南·菲尔德负责第3版的付印,在此一并谢过。

我们感谢杰拉德·菲茨杰拉德的热心支持和创造性的贡献,以及杰夫·克尔和鲁思·霍顿愿意纳入自己的材料成为第6章、第7章和第8章的联合作者。我们还要感谢资源管理中心的特蕾西·威廉姆斯女士在承担第1版编辑工作时给予的无价的帮助,以及她的尽责和鼓励。茜拉·泰勒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并对第3版作出了评论。埃里克·泰勒自始至终帮助我们,他负责第2版和第3版出版的准备工作,包括提供了制图及其他技术支持。

目录

第1章
社会评估:一种批判性的评价方法

Social Assess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社会评估(social assessment)为研究、计划和管理由政策和工程实施而产生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方法。该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们认为:社会评估是一种用来“分析和管理预期和非预期后果”的方法,这种后果产生于政策或工程的实践(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1998; Vanclay, 2002: 387)。

社会评估运用社会分析、监测和公共卷入(public involvement)方法记录和管理社会效应,关注的焦点是受变迁影响的个人、群体、社区和社会部门。社会评估在国际上被确认为环境评估程序与决策,以及工程、项目和政策规划与执行的重要内容(Burdge, 1985, 1998),广泛应用于国际发展机构、政府组织、发展商、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群体的实践行动,对改善决策、推动形成更加可持续的社会和环境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社会评估并不总是带来对社会负责任的结果,因此,这一章还将讨论社会评估方法特有的(endemic)问题,以及实践者克服这些困难所需要的重要潜能。在以后的各章中,对这一潜能的探讨不断扩展和深入,从而详细说明目前被广泛实践的一种前瞻性的思路。

本章的目的是重点描述社会评估的几个历史转折点(turning points),并对该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批评性概述,其中表现的跨文化和历史视角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社会评估实践有效的社会评估现实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制约。关注点是全球性的,但讨论的重点集中在美国和新西兰。

历史背景

起 源

社会评估领域的最初确立通常追踪到美国及其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圣塔芭芭拉石油泄漏事件是促使NEPA法出台的一个主要动因。正如当时的一些社会评论家所言,富裕的美国人面对了来自环境的直接羞辱——黑色的、黏稠的石油侵占了他们昔日纯净的海滨。不管这是否是决定性因素,国家环境政策法在石油泄漏事件之后很快发布了。该法律要求联邦机构采用系统的和多学科的方法,保证在环境设计以及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计划决策中兼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规制。至少从数据显示来看,该法的成效是显著的。在NEPA实施后的第一个10年中,近12 000个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s)被执行。大约1 200件诉讼对评估提出了质疑(Freudenberg and Keating, 1982: 72)。

社会层面内容虽然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中有具体指定,但在早期的评估中很少涉及。虽然很难断言某一特定工程项目的批准、放弃或者调整的决策取决于社会评估的基础,但是许多决策还是受到了社会因素认知的影响,只不过方式比较微妙和间接(Freudenburg,1986)。

新西兰1973年的(1981年修订)环境保护和改善法的推动力来自诸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抬高玛纳普利湖(Lake Manapouri)以建设水电站等一系列提议方案的大论战。玛纳普利湖工程案例和圣塔芭芭拉石油泄漏事件存在有趣的类似之处,二者都导致了大范围的公众意见纷争并引发了正式环境评估的需求。新西兰的环境评估程序源自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并与之有相似之处,但缺少立法支持。

在新西兰,环境委员会是监理环境保护相关程序并向政府报告执行效果的中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审计(检查)环境影

响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s)。不过,因为没有立法授权,委员会作用的发挥一般取决于政府的兴致。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环境评估的最初 10 年见证了将社会层面因素包容到评估过程的困惑,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迟迟没有给出社会层面的定义(Freudenburg and Keating, 1982)。但是在社会层面因素的内涵被确认以后,社会因素的分析依然常常被遗漏。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环境后果评估有时只被认为是经济分析问题,而无益于优化政治判断,或者完全无助于传递一个有价值的管理建议。

经济分析常常取代社会分析,并且这种状况在继续。这种取代可以理解,因为经济学研究围绕结构性选择而建立,其数量化特性使得经济学更能满足决策者的直接应用需求。当经济分析真正进入到了社会领域,其数据调查的焦点往往集中于人口变迁、可计量的发展效果、用工的资源管理决策,以及社区服务的需求等方面。

因为不是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明确要求,公共参与在社会评估中有时处于尴尬状态。公共参与的过程一般非常有限,而且常常只是简单提供呈递建议或者出席正式听证会(formal hearings)的机会。不能将早期的这种公共参与的形式与本书倡导的社会评估的咨询程序相混淆,即使某些社会影响的确认是出自旨在促进公共参与的无经验的尝试。

一些计划制定者和决策制定者宁可认为"抽象(abstract)"的未来不能用任何准确度量的方式进行预测,而不是利用社会评估对备选方案的社会效应进行估计。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将受影响的人群纳入他们自己的未来设计之中。毫不奇怪,这种策略既不为面临各种各样发展选择限制的项目经理们所接受,也未必履行法律上的要求,尽管某些情况下公众卷入决策过程的程度比以前更加广泛。

相反地,一方面是社会分析过少,甚至缺乏,另一方面社会分析过多的问题也存在。这种情况常见于学者们接受协议委托而完成的工作。如根据记忆中一贯的社区研究模式,学者们的研究倾向对讨论中的社区或地区做冗长的社会概述,而对社

区实际问题的聚焦和对可能出现的社会效应的估测很是缺乏。然而,这一类研究常常需要为随后的、更加细致的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在新西兰,有一个早期的社会评估研究获得了国际赞誉,这就是亨特利热电站大型工程影响的监测(Fookes et al., 1981)。该研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许多计划者、开发者和其他卷入影响评估和治理的实践者视作一项学术性活动。开发者们由此产生的对社会评估的质疑阻碍了他们对监测工作的进一步资助和制度性支持。另外,尽管一些结论有益于工程将来的进一步规划,但由于已经收集的大量实际数据没有充分利用,效果的评估并不很全面。例如,人们发现亨特利镇的快速增长受到了限制,因为劳动力准备需要从相当远的更大的人口中心通勤而来。这种劳动力补充方式现在已经为工程规划所广泛使用。而且,在社会监测工作之外,一种社会评估的程序也发展起来,包括社区层面适当的资料收集、问题鉴定和影响治理的对策。亨特利研究为新西兰随后的社会评估进入俗称的"快速增长(rapid growth)"创造了条件。这一研究的意义可以和关于社区影响的研究相媲美,社区影响的研究为北美的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owles, 1981)。

整 困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自然资源规划机构开始采用改进的程序或者不同程度上采用特定的社会评估方法来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并不总是完美无缺,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CEQ)对国家环境政策法实施9年期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价(CEQ, 1978),总结如下:

- 环境评估没有按照统一的方式执行。
- 很多评估报告的技术语言晦涩难懂,公众难以理解和作出反应。
- 一些环境评估的文件被束之高阁,并没有成为优化决策

的依据。

- 环境评估文件存在不加区别地讨论与提案有关的所有环境因素的倾向,而不是集中讨论其中的重大问题。
- 相应的存在过度的文书工作、无节制的拖延和大量的重复劳动。

在该评价的推动下,环境评估开始强调预备性调查,把注意力集中到重大影响,注意把文件起草得更简短并更具有分析性,而不是百科全书式(Hill, 1981)。换句话说,评估的焦点转向了分析。

美国林务局提供了一个政府机构社会评估重点和策略转移的案例。林务局一直苦恼于一个臆断,那就是社会评估意味着在其运作方案中采用很长的变量"细目清单(laundry lists)"。有此顾虑的并非林务局一家,其他资源性组织也有同样的想法。美国林务局对林业服务政策在原则上做了以下调整(Bryan and Hendee, 1983):

- 焦点应当限制于定位(scoping)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利害关系。
- 社会效应应当通过分析方法而不是百科全书式的方式来探究,分析变量包括以下四大类:生活方式,态度、信仰、价值观,社会组织和人口/土地用途。
- 如需收集新的资料,必须首先利用现有全部资料。应当建立这样的理念:不是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而是根据手中任务的必要性收集尽可能少的资料。
- 必须明确认识到社会效应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这取决于考量它们的背景。
- 应当同时兼顾直接和间接效果。
- 没有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或途径是万能的,应当认识到社会分析需要根据不同种类的影响预期采用不同的方法或途径。
- 评估范围应当根据待评估的行为及其需要调查的影响面确定。

- 社会效应的报告样式由调查发现结果决定,如果评估小组认为社会效应具有特别意义,那么一个独立的社会评估报告应当保证。否则,可以将其并入评估报告的其他部分。
- 必须认识到单个的社会效应有时可能很微小且难以精确解释,但是所有社会效应的累加可能十分巨大。因此,累加效应评估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环境评估过程重点的转移在新西兰同样明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能源开发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得到了政府的推进,但引起了有影响力的环境保护组织的口诛和反对。一个"快速跟进(fast track)"的立法,即新西兰国家开发法案(NDA)于 1979 年发布,并在 1981 年修订。该法案的目的是化解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群体的牵制战术,他们反对发展议案,特别是那些"大工业(Think Big)"战略①中的发展项目。

尽管国家开发法案(NDA)为社会效应的考量提供了立法支持,但是这种快速跟进立法的缺陷很快暴露出来。一个显著的案例来自本土居民受到的影响。获悉将在塔拉纳基建造一个大型综合燃料工厂后,当地毛利人觉得受到了不恰当的对待。随后,毛利人组织提出了许多关于海洋口废水排放工程将导致他们传统海洋食品资源污染的问题。

政府试图不顾及"大工业"战略项目社会效应的重要性,而是首先考虑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利益论证——这种论证不需要经全面而细致的审查通过。但是,考虑到"大工业"项目社会效应的经验,结合对北美社会评估发展的认识,新西兰环境报告中的社会影响部分的重要性和认可性逐步增强。环境委员

①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总理任期:1975—1984)和他的新西兰国家党(New Zealand National Party)政府在 1980 年代早期发起了干预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工业(Think Big)战略。政府向国外大量借贷,对外赤字剧增,并将这些资金投入大型工业项目,石化和能源等相关项目大量出现,计划利用新西兰丰富的天然气生产氨水、尿素化肥、甲醇和汽油。政府内阁大臣艾伦·海特(Allan Highet)在 1977 年国家党会议的一次演讲中首次将其称为"大工业(Think Big)"。http://www.answers.com/think big. ——译者注

会的审计开始加强对社会层面的影响评估,环境影响报告也更加严肃地对待社会效应问题。

当重点能源工程在大工业战略中开始实施,它们非常现实的社会影响就成为建立进一步社会评估程序所关注的主要焦点。工程给这一地区带来了许多影响,如房屋供给和社会服务,以及那些已经列入监测研究内容的问题。另外,通过比较可以得出海洋能源工程和陆地工程的相似性,并可以从中得出且为将来的规划提供进一步的建议(Taylor and McClintock, 1984)。在初步规划工作中,从以前片面强调关于项目发展消极态度的社区剖面分析(community profiling),转变为将社会评估看作项目规划的参与机会。社会监测显示在快速变迁的整个时期都需要持续评估,但要保证将公共参与和社区发展纳入其中。

1984 年工党政府执政以后,环境事务部门的角色彻底改变。事实上,上一届政府的缺陷可以从它采取的软弱的环境保护立场,特别是环境委员会的作用中略见一斑。

在新成立的全国社会影响评估工作组及其网络的努力下,环境管理组织变化后的评估程序有了进一步的改进。评估工作组由中央不同政府部门有关社会政策和社会影响研究的专职人员、地方特别是重点工程所在地政府的社会规划人员、学者及卷入社区发展的其他相关者共同组成。工作组首先精选了评估的有效原则,在 1985 年出版并广泛发行了《社会影响评估:新西兰的实践》一书。工作组完成的第二个工作是网络建设和信息整理。工作组思考的其他相关议题还包括工业重组中的工厂关闭、新“自由市场(free-market)”经济政策带来的农村社区变迁,以及在相关工作场所引导使用计算机新技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工党政府着手解决各种批评所指出的环境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考虑资源管理立法和重组中央政府机构的主张。这期间,社会影响评估工作组处于有利地位,它呼吁更多地关注社会领域,而不仅仅强调预期中的生物-物理性空间和经济利益。工作组提出了一个整合的视角,即现实中呈现的经济变迁同样是社会变迁,以及只要社会效应可能

出现,就必须对政策和工程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SIA Working Group, 1988)。

社会影响评估工作组对资源管理立法改革和资源管理清单草稿(the Draft Resource Management Bill)投注了积极热情。工作组赞成清单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强制性的影响评估要求、强制性的监测和广泛的公共参与,其中大部分列入了资源管理法(1991)的规制,下文会展开讨论。

同时在澳大利亚,紧步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后尘,社会评估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澳大利亚积极发展适合本国特点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和原住民的合作(Cowell et al., 2001)。根据威尔德曼和巴克(Wildman and Barker, 1985)的论述,澳大利亚社会评估的制度性基础是通过对环境评估的强制而实现的。因为各州及联邦的具体要求不尽相同,评估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新西兰相似,社会评估的立法支持一直处于考虑之中,如南澳大利亚等州试图通过关于社会评估的立法和行政指令对评估方法进行更新和澄清,以适应扩大的公众参与(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1989)。威尔德曼强调了改进程序和方法以支持立法授权的必要性。为保证社会评估对政策和工程规划以及变迁管理产生实际贡献,需要关注社会问题并改善社区卷入的技术。威尔德曼和巴克的一本手册以及欣德马什(Hindmarsh,1988)的有关论文都提供了改进的基本方法。另外,西澳大利亚拥有重要的创新,它成立的社会影响评估机构是世界上首批独立的社会评估机构之一。

1991年,新西兰资源管理法案的通过以及对地区和地方政府大范围的重构标志着社会评估整固阶段的结束。这些变迁推动了社会评估实践的转向。该法案包括广泛的强制性的影响评估,对“社会(social)”和“文化(cultural)”效应进行了定义,对社区咨询和公共参与做了明确要求,并且规定一旦变迁开始,就必须监测效应。新的立法也强调了适应性,通过赋予区域和行政区议会、部落权利机构、利益及社区团体相应责任,在不断形成的共同基础上促进社会评估的需求。

案例研究 1.1

新西兰资源管理法案(1991)

该法案是环境立法中的创新之举，因为它促进了自然和物理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为了推动这一思路的实施，该法案整合了陆地、空中和水中资源的管理。在法案的表述中，环境被视作一个整体。在当局规划和制定决策时，其决策焦点必须遵循这一原则。该法案是陆地、水、土壤资源、海岸线和空气管理以及污染和噪音控制的主要法律。每一个公民、领地或者区域当局和中央政府都被赋予了相应的权利和责任。法案确定了一套关于政策及规划的准备和管理系统，用来平衡广泛的利益和价值诉求。

作为对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 年报告的响应，该法案旨在通过认识自然和物理环境与社会和经济环境这两方面的联系，寻求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保持后代对环境的选择余地。法案中的三个关键定义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它们是"可持续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环境(environment)"和"效应(effect)"。

可持续管理是"……以某种方式对自然和物理资源的使用、开发和保护进行管理，或者以一定的速率开发资源，使人类和社区能够为自身提供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福利；同时，为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还应当做到：(a)维持自然和物理资源(不包括矿产)的储备以满足后代可预知的合理需求；(b)保护空气、水、土壤和生态系统等生命支持的能力；(c)避免、修复和治理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s.5.2)

环境包括"(a)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包括人类和社区；(b)所有自然和物理资源；(c)休闲及便利设施；(d)与以上描述事项互为影响的社会、经济、审美和文化条件"。(s.2)

效应的定义为"……术语'效应'和使用、开发或保护自然及物理资源有关，或者和环境有关，具体包括：(a)任何正

面的或者反面的作用;(b)任何暂时的或永久的影响;(c)任何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影响;(d)任何累加效应,包括由时间流逝而积累或者与其他效应结合产生,无论其规模大小、强度高低、持续时间长短或者出现频率高低;(e)任何潜在的但发生可能性很大的影响;(f)任何潜在的,虽发生可能性较小但一旦发生作用较大的影响”。(s.3)

因此,在考虑效应的可能形态时,必须将环境视为一个生态系统网络,包括人类和社区。在这个网络中,社会的、经济的、审美的和文化的效应必须有利于促进自然和物理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关于资源管理法案(1991)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磋商是整个程序运作的核心。法案的第四细则指明了“环境效应评估应当包括的考量……”,第h款建议“对提议方案的受益和受损群体进行鉴定,执行咨询并对咨询观点的任何反应予以确认”。(s.88)

国际实践

1990年代,广泛的国际社会评估实践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关于“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即众所周知的布伦特兰(Brundtland)报告,强调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并加强了对环境影响评估(EIA)和社会影响评估(SIA)的倡导(Burdge, 1998)。从此,在环境灾害面前或者审视乏味的项目规划时,决策者从狭窄的工程学和经济学的标准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空间(Burdge, 1991)。国际上对环境问题的兴趣被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再一次激发,更加关注可持续性问题并付之于行动。一个同等重要的转向是对本土居民的议题越来越重视,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也许是1990年代早期南非的改革。

《影响评估和工程》评价杂志近期出版的一本关于社会影响评估的合刊[特邀编辑博尔杰(Burdge), 2003]重点阐述了社会评估领域的发展。实际上,该出版物只是数量众多的提供评估领域实证材料的书籍和刊物之一。第一本关于社会评估

的书籍于 1990 年编辑出版，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新西兰社会评估的经验，在新西兰国内和其他国家广泛使用，并在 1995 年发行了第 2 版。博尔杰 1998 年出版了他的社会影响评估著作的修订版（Burdge，1998），戴尔等人 2001 年出版了主要论述社会影响评估制度化的著作（Dale et al.，2001），贝克尔和范克里 2003 年发行了社会影响评估的新手册（Becker and Vanclay，2003），洛奇 2001 年对 1986 年弗罗伊登伯格（Freudenburg）总结之后该领域公开出版的著作进行了评论（Lockie，2001）。

社会评估的大量文献进入了大学和在职课程，为培训和机构建设提供了支持。许多课程的举办得到了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年度会议的通力协作，国际参与者之广说明社会评估领域在扩大。此外，目前社会评估在全球已经被列为环境影响评估的主要课程之一。

在美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维护的主旨支配着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森林采伐作业，该行为需要承担北方斑纹猫头鹰和太平洋鲑鱼可能绝迹的责任。美国林务局的政策得到了优化和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倾向于根据生物-物理或“自然（natural）”系统边界的特性，而不是行政权限来进行管理和评估，同时，更加系统地尝试了把环境变异效果转化为对人类生存系统影响的评估。社会评估执行指南开发出来并被编辑为标准化教材，通过综合的在职课程用于评估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倡导生物-物理评价和社会评估的整合。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CEQ）引领其他联邦机构在更大程度上关注社会评估。

评估在美国最重大的进展是 1994 年组织间社会影响评估指南和准则委员会出版了《社会影响评估指南和准则》。指南反映出社会科学界和公共中介机构对于社会评估本质和方法认识的一致性大大增强。其目的是通过提供指南和准则，帮助机构、从业人员以及相关人群理解和运用社会影响评估，更好地遵从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规定和评估程序的要求（Burdge and Vanclay，1995；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2003）。

国际实践的一个重要进展是社会评估扩展到了诸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发展规划

机构。世界银行环境部(1991)、亚洲开发银行(1994,后更新)、联合国粮农组织(1992)和南部非洲开发银行都相继推出了社会评估的详细程序和手册。目前社会评估视角连同性别分析以及参与程序一起写入了政策和工程文件(参阅 www.worldbank.org, www.adb.org and www.iied.org),这些机构雇佣了相当数量的社会领域专家(Francis and Jacobs, 1999)。

社会评估同样在其他许多国家得到确认,有的国家还支持发展公共机构并对其进行能力建设。南非就是其中之一,从1993 年开始大量举办了研讨会和培训班,本书的作者也参与其中。在欧盟,每个成员国都在欧盟理事会 1985 年 6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公共和私人工程环境效应评估(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ublic and Private Projects on the Environment)"的 85/337/EEC 指示推动下开始了环境立法和规章制定工作。该文件 1997 年修订,并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社会影响评估(SIA)的内容(Glasson, 1999)。在东南亚,环境影响评估(EIA)程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发展,不过它们的思路各异(Leu et al. ,1997),特别是对环境社会层面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影响评估的需求不尽相同。例如,在马来西亚,土地使用和重点工程规划的环境评估程序包含了社会层面分析,尽管其执行社会评估的专业水平和机构能力都很是有限。

影响评估在欧洲发展一些得到国际性应用的重要的相关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环境评估(SEA)的技术,即参照工程水平对项目、规划和政策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估。战略环境评估者提倡一种包容了社会分析的整合思路(Brown and Therivel, 2000; Eggenberger and Partidfirio, 2000)。战略环境评估也可以包容性别分析(Verloo and Roggeband, 1996)。健康影响评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是另一个补充技术(Vanclay and Bronstein, 1995),也应用于工程、项目和政策效果分析。

能力建设和社会评估制度化是实践发展的重要方面。新西兰社会影响评估工作组 1990 年转变为正式机构——新西兰社会评估协会。协会对促进社会评估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它通过定期通讯、地方分会和年会等方式发展概念和方法,推动

培训,维持统一的实践标准。有趣的是,协会将其活动扩大到所有影响评估领域并在 1998 年更名为新西兰影响评估协会,附属于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参见 www. iaia. org)。国际影响评估协会是社会评估实践的国际领导机构,设有社会影响评估(SIA)部门,在其网站上列出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参考书目,包括引用的重要文献目录。国际影响评估协会出版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国际准则(参见案例研究 1.2;Vanclay, 2003)。

案例研究 1.2

社会影响评估国际准则

以弗兰克·范克里为召集人的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的一个工作小组投入了社会影响评估国际准则的开发。经过多年的探索,克服了无数困难,包括和特别的听众辩论,成果姗姗来迟。工作小组选定的听众包括评估人、管理机构、政策制定者、受影响者、非政府组织、特殊兴趣和地方行动团体、开发者(建议者)和开发代理机构。

工作小组因此完成了一套基本准则的开发,从中可以根据不同背景和社会评估应用需要开发具体评估指南。基本准则包括(作者总结):

- 确保社会影响评估在决策的早期就启动并由有资格的从业者执行;充足的时间和资料、透明的程序和方法,以及公开的结论等是全面而彻底的影响评估所必需的。
- 在一个宽泛的环境定义下考虑全部社会影响,包括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要考虑实际影响的文化差异,包括影响出现的前后次序。
- 分析要集中于关键因素,采用应对技术性议题一样的预防性原则处理社会问题,对不确定问题执行进一步的调查分析。
-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向包括社区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地方当局在内的相关利益者交互核对有关数据,尊重地方知识和当地居民的知识产权。

- 发挥社会影响评估的积极功能,改善管理、减缓社会冲击;如果需要,建立监测和赔偿机制。
- 承诺让全部受益和受损群体参与变迁的计划、设计和执行,尊重地方风情和乡规民约(local knowledge and protocols),了解地方权利关系、社会结构和其他通常在参与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任何一个群体。
- 考虑脆弱群体和少数民族的需求,建立机制促进他们的能力建设,扩大他们在变迁过程中的社会参与。

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社会影响评估准则文件参见网站:www. iaia. org

未决的问题和倾向

尽管社会评估的转变带来了更加有效的思路,评估者对评估过程和方法等基本知识要求产生了一致性认同,不过一些未决的问题和令人困惑的倾向依然存在。

谁的领域

这个问题围绕的核心是谁最有资格成为社会评估的领头羊。早期的答案(也是大家最可能想到的)是社会学家。但是许多学科的专家都具有承担社会评估的理论和知识准备。如人类学关注文化、社区,擅长定性研究,或许是社会评估实践者最有用的学科背景之一。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同样各具专长。

然而,常常出现不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执行社会评估的实例。博尔杰和范克里(Burdge and Vanclay,1995: 45)在讨论社会评估领域面临的问题时,提出了开展针对性培训以及注册"具有相应资格和经验的社会影响评估从业者……"的议题。越来越多相关的大学课程和其他培训项目在全世界开设以弥补这一差距。

在另一方面,因为传统的职业领域正在萎缩,为了学生(也

为他们自己)的就业前途设计,大学教师已在热切寻求开拓公共领域的职业。社会评估领域成为就业的一条途径,但由于预算限制,许多国家的公共机构遭遇了经费缩减。受此影响,这些机构的社会科学人才的储备一般远远低于恰当水平,难以为社会评估提供足够的自然资源管理和规划方面的专家。

这种倾向的一个有益之处是诸如具有林学和工程学这样学科背景完全不同的从业者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并在社会领域逐渐形成组织化的视角和决策。当然,雇佣一个有时间参与但未经培训的人员有其“代价(costs)”,即并不总是有足够的专家可以承担社会分析任务,而生手时常对潜在的社会效应视而不见。

有关领域的这些问题将在第 2 章关于社会评估的主要取向以及实践者置身其中的典型工作环境等主题中进一步探讨。

整合还是分割

在环境影响评估(EIA)中,社会分析常常是分割的,理由似乎很具有逻辑性:社会评估的主旨毕竟不同于生物-物理领域,本来就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用于分析。而且,关于影响评估的不同立法授权给出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区别。环境影响评估(EIA)的多学科间性得到认可,如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中提及了经济学、社会科学和“艺术设计(design arts)”,美国林务局雇用的也是多学科的工作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环境影响评估“组员”经常独自承担不同部分的分析工作,和承担其他部分工作的同事协商不多(也许社会科学专家尤其如此),评估报告也常常是一串不同主题的独立分析,很少是整合的。

正如上文关于领域的话题所述,社会评估的范围和核心可能受制于评估人的学科背景。通常,项目执行人员的知识背景反映出问题分析时特殊学科的权力和影响。在美国林务局,经济学家一直是传统的在场的社会科学专家(大多数其他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然而,经济变迁并不意味着量化的社会变迁容易可测,因此特别期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能够在多学科交汇的平台上共同开展工作。

关于对某机构以社会评估名义获得公众认可行动计划可行性的政治性或制度性分析产生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危险倾向是:这种类型的分析,或者更糟地说“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可能被官员接受以替代社会评估。公众千万不能被评估机构运用的一套复杂深奥的方法所迷惑,它们打着影响评估的旗号为的是执行预先安排的行动程序。

焦 点

学科领域和整合议题与评估的焦点(focus)紧密相连。社会评估过程存在两个特别的关注点:其一,评估能否足够快地完成以满足决策者的需求;其二,评估结果能否以决策者可以使用的方式呈送。第一个因素是评估的时限,与焦点问题有关,因为宽泛的、百科全书式的思路必然导致冗长的时间序列安排以及对工程决策和政策制定并不适用的复杂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非学术机构的专家常常卷入到大规模工程的社会评估中来的理由,他们一般能够将评估焦点严格限定于一些标准变量(通常是与经济和人口有关),而私人顾问常常被聘用于严格规定了时间进程的既定格式的评估方案的执行。毫无疑问,这样过窄的聚焦也限制了社会评估概念和方法的发展。

第二个因素是评估报告需要对决策者有用,评估结果需要按照主要争论点提出。大多数评估者根本不研究、也不关心那些集中于环境和社会关注点的主要问题。社会评估聚集的本质是问题导向的。应当在初步调查阶段,包括公众卷入的初期就尽可能早地确定议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考虑的问题只有公众认可和提出的那些。专家意见是另一条可以识别问题的途径,而且,问题也可以在后期的调查及掌握了新的信息后才发现。快速、适用的社会评估是分析性的而不是百科全书式的,是问题驱动的,而不是其他驱动的。问题驱动的分析法将在第5章详细描述。

概念问题

分析法需要解决概念化问题,一个令社会科学普遍为难的问题。社会评估的调查应当依赖理论和概念框架,即字面意思

的指导调查的心智地图。否则,评估者就不可能比一般人更有见识,只可能发现自己和别人一样,看着一堆从高楼顶端抛下的玻璃椅子的碎片百思不得其解,弄不清原物是一把椅子!

可以从两个特别的方面对概念框架进行改进。其一是为社会评估分析的变量选择提供概念指导。在选择与反映社会变迁主要结论有关的变量时,应当先有一个关于社会领域的心理建构,然后从中提取出关键变量。换句话说,评估者需要对这个"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是什么形成自己的见解,以帮助确定在调查中是否遗漏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关键领域。第 6 章将讨论反映社会剖面(social profiling)的变量框架。

其二是在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不能提供概念和理论建构的状态下对社区结构及其变迁进行分析(Taylor et al. ,2001)。此时,评估者必需具有清晰的根植于社会理论的关于社区形成和变迁的概念。第 3 章将讨论关于社区的主要理论,第 8 章将提供一个理解社区及其利益设置的框架。

问题的"计数"

提出的议题是否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第一个方面与预测的技术有关,第二个与量化问题有关,第三个与数据有效性问题有关。

前景预测方法是社会评估的核心技术之一,分析过程的神秘多源于此。不管社会评估实践者可采用的社会评估方法有多少,其中大多数可归属于趋势预测、乘数法、脚本法等几大类。复杂的计算机模拟作为这些技术的一部分得到使用(例如 Leistritz et al. ,1994-5)。

关于量化问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那些擅长数据分析的学科,如经济学,比缺乏数据支持的学科更加广泛地为决策者接受。数据使调查者测量变量成为可能,并按照数学分析的要求选择测量单位和方法。数据能够对资料进行有效的和具有说服力的概括,一些"已知量(known quantities)"可以十分方便地应用到其他分析系统中(例如第 7 章将讨论的投入-产出分析)。事实上,大量的社会分析资料可以量化,如工作、收入、人口等信息。最大程度地开发这些数据将形成很强的判断力。

但遗憾的是,数字在收集和演示过程中其价值是隐藏的,并不易于判断。

真正的问题是对那些难以计数的对象进行"数(count)"(真正的和比喻的)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估者难以定量分析的资料常常是对评估最有价值的变量,例如代表原住民精神生活核心价值的原始环境的意义,荒野中自由流淌的河流和小溪对赶筏运动员、皮划艇爱好者和钓鱼者的吸引力(尽管他们为参加体育运动所花的钱是可以计数的),生活方式变迁造成的社会和心理成本(例如因为开挖煤矿而卖掉家庭农场),等等。不存在一个魔法能够把这些变迁转变为明确的度量单位以供统计分析和列表明示之用。

调查是收集可计数原始社会资料的常见方法。虽然问卷调查是社会评估的一个选择,但评估者一般没有过多的时间和财力来收集问卷调查数据,所以,如果需要很多数据,明智的选择是使用二手资料,如通常(并不总是)为其他目的收集的数据。二手资料包括(第6章详述):住房和就业资料、报刊文献、研究报告、教育管理资料、历史档案、专著、当地历史学家的书籍等。二手资料的回顾需要在收集一手资料之前完成。社会评估一旦确定需要原始资料,那么,定性和定量数据的使用将扩大可用方法的选择范围。

从多样化的数据来源中得出有效结论的关键是实施相互检验以保证各种数据的论证方向大体一致,其中矛盾之处被核对并得到解释。这种交互验证有些学者称之为"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是一种简洁而有力的建立结论"真实性(truth)"的方法(Hill,1984)。

分析归纳技术是一种功效十分强大的方法,在社会评估中可用于分析的组织和聚焦,第5章将进一步讨论。简而言之,分析归纳法旨在建立关于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及其如何受到工程、计划以及其他替代方案影响的解释性框架。该框架根据新数据不断修订。当调查者能够用修订后的模型说明全部表现不一致的信息时,就形成了对结论有效性强有力的支持证据。

过程问题

也许难以置信,对什么是社会评估必需的程序的认识仍然存在差异。分歧一般产生于学者和官员之间,前者将社会评估看作研究过程,而后者将其视为决策和规划框架的依据。另外,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认知区别,一部分人将社会评估看作自上而下的规划过程,而另一部分人将其视为自下而上的促进社区发展和增权的途径。第 2 章将讨论形成这些不同社会评估观点的理念基础。

在此,我们认为,"社会评估(social assessment)"本身包含了一套基本的逻辑程序,但既不同于学术研究过程,也不一定能划入各种政府类或者社区类的概念之中。社会评估过程与环境分析和管理的要素具有更多相似的逻辑,第 4 章将详细讨论。

社会评估的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范围调查以确定议题所在,据此评估对相关社会变量的影响,决定研究的区域和亚区域,识别可能受到提议方案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始终根据预测策略的数据来源需求计划分析的方法和思路。通常,应当在评估的早期阶段为后期广泛的公共咨询建立基础。第二,描述社会剖面(social profiling),或者是基线描述,作为与现状(status quo)和不同行动方案预测结果的比较。然后是对效应的预测和估计,比较不同方案的积极和消极效果。这些比较是根据业已达成的决策标准、作为社会评估一部分为提议工程或计划预期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水平而建立的任何规范而完成的。作为不同方案比较的一部分,现状(或者说未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分析应当包括进来(Bryan and Hendee, 1983)。

从这一点上说,有权力的决策者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力求使社会评估的发现与其他环境要素及经济分析相平衡。那么,工程、项目或者政策一旦实施,就可以形成一个体系对其不断产生的后果进行监测和管理,包括负面效果的治理,最后进行评估。

必须明确认识到从严格的术语定义看,社会评估不一定要

包含一个研究过程。因为，社会评估不是为了检验形式的假定是否得到数据的支持，而是根据那些看起来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又能说服别人认同其结论的数据和程序来进行预测。即使如此，必须申明，其中有一些未来预测永远不会得到人们的确信。"未来(future)"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应对工程和计划的实施时，人们总是试图扩大其成果而将其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成本最小化。

社会评估的目的是使提议支持者和决策制定者能够做出更具有社会责任的决策，并且让受影响人群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虽然社区变迁以及所引起这些变迁的社会进程会产生新知识，但是社会评估的直接目标是最好的决策并对变迁进行管理，而不是新知识的生产。

毋庸置疑，并不是说对社会评估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研究和理论视角可以省略。理想地看，来自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和资料分析应当为社会评估提供基础和指南，因此，没有一个新的评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新哥伦布(new Columbus)"[或"库克船长(Captain Cook)"]①综合行动的一部分：不得不去发现已经存在的新事实和新观点。但是，社会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许多是因为现有的理论视角、方法和资料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其中的理由可能是一个有资格的社会科学家并没有把相关知识运用于社会评估(Burdge and Vanclay, 1995)，或者大多数社会科学文献并没有转译成易于使用或者社会评估可以采用的术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存的关于社区、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大量文献资料常常未用于评估目的。

灵活性还是标准化

从发端初期就开始争论但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社

---

①哥伦布·克里斯托夫(Columbus Christopher, 1451—1506)，意大利探险家，效力西班牙，他认定地球是圆的，试图从欧洲向西航海至亚洲，因而发现了美洲(1492)。在他寻找通往中国的海路时又接连三次航海至加勒比海。库克·詹姆斯(Cook James, 1728—1779)，被称为"Captain Cook(库克船长)"，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曾三次率领地理发现大航行，并为太平洋中许多岛屿绘图并命名，他还曾沿北美洲海岸向北航行直至白令海峡。——译者注

会评估过程具有灵活性还是坚持标准化。举例说来,早期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下对环境影响评估过程的诉讼集中在是否履行了评估过程的格式,而不是实质性问题。今天的诉讼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结果是,强调评估报告文件的形式和格式导致了某种官僚式的八股文(bureaucratic uniformity),促使评估机构倾向于遵循形式上的要求而不是以主要问题和结果为核心完成评估。这种状况对社会评估特别有害,因为它进一步混淆了社会评估的本质。

在早期,因为缺乏既成文献和方法逻辑的混乱,质疑社会评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它满足的是机构的官僚政治和组织性需要。这种混乱从早期变量选择的“细目清单(laundry list)”中可见一斑。一般情况下,评估者和评估机构承担的环境评估的全过程是分离的,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各自的研究结果提交给“负责的机构官员(responsible agency official)”,后者再根据形式要求使用(或者常见的事实是不使用)这些结论准备社会评估报告。

同时,专业学者特别为每一个可能想到的社会变量构想出了广泛的社区研究方案。其结论性的社会概述尽管为随后的社会评估提供了很好的基线资料,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效应进行预测,所以不是问题导向的(issues oriented),也很少在最后的决策阶段为官员所考虑。

为应对这种事态,一些机构,如美国林务局制定了执行社会评估的方法指南。其目的不是为了否认官僚式的程序,而是作为逻辑质询的一部分对执行机构评估程序的每一步做出详细规定和说明,旨在运用这个逻辑去超越各种各样的关于选址和专案特殊评估的官僚政治性要求,并对评估程序进行标准化而不拒绝艺术性(state-of-the-art)运用所需要的充分灵活性。

因而,每个评估的格式遵循上文描述的基本过程,这在第4章将进一步阐述。社会资料尽可能由跨学科评估小组的成员收集;决策由官员根据一定的标准程序完成,尽管如下文所述,这些标准常常并不一致;社会分析的关键核心,即社会问题得以识别和预测的方式,留给担任分析的专家负责。其中的理念

是既明确表述分析的逻辑顺序,又不为其操作指定具体的技术——这就是标准化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

如果在人们的观念中对此过程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需要为社会评估的执行者设立资格条件,并建立判断他们评估结论有效性的方法。关于前者,评估机构并不愿意建立一套专家标准,因为人头预算的削减,以及需要维持和在聘人员的既有关系,所以它们并没有机会雇请社会科学家。许多卷入计划和管理社会效应过程的人士依然对社会科学事业在其中的合法性心存质疑。虽然社会科学家的职位前景长期来看会有改善,但是合法性的问题主要取决于社会科学家服务决策的有效性。同时,机构一般会凑合着用(making do)已有的专家或者培训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承担社会分析。

决策标准

决策标准是用来判断环境效应(包括社会效应)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依据。其中,有几个问题成为了社会评估有效融入决策制定过程的基本障碍:决策者运用的标准常常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标准常常难以规定;或者,即使标准被明确规定,却又常常不合评估过程的时宜(而且标准制定者们和评估机构也常常缺乏认同)。有时,这些标准自身也难以协调,例如既要最大化收获木材又要促进生物多样性。

既然决策标准反映了基本的价值选择,如什么是社会中应该发生的,那么,把对这些价值选择的明晰表述与特定项目的结果联系起来是危险之举。一些决策者尽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宁愿"让事实自己表述(let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当然,它们从未开过口),并认为他们这样行动的结果有利于"社会公益(social good)",如工作岗位、收入、经济繁荣以及其他。所以,流行的假设是技术上的造诣加上对"发展(development)"路径的宽泛定义将带来社会公益。

通常,对社会结果的分析越严密,对决策过程注入的问责性就越大。但社会评估从业者在这一点上却难以感到欣慰:人们的日常推理很多是为保卫或推进他们拥有的既得利益而建构合理化解释的一种行为。当提到需要说明他们所采取的行

动的正当性或为之辩护时，处于责任风险中的政客和其他决策者很自然地想得到尽可能广泛的选择自由。

既然决策标准与人类价值选择相关联，并且每个决策案例都卷入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范围的价值选择，决策标准就很难像公理一样表述并且维持不变，特别是比价值观的表述更清楚。讨论繁荣经济是一回事，指出更多的工作机会仅仅能够弥补一个地区大量新移民涌入并导致社区冲突和不稳定的"成本(costs)"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评估标准应当如何选择？更多的工作？更广泛的经济多样化？人口的稳定性，或者人口多大比例的增长不会突破社区最大承载力？保护文化价值观？增进少数群体的利益？经济增长？更多的社区设施？决策标准的问题是混合的，满足了这样一些目标就排除了其他目标的实现。在缺乏设定优先次序的系统方式或者权威政策依据时，决策制定者只能依靠他们自己对效应的判断，或者更差，不加鉴定地假定效应对社会有诸多益处。

标准应当由谁制定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事实上，标准常常根据那些远离评估过程的人所提出的假设而制定或受其支配。结果导致这些标准在招致诉讼或者正式听证会之前很少经过详细审查。尽管那样，社会假定的重要性被认为仅次于那些物理性或技术性因素。多数人在处理社会价值事宜时颇感为难，但是既然资源使用的决策依赖于有关社会价值的假定做出，那么在决策初期就明确表述这些规则更为适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适当的政策框架来指导相应的思路。这些政策应当来源于广泛的公共参与，并在完成之前而不是之后，经过政治性辩论的修订。

也许，建立决策标准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在初期明确表述规则使那些具有潜藏价值(个人意图)追求的人难以隐藏他们的私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隐性成本并不总是传递给工程的预期出资人。举个例子来说，建设一个大坝以为地区创造了工作机会并增强了经济活力为价值基础"卖(sold)"给社区，工程商和建筑商获得的显在收益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伴随着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迁入和移出而产生的社区"繁荣和萧条周期(boom and bust cycle)"的隐性成本却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或者

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当被告知可以依靠湖域消遣发展新的休闲产业时——前提是它的原始河流具有相当的旅游开发潜力,社区需要独自为社区服务(学校、游憩设施、消防和警察保护)的扩张买单。社区有的成员的获益却是以其他成员的损失为代价。房地产投机商大把赚钱,但是新来乍到的居民在社区寻求住房时发现自己已被价格排斥在市场之外。

在上文概述的案例中,整个国家从水电站的受益在价值上可能远远超过当地和特殊社会群体的付出,但是在早期确定社会和环境变迁的决策标准可以促使在工程的义务承诺之前更加详细地测算成本和收益。我们应当这样假定:在早期全面澄清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以及受益受损的程度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成本-收益分析,也支持了公共参与并激发了公众讨论。

预测和参与的作用

这一部分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取得有效的社会评估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包括前景预测问题、规划前景时公共参与的角色,以及该领域不同的哲学命题等。公共参与和社会评估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如此,社会评估应当让受到变迁影响的不同人群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可以认为,社会评估初始的目标是预测随着环境变迁相关事件的发展,从而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同样也可以认为,对所有实践目标而言,“社会未来(social futures)”的预测不可能达到某某精确度水平,因为公众可以根据任何可用的信息采取行动,随着公众的行动,“未来(future)”跟着变化。社会评估因此一定要包含一个策略,即既预期变迁,又对变迁做出反应。

至少在理论上预测前景是可能的。尽管这种预测一般很抽象(其他学科科学家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为这些未来行动的社会结果提供近乎合理的脚本(scenarios)。普通公众和代表他们的官员可以参与脚本工作。预测为共同讨论提议项目的问题和前景提供了基础。尽管预测结果可能出现不同意见,并且可能揭示出对治理标准的需求,但是不影响社会预测成为社会评估过程的实质性内容。预

测的质量,假定、方法和结论的可信度,以及这些要素是否恰当表述,对整个评估过程的成功和可接受性具有很大影响。

另一个问题和社会评估过程的公共参与有关,即是让公众真正参与进来,还是仅仅拿公众当噱头。答案的判断取决于公众卷入的时机是否足够早、工程是否不顾反对和社会后果决意推行,以及开发者和规划者对社会评估过程所持观点。长期看来,除非公共参与在早期就被善意包容并成为评估的主要部分,那么,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走向反面,即对具体提案的支持和反对不是建立在全面的信息分析基础上,而是屈从于政治苛求和权力。一个运行良好的公众卷入的设计旨在使公众获悉全面信息并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而不是常常出现的各方陷入议题进展的僵局。毋容置疑,任何关于社会结论的决策都或多或少夹杂着一定的社会冲突,所以,一般而言的社会评估和特别意义的公共参与,都在决策程序中包含了冲突的确认、协商和解决方法。

社会科学家之间和其他参与者对社会评估的理念和方法的意见很难获得一致。社会科学因为理论和哲学基础庞杂而成为“低一致性学科”。科学知识的一个定义是专家们都同意信息至少暂时是“真实的(true)”。科学方法给专家们提供了这种同意的基础,即他们可以通过复制结果来比较测定它们是否具有一致性。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指导不同实践者的哲学观在本质上互不相同。有的哲学观假设社会的本质是协调的,而其他的哲学观则假设冲突才是社会的自然状态;有的哲学观假设可以像调查其他客体一样对人类及其社会进行科学研究,而其他的哲学观则认为人类是“特别的(special)”且并不适用于其他客体的因果关系及决定法则;有的哲学观假设作为统一管理技术手段的计划是最有效率的,而其他的哲学观则强调必须让所有授权的社会群体都参与进来进行利益协商才有效果。第 2 章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帮助实践者处理这些问题并领会它们对社会评估实践的意义。

结　论

目前还没有走出有关社会评估两难选择和矛盾困境的简便方法。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社会评估运用多种方法和视角,毫无疑问是一门兼收并蓄的技术。无论是中央规划还是社区行动都对未来有独特影响。

我们对社会评估领域的回顾显示出其对增强社会规划、建立决策制定过程中与经济和环境标准并行的社会标准具有相当的潜力。社会评估是个过程,其中可以从社会角度对富含社会蕴意的决策进行事前和事后分析。

众所周知,社会评估在其方式和方法方面受到诸多几乎是自身特有问题的困扰。评估者一般受到时间和金钱的限制,不得不依靠二手资料。在没有办法采用定量分析技术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只能对工程定性资料中的关键社会变量进行分析。而一些决策者认为和"硬性资料(hard data)"相比,定性资料具有较少的"科学性(scientific)"、较低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这些问题常常因为根据不恰当的"细目清单方法(laundry list approach)"收集资料而更加难以解决,有时可能导致调查者不得不对计划或工程影响下社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展开研究。社会评估需要一种问题导向的思路,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资料。

需要让决策者认识到,细致的社会分析和有效的社会评估过程,一般可以揭示开发者和其他人通过工程和计划传递给受影响社区的隐性成本(hidden costs)(和利益一样)。因此,这种信息提供也是给社会群体的有效增权,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承认的问题的一部分。社会评估常常揭示出让某些特权阶级感到威胁的信息。许多项目的提议者和官员因此不信任社会评估。

社会评估具有一套更加清楚地表达各方价值并为决策过程注入某种程度问责性的方法。可以认为每一个政治决策实质上都是一个人类行为的实验,但这种"实验(experiments)"的

后果和涵义却很少得到明确探讨。社会评估执行的就是这一类型的审查,所以,不难想象一些政客不会支持在他们看来是暴露他们特权的一套程序。

最后,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一直是反应性多于前摄性,即社会科学家每每倾向于观察已经发生的事件并做出解释,而不是预测变化,在事件发生之前或之中提出建议,影响其变化。我们相信,目前社会科学正在逐渐向更加前摄性的方向发展。其实,前摄性模式(proactive mode)的要素一直贯穿我们的工作之中,所以,我们呼吁把握这个新的趋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前摄性知识的建构中来。

本章小结

社会评估为计划、管理由工程、政策和项目实施而引发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方法。第 1 章简要回顾了社会评估作为一个领域的发展,从历史的和跨文化的视角重点探讨了领域发展的若干转折点和取得的积极进步,同时检视了存在的困难和约束。

社会评估领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69 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立法,以及随后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环境评估和社会评估机构的发展。社会评估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多边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环境管理方面。

社会评估的实践具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这虽然导致了评估路径的冲突,但促进了多学科重要视角的发展。

在发展阶段,哲学理念、过程、焦点、概念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困惑着社会评估领域的运作。哲学理念问题主要涉及评估是采用专家统治的思路还是公共参与的方法。本章还讨论了决策标准以及提议者、公共机构官员和政治机构代表的问责性问题。

过程问题关系到社会评估的焦点是指向研究还是指向行动。事实上存在一个逻辑过程强调把评估的焦点集中于预测和管理变迁的关键议题。该评估过程需要依靠一个概念框架

来理解社会变迁以及证实和确认社会议题的有效性。

社会评估通常包含定量和定性两种资料。一般的经验是最难计量的资料常常就是对评估最重要的资料。一个好的评估通常是分析性的和问题驱动的。

社会评估给社会科学带来了特别的挑战,强调社会科学从反应性思路向前摄性方法(proactive approach)转变。它同时要求其他学科的参与以形成整合思路。

第2章
社会评估实践的取向

Orientations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ssessment

第1章提供了对社会评估领域发展的批判性的评价，对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都做了阐述。这一章我们就该领域对社会评估实践的主要取向进行分析，对更加前摄的、整合的和问题导向的思路所带来的社会评估的前景进行详细论述。

我们对社会评估文献和实践的回顾显示评估者来自多种背景，包括大学及研究院的社会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专家、专业计划编制和工程设计人员、社区发展和特别兴趣研究或行动小组等。很显然，每一种背景都给社会科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赋予了独特的定位。我们讨论这些典型工作环境的取向并从中得出结论：是否存在避开僵硬而教条的立场开展工作的可能性。

社会评估领域的取向

社会评估可以从两个主要维度去考量。每一个维度都反映出主导的和对立的观点,如图 2.1行和列的标题所示。第一个维度涉及社会评估采用的主要观点是“技术专家论的(technocratic)”(结果导向的)还是“参与型的(participatory)”(过程导向的)。第二个维度涉及的主要观点是关于信息的使用,是为社会行动提供依据,还是为了支持研究或与新知识的生产有关。因此,该维度表现为是“行动(action)”导向,还是“研究(research)”导向。

技术专家论-参与纬度反映了社会评估的价值观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评估事关决策制定。简单说来,社会评估者想要更成功地影响决策制定者,就需要采用和决策制定者相互支持的价值观体系来表述他们的产品(如导致对发展或政策持赞成或反对结论的价值选择)。价值体系的紧密相关可以在社会评估和决策制定之间形成相互强化机制。评估者很熟悉的结果是:有时评估在建议或者改变具体政策、计划和发展过程方面毫无作用,但当支配者是制度性资助、政治机构和其他强制性力量时,评估就可以用来推动发展,甚至充当“橡皮图章(rubber stamp)”的作用。这时,它们拥有一套主导的价值体系使具体的发展路径合法化。另一方面,受到计划变迁影响的社区和公民群体拥有的价值体系常常不同,从而引发他们对来自上层(from above)决策的抵制。因此,人们经常发现社区群体从根本上反对各种变革规划,为的是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改变提议发展的路径。因此,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社会评估既要支持变迁和发展过程,又要与之抗争并对之进行修订。

社会评估的技术专家论方法和参与方法之间的区别对自然资源规划和管理从业者来说并不陌生。在社会评估早期,北美的泰斯特和麦克斯(Tester and Mykes,1981)论述了二者之间

的区别；新西兰的泰勒和夏普（Taylor and Sharp，1983）做了同样的工作。这些学者指出，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应用性的，技术专家论方法都趋向实证的方法，也就是说它们瞄准的是通过对后果的预测、控制和管理来推动发展。相比之下，参与式社会评估把社区行动参与作为重点，无论是以直接行动反对一个新的项目，还是通过协商对影响进行分担。最近，罗伯茨（Roberts，2003：260）对“咨询式（consultative）”和“参与式（participatory）”方法进行了区分，二者位于“公共卷入光谱（public involvement spectrum）”的两端。

研究-行动维度反映了对变迁内外进行研究和对变迁采取相应行动之间的不同，不管是否采用了研究产生的数据和分析。社会科学家一直这样致力于回应变迁带来的挑战，正如伯杰和伯杰（Berger and Berger，1976：330）所指出：“社会变迁是个智力问题，其理解具有挑战性；同时社会变迁是个政治性问题，需要付诸实践行动。”再一点，应用性和基础性社会研究之间的区别对曾经参加过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科学家而言也是耳熟能详。自然资源管理的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之间存在的一般区别可以通过检查研究的社会语境来区分，通过观察工作模式的差异、多学科取向、调查方法、研究成果与客户需求及政策和行动应用的关系就可以实现。

四种取向

在实践中发现的差异基础上，通过两个维度交叉可以把社会评估区分为四种取向（图 2.1）。每一种取向的特征都可以根据和社会评估过程的关系进行讨论。这些取向受到各自不同的工作环境的影响并和各自不同的社会评估方法相联系。就每种取向本身而言，其特征构成了社会学术语所称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从中可以绘制并阐明社会评估的原则和趋势。这个框架对社会评估实践者特别有益，可以帮助他们批判性地思考自己的工作并发掘出需要采用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框架使评估者的思考更加符合问题导向的思路。

	行动取向	研究取向
技术专家论方法（结果导向）	行动以中央集权的社会计划和管理为基础（政府机构、顾问）	学术研究（大学、私人和公共“智库”）
	问题导向的方法	
参与式方法（过程导向）	行动以社区层面的社会发展为基础（当地社区组织和群体，以及社区工作者和组织者）	倡导性研究（基金会支持和代表特殊少数群体权利的独立研究）

图 2.1　社会评估的取向

技术专家论-行动

社会评估的技术专家论-行动取向（the technocratic-action orientation）是政府机构用来引导和监控环境影响评估，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用来实现和环境影响评估及自然资源计划和管理领域有关的法定要求的典型类型。该取向同样是私营部门发展商和咨询公司用来满足自身或机构需求的主要方法。资源开发一般由私营部门资本和中央政府通过官僚制联盟的工作方式来组织。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的工作焦点处于中央控制之下，以“知情（informed）”社会计划和影响管理为目标。这种方法对社会评估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依赖“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在一个正式的结构化的官僚政治体系中实施“自上而下（top-down）”的决策。但其结构中内在的身份和职业生涯进步的方式制约了个人对社会评估、优质自然资源开发和社会政策做出创新的反应。

技术专家论-研究

技术专家论-研究（the technocratic-research）工作的典型设置来自大学、公共或私人“智库（think tanks）”对政策相关议题

进行的评价。尽管社会行动可以产生于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研究的目的一般被认为是为了知识本身。技术专家论-研究取向在哲学和意识形态上包容了从冲突论（激进的）到结构-功能论（保守的）的多种立场，在方法上既包含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

这类评估中的官僚组织和“技术专家论-行动”取向中相似。职业机会和研究经费依赖的标准很有限，通常只是发表成果的情况。因此，研究方法、概念发展或者倡导性研究等方面的创新受到实践的制约，而实践活动很大程度上又是根据研究规范和惯例而建立并被其强化。

参与-行动

“参与-行动”取向（participatory-action orientation）具有同样的中央化的社会规划和管理的行动特征，但是其工作环境从国家的、区域的或者集权的计划机构转变为地方的行动，试图“自下而上（bottom-up）”地组织以应对社会变迁。行动通常是对起源于“上方（above）”的政策的反应。工作组织一般是半正式的，可以是现有的社区团体反对某项发展；或者是组织起来的群体，其目标仅仅是为了对发展项目或政策中的某个具体内容提出异议；也可以是新成立的社区组织，其目标是为了实现当地提出的要求。但在某些情况下，社区组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左膀右臂（如在社区发展项目中），以至和广泛的机构目标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参与-行动”范式中的地位和权威是自然产生的，和技术专家论背景下的机制截然不同，如强调群体的一致意见、集体决策以及妇女或少数群体的积极参与和领导权。

参与-研究

参与-研究取向（participatory-research orientation）注重学术研究者使用的事实调查，不过这种调查一般是由利益团体或者通过与利益团体合作而完成的。因此，研究可以代表本土居民、男女平等主义者、社会改革推动者、环保群体、工会等不同方面的利益。该范式的焦点关注研究，旨在证实利益团体提出的环境变化的具体状况和相关需求。就业状况和机会通常取

决于研究者作为其中一员的群体的特别社会和文化需求,而不是一个大的研究机构的结构性薪酬制度。因此,工作环境常常既是非正式的,又受到诸如在一个传统部落设置中发现的特殊文化需求的制约。新的同行压力鼓励或者迫使研究者采用新的方法和概念。在传统设置中,这种创新可能意味着叙事研究的采用,例如,对就业选择群体而言,激进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恰当的,而对环保群体来说,生态保护思路是必不可少的。

取向冲突

关于什么构成社会评估"正统方法(legitimate approaches)"的困惑和争论产生于不同从业者或者不同工作机构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把自己的方法和理念正统化。其中公认的最普遍的是来自专家技术论"自上而下"思路和参与论"自下而上"思路之间的争论。简单地说,产生对立的社区发展活动不会有助于政府或者产业可以凌驾于特别的项目发展和政策之上。自上而下导向的管理者发现对最终可能会改变其计划并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社区发展方案很难给与肯定的评价。同样,社区发展视角的恪守者也不容易对让他们参与"上面(above)"发起项目的机会持肯定态度。

所谓的"学术性(academic)"研究和"应用性(applied)"研究之间的方法冲突众所周知。在学术性研究中,评价的重点是为了理论和学术发展以及职业的升迁而发表的研究成果。评价工作一般限于知识领域的各种思想或范式的不同学派之内,运用已经确认的方法对当前的概念进行检验和对现有"知识(knowledge)"进行推论求精。相反,政策应用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只是以收集和使用数据为手段服务于直接的客观目标。极端地说,应用研究不属于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范围,研究成果一般不宜发表,也不符合既有学术规范的要求。这类工作通常不被视为对任期和升职考虑有特别价值。

另一方面,学术活动一般被认为与解决社会行动中出现的应用性问题并不相关。而应用性研究的承担者有时被社区和特殊利益团体视为"完全出售(selling out)"给了他们的客户,同时在学术同行眼里,他们做的是不相关、不重要的工作。所

以，一旦研究设置和应用性工作的经费安排对学术自由产生了任何限制，必将引发进一步的冲突。

理论性研究和倡导性研究之间的冲突同样存在。应用性和特别兴趣研究都不被学术界视为对学术职位的保持和晋升有价值。不过，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当社会科学对政策和规划打开了大门，学术性的思路就经常被看作是最正当的。学术研究固守于专家技术论维度，而参与式研究经常引发和既有学术思想不相符的挑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相关的案例包括原住民、妇女和环境群体的研究。这些群体以问题解决为导向，采用的革新的概念和方法有时与传统的、学科为本的研究方法不相一致。

在参与范式中，行动和研究之间存在固有的对立。例如，社区行动会产生压力促使支持倡导性研究立场数据的收集。然而，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必然支持倡导性研究者的观点，那么冲突就产生了，因为研究者必须权衡其研究过程的公正性。所以对倡导性研究而言，为了在使能实践（enabling practice）有了进言机会时对社会政策的制定作出更大的贡献，研究者有必要在思想上做出妥协，以采用更加适当的研究概念和方法。

不同取向之间的整合业已形成，例如，参与-研究取向与参与-行动取向中两类群体之间的联盟。然而，尽管议题日程相同，因为不同群体的“信仰（baggage）”或者性格各异，这种联合的形成也是缓慢的。例如，社区行动群体会因为参与式研究者在其他场合表现出的不同立场而对与其结成联盟犹豫不决。

超越取向

关于社会评估实践四种取向及其冲突描述的隐意（implicit）是：每一个不同取向的评估者都会发现参考其他取向评估者的观点大有裨益。诸如，持技术专家论-行动取向的评估者会发现那些受到政策或工程影响的公民希望参与决策过程；持学术研究取向的评估者会被推动去做“真实世界（real world）”中更加直接和更加实际问题的调查，一些学者进入了

中央计划机构,另一些学者在一些情况下将开展倡导性研究;社区层次的社会发展工作者和倡导性研究者将发现正式和非正式通道都向他们打开,使他们参与环境影响评估、规划和其他影响他们生活以及他们所倡导的决策变得可能;一些特殊利益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开始参与教学和研究机构特殊利益部门的活动,在学术设置方面倾注精力。

中间立场

对发展社会评估新思路的最佳探索来自于越来越多的个性化的实践者,他们已经走出了固着于自身职业环境的评估取向。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走到中间立场的评估者所带来的前景(图2.1)。我们认为中间立场为前摄的、问题导向的方法提供了动力和创造性设置,但需要在立场上实现两维转变。以前,社会规划者注意到从专家技术论方法向更多的参与思路这种单维转变的重要性。如罗斯曼(Rothamn,1974: 6-7)曾提出,技术论的社会规划和社会行动二者对实现新的、价值更大的社会目标都具有潜能。实际上,他主张通过专家知识和世俗知识的结合来推动“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这种信息结合构成福雷斯特(Forester,1980)所称的“使能(enabling)”计划实践的基础,第3章将详细讨论。罗斯曼考虑的是规划中沟通的政治含义,以及专家技术论规划方法采用的自上而下的沟通在多大程度上是“失能(disabling)”的。改进沟通策略可以促进更加民主的规划过程,自上而下的沟通对自下而上信息的包容将鼓励规划的参与。在福雷斯特关于沟通策略的建议中,有一个对打破许多现行杰出实践惯例需要的隐含理解,或者用罗伯茨(Roberts,2003: 276)的话来说,就是“放弃一些控制”。

这种超越了专家技术论-参与维度的变化是重要的。不过,为了到达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行动-研究维度需要尽可能同时变化。

中间立场的含义

中间立场的社会评估应当是一种生产活动。首先,其调查研究卷入了草根社会学。学者不仅面临更好地服务于专家技术

论政策制定的压力，而且需要在卷入了社区及特殊利益群体的社会变迁领域全面平衡。技术论的规划者需要努力熟知社会科学研究的约束和潜力。他们被激励站在更加人本主义的立场来进行规划和分析不同的发展路径，并保证采用更全面的信息沟通以及更多参与的方法。倡导性研究者需要努力把他们革新的分析扩展到对现有社会理论和方法的评论之中，并在保持对特殊议题的验证和倡导的同时找出促进社会政策发展的有效途径。社会发展促进者和特殊利益群体需要努力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开发案例。他们同样需要通过联合其他群体、加大超越单方利益的努力，以求继续对现有研究和政策进行检阅。

第二个生产性领域产生于实践者试图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开展评估的努力。社会研究者需要根据社会概念和社会理论来确定新的立场。卷入社会行动的评估者可能需要在社区组织和官僚组织两个层面对社会变迁做出说明。因此，构建富有创造性及反应性的社会和自然资源管理办法及政策的空间巨大。

结　论

根据实践的四个主要取向描述社会评估的特征有助于识别中间立场的潜力。实践者站在中间立场并运用问题导向的思路能够对决策产生更加积极和主动的贡献。中间立场的方法包括以下要素：

- 社会评估是个过程。
- 更好的概念化和人类环境分析。
- 确认和聚焦于关键议题。
- 使用参与式方法。
- 冲突的确认、解决或者磋商。

参与式的、前摄的社会评估过程强调，在规划和决策的早期开展咨询并寻求潜在冲突的解决办法，一般通过信息交换的手段和采用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动员社会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变迁。强调早期咨询通常很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所有

决策过程的参与者集中在一起共同鉴定效果并对成本和收益的分担及管理形成方案。在参与式研究中,社会评估过程本身成为了变迁分析的一部分。例如,社会评估过程有助于举办社会影响论坛,从而激励社区群体在管理社会变迁方向时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本书描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中,同样需要对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进行紧密的整合。所有的环境问题最终都是社会问题,它们的评估过程在概念上是相同的。我们的思路包含了使用整合、预测和参与的方法和过程。第3章将检视这种思路背后的概念原理。

本章小结

第2章关于社会评估领域取向的讨论帮助鉴别了前摄性、咨询性和问题导向方法的主要理念和制度约束。社会评估受到具体评估者的特有的取向、哲学理念和工作环境的支配。通过确认这些取向,为思考新的实践方向的前景提供了可能。

存在两个具有支配力量但是相互对立的社会评估观点:专家技术论的和参与式的。对应专家技术论-参与维度,研究-行动维度反映出为了自身的价值而开展研究与应用信息设计行动之间的不同。四种主要的取向可以通过这两个维度的交叉所产生的"箱体(boxes)"来描述。关于社会评估方法的争论通常反映了箱体分类中的固有冲突。

在工作环境转换的促进下,超越取向限制的评估者通常易于提出社会评估中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中间立场反映了立场的两维转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卷入了"草根(grass roots)"社会学以及更加人文和参与的观点。倡导性研究者和来自社区以及特殊利益群体的工作者需要努力扩展他们的视野并利用机会积极参与。由于这些创造性努力的结果,一个更加符合参与性和前摄性要求的方法已经成型,它强调更好的概念化和分析、聚焦于问题和咨询,并致力于信息共享基础上的协商和冲突调解。

第3章 社会评估的理论考量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Social Assessment

这一章介绍我们社会评估教学和实践所秉持的根本理论假设。正如第2章所释，社会评估从业者可以根据他们不同的取向与工作环境来区分，每一类都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作为预测和管理工程、项目和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的方法，社会评估通常卷入了来自中央、区域和当地不同级别政府机构的实践者，同时也卷入了私营部门、社会研究者和来自各种特殊利益群体和当地社团的参与者。

社会评估不同取向的差别包含了专家技术论方法和参与式方法之间一个重要的总体性不同。但这主要并不是根据理论视角做出的归纳。在一定程度上，有关计划和研究的工作环境和取向通常是我们对不同实践进行分类的基础。例如，我们把"激进的(radical)"社会理论家看作方法上的专家技术论者，只要他们的工作不是以社会行动和"使能(enabling)"实践为基础。换句话说，他们思想中的"激进"事实并不必然代表激进主义从学术争论转变为显性的行动。社会评估实践受益于对社会的批评观，当然也是社会学的批评观。因此，我们在本章中倡导一套新的根基于环境社会学和批评理论的社会评估实践的假设。

社会科学家经常对理论的具体功能进行描述，但并不必然会运用来指导和解释他们的分析工作。其中的一部分问题产生于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所处的不适当地位。理论经常成为自身分析的焦点，而不是为世界的本质提供一套设想并从中得到可以验证的假设。因此，我们看到理论在它自身的范围内被研究(元理论)，而不

是作为审视社会现实的工具。

然而,致力于社会评估具体理论研究的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迪茨(Dietz,1987),历克森等(Rickson et al.,1994),斯洛特威格等(Slootweg et al.,2001)和贝克尔(Becker,2003)。他们的发现有一点是令人兴奋的,即社会评估也许更加依赖于理论和概念模型而不是评估者个人的认知(acknowledged)。迪茨借用哈贝马斯的政策实践方法(pragmatic approach to policy)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历克森等强调理论指导的必要性,并精心构建了社区和组织理论领域的关键(和指南性的)概念,斯洛特威格等为推进社会和环境分析的整合而提出了一个概念分析框架。这些作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正如本章所指出的,社会评估实践的理论基础不是单一的。在社会评估领域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理论的导向和指示作用得到认可。历克森等(Rickson et al.,1994: 89)曾这样描述:"只有通过应用相关社会理论,发展评估的执行人才知道问什么(收集什么资料),并且理解这些资料的涵义是什么。"贝克尔(Becker,2003: 130)指出,具体案例分析的实用概念框架可以源自众多的比较研究。

这一章解释和检视了社会评估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首先简要讨论了社会学古典理论流派的观点,然后阐述了环境社会学的假设。中心主题是一种影响普遍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思路,它为可持续发展和使能实践提供了概念基础。

一般社会视角

既有的社会理论源泉来自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等三个主要古典社会学理论家的思想，汉弗莱(Humphrey,2002)等将其分别描述为保守的、自由的和激进的观点。根据提出新环境范式社会学的卡顿和邓拉普(Carton and Dunlap,1978)所言，这些古典研究都是传统的人类例外说范式(human-exemptionalism paradigm)的一部分。该传统范式以人类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隔离或者超越了自然过程。

有些作者，如基尔马丁等(Kilmartin et al. ,1985：6)，已经注意到新环境范式明显具有人类生态学方案的基础。我们认为人类生态学家是新环境范式的重要思想来源，正如汉弗莱等(Humphrey et al. ,2002)所言，自由和激进理论家同样为环境社会学作出了显著贡献。然而，我们和汉弗莱等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相信有一个新环境范式，虽然它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已经在为社会理论作出重要贡献。所以，我们认为，新环境范式为现存的社会学带来了最为有益的理论提升，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管理社会学和社会评估的基础假设而言(见图 3.1)。

在深入谈论环境社会学范式之前，需要回顾每一种古典的人类例外说(human-exemptionalism)的理论贡献。

保守主义或生态行为学视角

人类生态理论的线索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康德(1798—1857)和斯宾塞(1820—1903)的工作，他们也是社会学保守思想学派的重要创始人。康德详细阐述了关于集体生活的基本统一要素(essential unifying factor)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支配了社会学保守论。在康德的体系中，该基本统一要素是“共识(consensus)”，即共同的习惯、信仰和传统。社会有机体论者赫伯特·斯宾塞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了社会的概念上，认为社会由特殊的功能部分组成，并且每一部分对整体的生存都是不可忽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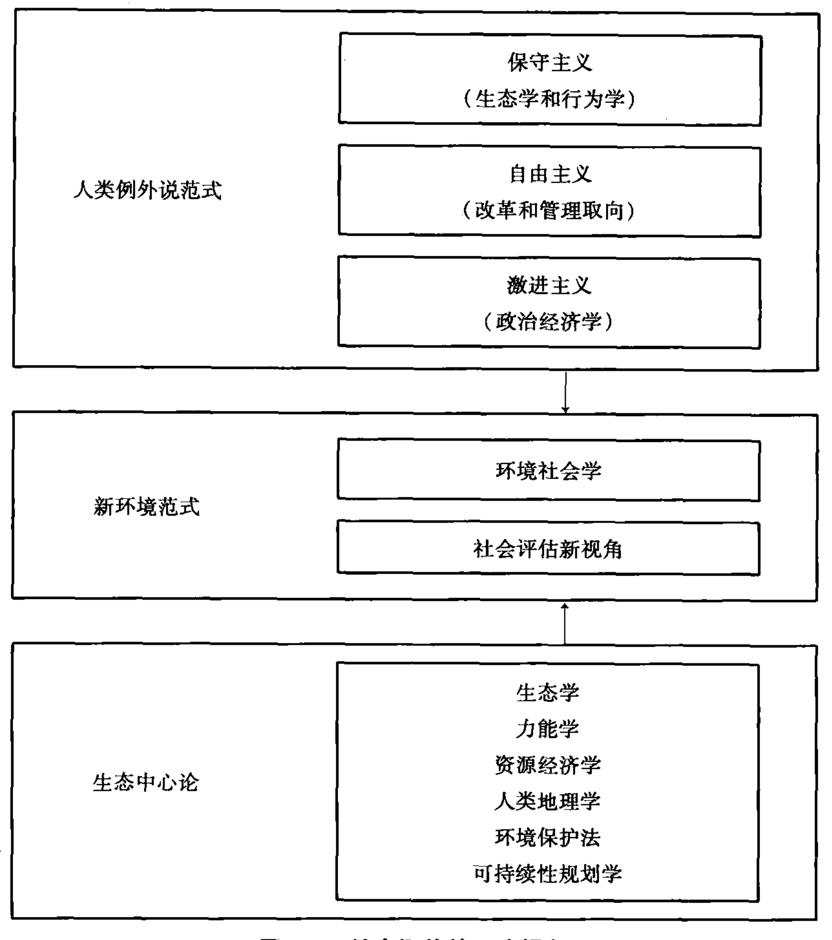


图 3.1 社会评估的理论视角

接下来,涂尔干(1858—1917)把"共识"和"分工与协作"(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这两组概念集合在一起并整合进了一个单一的理论。涂尔干提出了社会所经历的进化次序理论,涉及从共识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到分工与协作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变迁。社会密度(social density)的增加促使了社会变迁,带来了更大的流动人口,其特征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相互协作。

涂尔干的提炼使得利用斯宾塞早期提出的有机体模型并

吸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概念变得容易。类似的研究随后在动植物生态学和人类社会生态学之间展开(Hawley, 1950)。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学派进一步拓展了人类生态学传统的重要工作。该学派的领军人物派克(Park, 1936)认为,人类生态学是将以前用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类型应用于人类的尝试。派克把城市理解为社会解组和物理组合的过程,打破了乡村生活之间牢固和亲密的联系。因此,在派克看来,城市是个体为了基本资源而相互竞争的领域,并特别对市区土地的使用提出了预测模型。

在派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两个思想派别。其一是城市空间分析或称城市映射学派,其中,伯吉斯的研究最为有名。伯吉斯提出的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以中心商业区为核心而向外发射一系列同心圆的形态。其二是以沃思的研究为主导的思想学派,探讨了城市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沃思的工作尤其引发了大量关于"郊区习俗(suburbia)"的研究。基尔马丁等(Kilmartin et al. ,1985: 8)将现代社区规划和发展的兴起追溯到该学派的传统。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在城市生活有损人际关系、支持网络等的假设下,人们为创造社区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公共和志愿机构及其"社会福利"方式也受到了这些模式的驱使。

最重要的是,人类生态学观点引入了社会系统的概念并提出了关于社会-环境关系和社区动力学的见解。这些思想都被下文将要讨论的新环境范式所采用。

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视角

对人类生态学和行为理论的批评指出了它囿于生态决定论的保守性而没有看到在竞争的概念和益处之外去理解社会冲突以及权力集团的控制。韦伯(1818—1883)的早期研究为对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城市冲突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新的分析提供了基础。通过培育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韦伯促进了对作为权力和控制工具的官僚制(科层制)的理解和接受。

在现代工业社会,分等级、非个人式科层制成长为组织变迁的主要形式,越来越多的研究因而聚焦到体制结构,也就是

管理精英控制的结构的生长。也有不少工作致力于结构的改革以调整资源的分配。最为特别的是,人类生态学家的"自由市场(freemarket)"哲学被摒弃一边,而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计划的国家干预不断增强。

可以结合制度分析去理解历史为本的支配范式(historically-based patterns of dominance)。精英群体通过继承权威、权力和地位而增强他们的支配能力。因此,韦伯的生存机会(life chance)概念十分重要。韦伯的理论还揭示了权力在合法化稳定之后能够促使社会群体的差别分层。这些思想促进了关于社会制度在公正分配自然资源,包括住房、教育和健康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失败的分析。

因此,改良的资源管理和规划,包括诸如三条底线(triple-bottom-line)的财务原则,成为自由主义者改革论的基础。他们同时强调公众更多地参与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和私营公司的相关决策和政策过程。

激进论或者政治经济学视角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社会学的批评更为广泛。批评者提出了整体社会的观点,并将其构成作为先进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诸如新技术、居民进城和郊区发展,或者工业工程在建和重组等变迁被视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干预力量而不再是潜在影响因素。因此,计划被看作资本家组织的一种手段。在这种范式中,社会变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激进的社会变革。

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中,社会的五大主要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连环体制: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和合法化。这个体制一旦出现危机,私人部门、国家和劳工部门一般会相互协作以避免大的冲突(如达成共识),从而维持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从资源到商品的生产是第一环节。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自然资源是高度固定的,劳动力通常是固定的,只有资本是高度流动的。因此,生产趋于转向劳动力价廉的市场、资源价廉或者丰富的市场,从而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生产

环节的转移也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可行关系密切。

交换、流通和消费是运输、营销和消耗初级产品的三个环节。其中,时间和成本变得十分关键,因为它们的结构对产品从制造者转到消费者的价值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城市是重要的,因为市区形态和基础设施影响了劳动力、产品和消费者的流动。个人消费得到鼓励(如低密度的住房、私人汽车、业主所有权)。国家以集合方式为私人资本提供恰当的公共服务(如教育、排水装置、公共运输)。信用对现代流通和消费至关重要。在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信用体系迅速扩张,为消费的增长提供资金。

合法化是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环节。合法化包含诸如法律(法院、警察等)等制度建构以防止激进变革并强化体制运行的过程。合法化过程确保整个体制受到尽量少的质疑,并使环境和社会成本实现不均衡分摊。从意识形态上看,私人财产收益和个人主义受到保护,特别是通过家庭所有权的方式。

激进论的主要长处之一在于它能够提醒社会学工作者关注权力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重视诸如发展的获利者和失利者的确认等问题。该观点强调经济决定论,在长期规划上存在忽视资源限制的倾向,而且把社会群体和社会运动等关键因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降级到了次要的地位。

新环境范式

新环境范式包含了环境社会学的观点并吸收了生态中心论的不少原则(图 3.1)。

环境社会学

卡顿和邓拉普(Carton and Dunlap,1978)在社会学理论背景下提出了对新环境范式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观点。他们认为前文讨论的三种古典学派的共同点都是以"人类中心说(anthropocentrism)"作为其世界观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代表了

人类例外说范式(human-exemptionalism paradigm)的不同部分。卡顿和邓拉普指出应该更多关注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和热力学定律。

环境社会学的核心观念在于坚持社会系统和物理系统及生物系统具有显著交互作用,反之亦然。因此,环境社会学假设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交互关系(Duncan, 1961; Schnaiberg, 1975; Catton and Dunlap, 1978; Humphrey and Buttel, 1982; Humphrey et al., 2002)。人类生态系统成为物理、生物和社会体系交互作用的设置。这个观点对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地理学者和环境社会学家并不陌生,它曾被应用于许多户外休闲研究以及自然资源规划与管理的社会学实践。

给定这些相互关系,环境社会学家在他们的分析中加上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实,或者更加正统地说"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他们能够这样做,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们的兴趣在于社会和环境相互关联、文化价值和信仰引导人们以特别的方式使用环境,以及环境使用对社会共识和冲突的意义(Humphrey et al.,2002)。另外,环境社会学家还对社会-环境关系的动力学有兴趣,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生物-物理系统(E)的改造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S)后果,反之亦然。

$$\frac{\Delta S}{t} \Leftrightarrow \frac{\Delta E}{t}$$

因此,正如斯洛特威格等(Slootweg et al.,2001)所言,社会变迁过程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既产生于生物-物理环境的变化过程,又产生于社会变化之中。

这一整合的视角激励环境社会学家对社会的和经济的"进步(progress)",尤其是那些借此将工业化社会视为"摆脱"(free from)了生物-物理环境限制的所谓进步提出质疑。可以比较的是施耐伯格(Schnaiberg,1975)的社会-环境辩证法,它包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生态破坏将导致社会分裂,反之亦然。施耐伯格指出,在经济扩张主义者的社会性目标和为此扩张提供原材料的物理-生物基础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简而言之,

这是零和游戏，正如第二个热力学法则所阐述的，获取或使用得越多，留下的就越少。后来不少社会和环境关系的评述者都遵循了这一基本前提。

承载力

在考虑施耐伯格的可持续发展辩证法的意义之前，思考其他一些来自生态中心论并经常被人类例外说忽视的关键概念十分有益。来源于物理-生物学文献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早在 1929 年，承载力概念就被应用于人类-环境关系的分析，如国家公园用其来分析游客数量对植被的影响（Verberg, 1975）。卡顿（Catton,1983）强调承载力概念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物理限制的理解是新环境范式的基础。卡顿将承载力定义为特定环境的使用量（给定种类）能够年复一年持续而不降低其使用的适宜性。应当指出，卡顿（Catton,1980）在他的著作《过度行动》（*Overshoot*）中提出了超越该定义的其他概念。

鬼田及其限制因素

鬼田（ghost acreage）①［或称幻影承载力（phantom carrying capacity）］是伯格斯特罗姆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概念。他把鬼田进一步分为“贸易性面积（trade acreage）”和“捕获性面积（fish acreage）”，意指社会可以通过交换富裕或短缺的资源，或者通过公海捕鱼等方式增加土地的承载力。因此，人口特别稠密的国家可以从公海和贸易中获得包括食物在内的产品。卡顿（Catton,1980）在伯格斯特罗姆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化石性面积（fossil acreage）”或者“从过去进口（importing from the past）”的概念（或者，我们可以提出，未来对目前资源的消耗也对我们后代的资源使用施加了限制）。

---

①琼斯（E. L. Jones）用“鬼田”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这些新的林地、农田和园地并不存在于欧洲，但对欧洲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好像增加了欧洲的土地，因而被称为“鬼田”。参见 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9 May 1981). ——译者注

卡顿还阐述了李比希限制因素概念的重要性:“对环境承载力而言,最低丰富利用(相对于每个单位资本需求)是必要的设置。”(Catton,1980:158)因此,尽管鬼田概念认为人类可以超越限制因素的设置而增加土地的承载力,但是,正如卡顿所言:“贸易并不能否定李比希定律(Liebig's Law)。”所以,只有理解了李比希定律,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贸易在生态和社会维度上的真正作用。

社会承载能力

在这些定义中显著增加社会因素十分重要,“社会承载力”原理因而被引入其中。人们一般认为承载力应当和不同社会群体活动的使用者满意度相连接(Bryan, 1983)。该原理关乎双重考虑。其一,如果维持可持续性,环境的使用形式和使用量不应当危害持续使用。不过,鉴于物理-生物限制决定了可持续使用的承载力,社会承载力就形成了对人类满意度的制约。此外,这些概念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物理-生物性承载力可以超越社会承载力,反之亦然(Bryan and Taylor, 1987)。

文化生态位(cultural niche)概念扩展了对社会承载力的理解,其思想涉及环境对不同类型的使用和不同的使用者群体具有不同的含义。反过来看,社会的组成中包含了众多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文化特质和不同资源需求的群体,社会群体文化生态位的不同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特征:社会组织、技术和宇宙观等的结合体并与生物-物理环境保持的关联。尽管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者可以详细描绘出许多前工业社会的文化生态位,特别是针对岛屿社会,但是在全球社会-生态系统内诠释一个后工业社会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任务。

尽管生态系统相同,但不同的群体可以定义出不同的生态位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不过,这些生态位可能相互交叠,并引发竞争和社会冲突。无论从共时性还是从历时性上说,资源的不同使用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例如,在沃田上露天开挖煤矿排除了当前使用土地来种植庄稼以及未来对存量资源(stock resource)的使用。修建河坝将结束基于迸流特征或肥沃河漫

滩的原生态系统应用的可能性，但是，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和新的资源或者潜在的文化生态位将被创造出来，如水库渔业、娱乐休闲和运输业。

通过专业化(specialisation)概念可以增加对具体生态系统中社会冲突的理解。专业化概念的最初是带着社会科学的光环走入户外休闲的管理(Bryan, 1977, 1979)，但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多种领域(Bryan and Taylor, 1987)。它的原则是，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有关资源设置的选择和行为，会随着他们的专业化水平以及所处的休闲生涯(leisure careers)的变化而变化。其中的自变量是人们卷入的程度和对活动承担的义务，以及受到此类因素影响的运动机会的获得和体格力量等。

从资源平衡方面来说，一个关键的原则是生态系统具有满足从完全一般性到特别专业性使用的潜力。资源使用越专业，文化生态位的边界变得越狭小并和特殊资源特性的关系越密切。专业化使得生态系统使用的满意度成倍增加，社会承载力增强。此时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持更多的专业使用，或者说更能满足从一般性到专业性的各种使用。

当两类高度区别或者相互排斥的专业性使用同时出现时，关于资源使用的激烈社会冲突就可能产生。而当仅能满足很低专业化水平使用的资源可以由许多不同的生态系统替换供给时，即提供了替代使用的基础，冲突就可能避免。专业化随着一个生态系统内限制性因素的种类而变化。例如，资源的使用取决于水，诸如人类定居、农业灌溉或者热力电厂在一个干旱地区是高度专业化的使用，尽管这里空间广阔。然而，在一个周围是淡水的小岛上开展这些活动同样是高度专业化的使用，因为这里虽然没有水资源限制，但是空间十分有限。

可持续发展

社会-环境辩证法

人类使用环境的限制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的程度由

物理和社会双重因素决定。施耐伯格(Schnaiberg,1980)鉴别了对人类生物性生存的主要生物圈威胁,从而给这个限制性因素的定义增加了新的含义。这些包括,诸如:

- 致癌物质和环境毒素的产出。
- 瓦解和摧毁目前的食物生产系统。
- 破坏未来的食物系统。
- 毁坏水文系统。
- 对人类生活环境有害的气候变化。

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社会致因性(socially-induced)限制因素,或者是现实的适应性改变(real-adaptation)。它们反过来可能对生产和经济形成威胁,如带来:

- 失业。
- 收入减少和贫困。
- 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下降。
- 公共服务有效性下降,成本上升。

尽管施耐伯格的社会-环境辩证法包含了这些因素相互关系的逻辑,但是制定可持续管理和规划的原则,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保持对接依然十分重要。

施耐伯格的辩证法提供了下面一套假设:

- 经济扩张必然需要增加环境"索取(extraction)"。
- 增加的环境索取不可避免导致生态问题。
- 这些生态问题对进一步的经济扩张形成潜在制约。

过去的和目前的发展计划大部分忽视了这一辩证法。

社会-环境辩证法的应用

卡顿和邓拉普(Catton and Dunlap, 1978: 46)认为施耐伯

格辩证法的三个假设和不同的发展战略有关：

- 经济综合体（an economic synthesis）：忽视生态断裂，追求最大经济增长。
- 弥补短缺性资源的综合体（a managed scarcity synthesis）：对使用和滥用资源造成的比较明显的生态断裂影响进行控制。
- 生态综合体（an ecological synthesis）：通过控制生产和商品消费，围绕保存率管理资源，生态断裂减至最小。

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两种综合体。我们认为今后社会评估实践必须表达第三种综合体。环境社会学的不少概念都寓意：以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将导致不可预期且通常是难以忍受的后果和结局。我们的分析框架也指出其中包含社会性的影响。经济增长通常是一种利益机制相对于另一种利益机制的优势论表达，它不仅反映了"绿色主义者（greenies）"和"增长主义者（growthists）"之间的争论，也揭示出"增长主义者"内部对稀有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存在不同声音和派别。例如，在新西兰，资源管理法案（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1991）从表面上看是稀缺性管理的制度，但在某些方面通过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综合了生态力量的作用（见个案研究 1.1）。无论如何，实践中的立法在很多方面为调和不同观点和派别之间关于资源规划和使用的冲突提供了方法。

在检视以技术变迁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社会逻辑依据（social rationale）时，有必要指出新技术需要新市场，这个新市场依靠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和相对比价而激发。其中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即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采掘业（extractive industries）和制造业不断下降的就业量减弱了消费需求。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部门，长期规划的实质性难题是不断增加服务部门的就业量，增加无能力参与工作群体的福利金，同时还需要维持适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化范式，以提高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

费量。

因此,当技术变迁集中于不断扩展的服务领域和相关的基础产业(如能源、运输和通信等)时,需要对社会的维护选择进行反思。可以理性地推测,制造商为促进一个消费社会而不断努力,但会受到市场和政治因素的制约。如果增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良存在限制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促进产品扩张同样也需要限制。

至少可以通过两个"管理(management)"策略来克服这些限制。第一个策略来自"底层",广大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和劳动者团体通过改变生产和消费结构来应对消费社会的挑战。例如,在一种新的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的工作创造的基础上,人们成立各种合作组织、劳动联盟和其他类型社会系统的兴趣不断增加。第二个策略来自高层,国家可以通过增加用工、促进农业可持续性、推广软能源(soft energy)应用和循环利用等活动,努力促进社区发展。

关于这些模式的思考,我们同意基尔马丁等人(Kilmartin et al.,1985)的观点。基尔马丁在讨论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时指出,维持计划和消费者主权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循环的主题。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经常受到资方和劳方之间社会合同需求的调和,以创造促进增长和全员就业的条件。这些政策有时也经由社会民主党有关主张的润色。然而,在目前关于经济和技术变迁方向的广泛一致认可非常难以取得。

发展和欠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模式需要考虑在不同社会内部和彼此之间发展状况的不平等分布。简单说来,发展理论关注欠发展国家突破中央或"核心(core)"经济体对外围地区(peripheral regions)的系统性剥夺而实现的起飞。最简单的例证来自对中央经济体和它们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分析。

核心-外围关系(core-periphery relationship)的分析详细说明了赢家和输家的特点,只要这种关系存在。它同时也指出了哪一套价值观和目标将主导利益冲突。这种欠发展国家的发

展模型通常应用于跨政治边界分析，阐明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关系。然而，关于核心-外围关系分析的提炼也有助于理解通常在政治边界内发现的不同的发展水平。在此，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资源为本(resource-based)的行动，其中，许多负面的外在性或者发展的社会成本落在提供产品原材料的外围地区。

诸如新西兰西海岸(案例研究 3.1)地区经济发展盛衰周期的经验，为煤等原材料的开发是为了满足其他区域和海外的有限利益的观点提供了例证。在这样的资源开发关系中，外围地区的价值只有在原材料可以经济地开采并运输的同时才能维系。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煤、金、木材和水产的持续损耗已经引发了产品的多种外部成本，并且，资源枯竭的代价最终由外围地区承担。

新西兰大工业时代的重点能源工程见证了能源开发中资本和劳动选择性注入引发的地区之间的差异(Taylor and McClintock,1984)。能源富裕地区在人口增长和投资方面获得了"利益"。事后看来，这些工程很显然影响了相关地区"赢家和输家(winners and losers)"范式的形成。重点能源工程社会效应的评估也证明了社会问题的产生，确认了受到影响的主要群体，并且强化了应对策略(Conland, 1985)。毋庸置疑，我们注意到早期社会评估工作在事后才实质性执行，建设工程衰退期并发的和反应性的社会影响焦点强化了这种趋势。

资源型社区的社会评估过程和周期

由能源工程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社会评估的常见焦点。这类变迁发生于作为人类社会及其生物-物理环境交互作用界面的"资源性"社区。现存的综合社会数据见证了资源型社区的快速人口变迁(Weber and Howell,1982; Bowles,1982; Taylor and McClintock,1984; Freudenburg,1986;Taylor and Fitzgerald,1988; Taylor et al. ,2001)。一般而言，资源型社区的发展周期必然包含新工业和工厂的建立，劳动力和资本在某一地点大量聚集。当资本和劳动力开始减少后，工程运行进入重要的项目缩减时期。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平稳运行，随着资源的枯竭、

技术的变迁或者市场的变化,工厂关闭阶段来临。在变迁的这些主要阶段中间,一般会执行或应当执行社会评估,以保持社会发展的相对平稳。

第1章曾经指出社会评估在某种意义上围绕新工程建设而开展。建设工程的开始阶段往往呈现出人口快速增长、劳动力瞬间聚集、社会服务短缺等特征,而随后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招募操作工人、提高人口结构合理性和改善社区服务,直至一个稳定的社区形成(Lucas, 1971)。该模式扩展后可以包括资源枯竭之后的社区衰退(community decline)或简缩(Bradbury and St. Martin, 1983),或者包括劳动力实质性减少之后的技术和市场变迁。因此,社会评估者对工厂关闭或者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政策根本性改变之后的资源型社区发展的认知不断增强。由于条件变化导致的某些特别的社会影响是盛衰周期变更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关于工厂收缩和关闭,以及社区衰落的文献比比皆是(Ekstrom and Leistritz, 1988)。社会评估者已经针对资源循环阶段各种变迁对个人及社区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应对方法,并且认识到需要采取相应方法促进社区再生和当地经济发展创新。

泰勒和菲茨杰拉德(Taylor and Fitzgerald,1988)对资源型社区变迁的循环模型进行了修订,提出许多地区经历了系列性循环和相关的社会变迁。应当指出,在一些特殊区域,若干不同的工业项目可能以各自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时运行。尽管这些项目对当地的影响各自有过评估,但仍然需要对它们整合的总体影响进行评估。各种变迁的起源可以归结为同样的宏观因素的作用,因此,对社会评估的执行者来说,认识和阐述这些因素,形成能够处理变迁累加效应并具有很强预测功能的社会评估方法至关重要。循环周期中每一时点的事件对资源社区中不同的对象具有不同的意义。社会评估实践者必须对变迁周期保持敏感,因为不同的周期阶段需要不同的社会评估方法,如图3.2所示。煤矿城市鲁南加的历史演示了循环周期的主要过程(案例研究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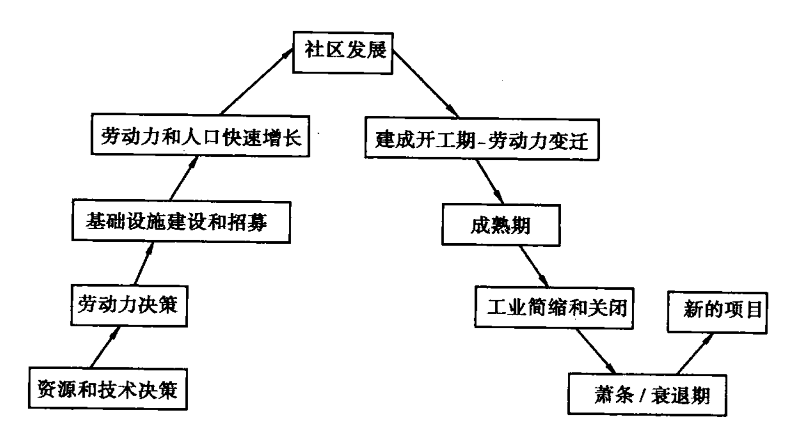


图 3.2 社会评估和资源型社区周期

案例研究 3.1

煤矿城市鲁南加,新西兰

从 20 世纪初期到 60 年代,煤炭是新西兰交通动力、工业能源消耗、家庭取暖和燃料等方面的主要资源。诸如南岛西海岸的格雷默斯城等一批煤矿社区围绕大型煤田成长起来。然而,随着煤炭使用范围的缩小,老矿井,特别是西海岸矿井成本效率比的下降,大型矿井一个接一个被关闭。煤矿的减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政府将煤炭管理机构重组为煤炭公司之前达到顶点,矿山相继停产,工人锐减。传统的小型采矿社区,诸如格雷默斯城附近的鲁南加/唐诺利矿井,承受的影响最为具体,因为较早公司化,大力士矿井 174 名付薪劳工中只有 46% 的劳动者继续在此生活。到 1988 年下半年,矿井的从业人数减少到 22 人。

将 25 年的缓慢衰落及在 80 年代的快速停产与新的煤矿风险投资提案的可能影响相比较,煤炭开采业的重建过程显得具有戏剧性。风险投资关注新的市场、公司结构和现代采矿技术。大多数情况下,新的投资出现在和煤炭资源利用相关的地区,但需要的劳动力非常少。例如,鲁南加附近的一个煤田每年开采两百万吨原煤用于出口,该工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最初提出时曾引起争议。现在新煤炭公司(the

new Coalcorp)和日本公司共同组建了一个合资公司。根据提出的开采计划,工程吸收劳动力规模在400人左右,开采期限20年。它为西海岸的采矿业注入了新技术,老式煤矿的矿工如果没有经过足够的培训很难被雇佣。该项目深受政府计划中的私有化方案、开采的技术性障碍以及海外市场风险的影响。因此,新的矿井未来的发展,无论是开工、关闭或者再开张,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

假定社区中的居民能够理解所经历的循环变迁,那么确保社会评估以主动的方式执行具有很大的潜在意义。掌握了资源循环的周期,评估者可以给受变迁影响者预先提示,并帮助他们更加具有创造性地管理变迁。泰勒和菲茨杰拉德(Taylor and Fitzgerald,1988)指出,目前许多社会评估基本上属于被动反应一类,但只要进一步扩展思路,详细阐述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依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相反,随着时间的过去,如果缺乏对社会变迁的主动分析和对自然资源政策的积极思考,社会评估至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强化了现有的变迁模式,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

社会评估的参与性、前摄性以及社会与环境共同发展的取向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本章讨论的整合性理论视角将促进整合性的制度思路(Dale et al. ,2001)

关于自然资源政策的整合思路包括环境、经济和社会政策。它强调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相关主题、扇形发展(sectoral development)和区域变量在发展层次上的作用。通过整合,可持续性政策需要关注以下因素:

- 可依赖性/自治性,包括社区和家庭对于有限或者不可持续资源储量的依赖程度、经济多样性水平、技术和技术变迁的性质及其控制、决策的外部控制性等。
- 地方或区域资源规划,包括分区制、经济手段以及对发展累积效应的评估和管理。

- 区域发展和区域援助的社会愿望,区域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效率的促进,援助目标的优化,国民经济集中增长和城市化的不经济。
- 就业和生计,农村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和分割,不稳定对农场工人、妇女或原住民等特殊群体的影响,社会正义问题,工作和社会组织范式。
- 小企业发展,企业研发资助,农村集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商业化运作,包括信息和通信在内的资源和技术。
- 道路、品质水和排水系统、治安、露天场所和娱乐设施等家庭和居住基础设施。
- 社区发育能力,包括领导能力建设、社会服务的维持、基础设施和服务成本、社区发育能力和经济活力之间的链接、社区参与以及当地社会发展的需求。

这些因素将影响社会活力、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因此,当地社群参与政策制定的程度十分重要。例如,威尔金森(Wilkinson,1985:348-349)提示我们:农村社区曾经一度被描述为“亲密无间(close knit)”和“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但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情况从来不是这样。相反,我们认为很多地方的社会关系更接近松散交往和相互依赖。多样化和碎片化的社区见证了区域的盛衰轮回,尤其是贫困周期的延长,这对“自下而上(bottom-up)”的自然资源政策形成方式和社会评估过程形成了挑战。

社会评估的使能实践

在理论假设和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社会评估实践具有重要的含义。对社会评估者而言,尤其要审慎梳理每一个项目的制度性和政治性背景,关注项目进展中可能遇到的约束和机会。其中,理解信息的角色和作用最为重要。

例如,泰斯特(Tester,1985)提供了新西兰的一个具体案例: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共谋信息失真,根据局部资料操纵决

策。这类现象在1970时代晚期至1984年间的"大工业"发展期尤其常见,以至新西兰特别出台了国家发展法(1979)作为工具来控制涉及公共利益和环境影响的决策。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社会评估却在新西兰兴起,并呈现出更多的参与特征,在取向上更加注重项目过程而不是结果本身。这一重点的转变是每个社会评估从业者、社区组织共同努力的成果,尽管此时的社会评估在本质上依然是对社会影响的被动式回应。

泰斯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计划者需要用批判的眼光仔细审查自由福利体制的基础假设。对福利国家财政危机以及同时发生的私营部门重构的反应通常表现非常有限。其内在的"理性的(rational)"思维因为决策制定和管理过程中缺乏社会知情过程(socially informed process)而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模式中,假设政府的功能是以某种方式调整以适合"服务(server)"整个社会更广泛的利益,而不是部分群体的狭隘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失去了理性。例如,对跨国公司"有益(good)"的举措不一定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它的环境有利。

因此,关于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公民利益的仲裁者和谈判者的观点在许多正经历广泛而快速社会变迁的国家的作用十分之小。在这些国家,数量不等的机构和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社会变迁的管理,包括发起和支持社会评估。其间,社会评估的"使能(enabling)"实践成为对社会变迁更加全面性社会反应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使能实践由福雷斯特(Forester,1980)提出。在检视了计划编制实践行动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含义后,福雷斯特指出:"计划编制行动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沟通性的。"沟通应当是政治性行动,所以福雷斯特认为哈贝马斯的社会沟通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在讨论计划编制实践中最为重要。而且,按照他的解释,沟通理论不仅对"经验性、解释性和规范性"问题具有直接作用,而且对计划实践的区分、发展新的思路等促进效果明显。福雷斯特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阐述了为什么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应当被理解为沟通结构。在这些结构中,信息在计划和决策过程中可能会因

为不同群体的权力或影响而受到扭曲。

哈贝马斯理论的“螺旋母线(spiral element)”存在于“失能和使能的双方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官僚政治的或者资本主义的、不民主的制度所导致的沟通能力的缺失，另一方面是民主政治的批评制度、相互的理解合作、依据自决的共识所带来的集体使能”(Forester, 1980: 276)。福雷斯特认为，尽管在政治经济系统内部对一些信息的曲解不可避免，但其他部门不是这样。许多信息的扭曲设置和围绕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意识、消费者和市场导向的决策制定以及资源开采与使用，都可以通过加强沟通的实际过程得到解决。

福雷斯特提出了可以阐明沟通和建立社会评估"使能"实践的基本方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信息、程序，或者社会评估的报告都可能变成连续的失能实践的一部分。表 3.1 和表 3.2分别提供了失能沟通和使能沟通实践策略的案例。在社会评估实践中，有必要对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策略和有利于促进参与信息的功能提高认识。这是我们在讨论社会评估过程的观点、集中和分发社会评估工作信息的方法以及受影响群体能够采取的策略时贯穿本书以下内容的一个关键主题。

表 3.1　十二种反参与的基本手段

1. 先做后说(Act now, argue later) 最简单、最有效的手段，如果你能成功使用的话。如在不让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在人行小径上建起房屋，砍倒受保护树木，或者允许推倒受保护的建筑。如果幸运的话，环保主义者发现后为时已晚
2.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 另一个老套手段，从罗马时代就有。它的最新的表现形式是“选择一条线路(Choose-a-route)”把戏，把高速公路反对者分裂成三个或四个小阵营，让他们内讧
3. 假选择(The bogus choice) 与上个计谋同属一类。收集所有可能的选择，但不包括不想让公众考虑的那一个。找一帮傀儡给每个方案编上号，提供给公众选择
4. 马可术(Markmanship) 即(圣经)马可福音第 4 章第 12 节所谓的“让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明白”，最常见的，但不是全部，政府布告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撰写的

续表

5. *石墙术*(Stone wallmanship)
   另一个老歌金曲:唯一需要的是一个废纸篓
6. *踢皮球*(Passing the buckmanship)
   这里有两个小计策:直接踢球法(那是某某部门的责任)和委婉踢球法,后者应用于政府官员和议员之间。官员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应该由议员们决定政策,我们的工作只是执行。"议员说:"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雇佣了专家提供政策建议,如果不接受专家的建议是愚蠢的。"
7. *果酱明天有、昨天有,但今天没有*(Jam tomorrow and jam yesterday, but never jam today)
   告知想要成为参与者的人们计划早已执行,应该早期来观察;或者说那还是某位人物的一闪念头,不可以过早评论。也就是说,参与的最佳时机总是在过去或未来
8. *装糊涂*(Confusionism)
   冗长、细致的回答但内容几乎(但不完全)是社区已经得到的
9. *光说不练*(Nice chapmanship)
   给郁闷和愤怒的房主一封抚慰信,称他们的提议会得到最全面的考虑,但是辅路在几年内不可能建起来。事实上,只要能让他们闭嘴并回去休息,什么安慰的话都可以说,但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10. *软钉子*(The cotton-wool wall)
    如果光说不练没有奏效,要表达对提议者最大的谦恭和体谅,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仔细聆听他们说的每一件事,然后走开,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11. *走开,你这个粗鲁的小男孩*("Go away, you rude little boy")
    "我们总是听从可靠的评论,但是当你们的信中伴有冷嘲热讽时,我们很少这样去做。"实际上这是承认失败(当然,富有经验的环保主义者不会想写一封粗鲁的信,相反,争论越激烈,语言会越客气)
12. *我只是想帮助你*("I'm only trying to help you")
    邀请反对者赴约,或者在调查休憩期间约他们出来,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做出让步,否则他们将失去信用,成为笑柄,等等。不推荐这一计,除非你的对手毫无经验,否则其他任何人都会正确判断并识破你的伎俩

资料来源:Howard,1976

表 3.2　沟通策略,促进参与的手段种种

1. 培育社区网络(Cultivate community networks)
   扩大联络和接触,而不是依赖文件指令,既要提供又要传播信息
2. 仔细聆听(Listen carefully)
   在计划阶段评估所有参与者的顾虑和利益,预期可能出现的政治性障碍、竞争和机遇
3. 早期通报(Notify people early)
   在计划阶段早期将可能的后果通报给低度组织化的受影响者(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已通过正式渠道获得相关信息,不需要特别关注)
4. 培训(Educate)
   对市民和社区组织进行计划过程和"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的培训
5. 提供信息(Supply information)
   为市民提供相关技术和政治信息,使他们知情,有效参与
6. 领会(See...)
   社区邻里和非专业组织都已积极获取公共规划信息、当地习俗和计划、相关会议的通告、机构的资讯,以及"专家(specialists)"补充的"个人的(in-house)"专门知识
7. 鼓励(Encourage...)
   社区为本的组织都迫切要求公开提议工程及其设计可能性的全部信息
8. 开发技能(Develop skills)
   你需要掌握在冲突环境中与其他群体一同工作的技能,而不是期望主要从单独的技术工作中获得进步
9. 利用非正式渠道(Use informal channels)
   关注社区利益,强调非正式渠道有效参与工程评审的重要性,采取措施保证变迁设计协商会议对专业性、无背景群体的公正性
10. 保持独立(Be independent)
    鼓励基于社区的独立项目评估和调查
11. 保持政治灵敏(Be politically sensitive)
    预期外部的政治经济压力将型塑工程决策,提倡"压力转化为动力(pressure we can use)"(如抵制既有的反公共利益行为),而不是试图完全降低外部压力

资料来源:Forester,1980

结 论

我们从社会科学中吸取了理论思路和基本假设。众所周知,环境社会学理论和假设的典型学派都尊奉社会和环境之间存在广泛而深入的相互作用的理念以及生态中心论的视角。经济发展和欠发展的理论以及基于自然资源利用的社区变迁周期的知识,有助于对可持续发展框架形成确认,社会评估主动出击的贡献也在于此。理解沟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管理的重要性是社会评估使能实践的基础。

我们并不认为仅仅依靠这些理论思路就可以改变现存的不可持续发展的范式,但我们认为如果被动、狭隘的社会评估忽视这些理论思路将进一步助长现有的不可持续发展策略的蔓延。随着进一步发展,一套新的条理分明的假设将为社会评估的未来思路提供概念基础,并帮助从业者献身于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未来的环境管理。相应地,这套新的假设应当在整体上对促进社会学新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应当对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有更好的诠释。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用于建立社会评估主要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

在社会学中,存在一组庸俗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性理论,将人类生活孤立于自然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些理论都可以归结为人类例外说范式,包括基于涂尔干(保守主义的)、韦伯(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激进主义的)等不同思想的各家理论。

一种关于环境和生态过程独特视角的新的环境范式已经在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它强调社会系统对生物-物理环境的依赖性和发生于生态系统内部的交互作用,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新的环境范式提出了诸如社会承载力和可持

续性等概念，承认人类活动的社会、经济、生态背景。

施耐伯格的社会-环境辩证法链接了生态和社会变迁，有助于解释可持续经济发展受到的限制所在。从该理论观点中产生的综合体范式提供了从经济——稀缺性管理——生态的众多不同发展策略。发展和欠发展的理论以及资源社区概念被引入分析框架，用以阐述积极和消极的、区域之间的、跨越社会部门和时空的不同影响的差动效应（differential effects）。可持续性发展政策要求对社会-环境关系进行批评性分析。

通过检视计划编制实践中的批判理论以及关于信息、影响力和沟通角色的观点，可以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重要链接。

第4章
社会评估过程

The Social Assessment Process

本章探讨社会评估的实质过程，以回应我们在第2章提出的关于社会评估取向的理解，以及第3章阐述的使能性的、前瞻性的和整合性的环境评估的思路。尽管目前人们对社会评估过程的主要元素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共识，但因为该领域在不断发展，社会评估实践依然受到其中概念模糊性的羁绊。我们将投注精力讨论文献中的那些矛盾之处，而我们的核心论点是社会评估在实践应用中存在一个简单而合乎逻辑的代表性方法。对此，我们在表述上进行了重新提炼，不过其框架自1990年该书首版以来并没有改变。

评估过程必须真正做到跨学科，全部组成部分都明确经过整合。我们认为所有的环境变异都会产生社会影响。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分析的焦点都必须是社会性的，但是，所有的环境结果归根到底应当被视为社会性的或者具有潜在的社会影响。例如，一个大型木材加工项目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它对水域和渔业的影响，包括由此带来的经济和其他社会衍生后果。分析（包括环境治理）应当集中于集材道路的位置和设计，以及提取技术是否能够减少土壤侵蚀和溪流淤积。但是，它涉及伐木业最终的人类和社会蕴意，所以应当启动社会影响分析。如果涉及濒危物种将成为伦理和道德问题，或者成为维护人类内在福利的责任问题。这样考虑的最终和最根本的理由与人类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有关，其中，濒危物种就像“煤矿中的金丝雀（canary in the coal mine）”一样珍贵。

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强调,不应当被错误地和秉承以所有生物相互依存为核心理念的新环境范式原则相对立。事实上,影响评估的真正本质是帮助人类对牵涉自身未来的环境变化因素做出明智的决策。另外,正是评估者将人类行为的效果分离为"环境的(environmental)"和"社会的(social)"类别导致了认识混乱和对评估过程的最终破坏。在美国,关于认识混乱的一个典型例证来源于为了保护环境而暂停西北太平洋地区木材采伐的争论,其标的是保护北方斑点猫头鹰。因暂停或减少伐木而可能失去工作的一方抨击了对方的观点,指出停止伐木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福利和生活方式,从而反对保护"几只丑陋的鸟(a few ugly birds)"。另一方反驳指出,为了人类未来发展渔业和观光业的选择而保护整体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新的产业基础依赖于老树的数量和品质。这一利益计量远远超出对方目前看到的处于衰退行业中的短期内工作机会的损失。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最简单易行的回应对方观点的方法是,在没有转化为社会涵义之前停止讨论单纯的"环境的"(即生物-物理的)或经济的效果。一个全面构思的影响评估将评价人类行为结果的多面性,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简而言之,为保持政策和决策的适用,环境效果必须通过社会评估程序转化为社会蕴意的效果。这种转化需要高水平的环境和社会评估的整合。

评估过程的目标

本章特别关注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因为此时此地形成的基本原则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一直到现在。关于在新西兰建立一套条理清楚的社会评估实践方法的尝试首见于出版物《新西兰的社会影响评估:实践方法》(*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New Zealand-a Practical Approach*)。该书的编撰者是一群社会评估从业者,包括第 1 章提及的新西兰社会影响评估工作组的成员。书中大量的内容讨论了"大工业(think big)"时代出现的各种影响,将社会评估过程描述为"检视意向工程和政策对个体、群体和社区可能造成的效应"(Conland, 1985:3)。

在其他许多著作中,关于过程的定义清楚地讨论了"意向(intended)"行动,我们在此提出的过程概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演示了项目在发展中所经历的主要系列阶段,以及在每一阶段所应采取的社会评估内容。这些阶段是:

- 前期调查以确定发展所依赖的资源。
- 决策资源如何使用,特别是选址建造用于提炼或开发资源的工厂。
- 工厂建造。
- 基本建设逐步完工。
- 工厂开工。
- 工厂关闭。

据建议,"所有建设阶段都会对居住在工程点附近以及项目所在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影响",但是"可以采取相应步骤和措施保护社区,以免主要工程产生不希望且可能是不可恢复的社会效应,当然积极的影响除外"(Conland,1985:2)。可以采取的步骤和措施包括:

- 问题和结果的早期预计和确认。
- 完善的信息基础。
- 中央、地方以及区域政府和发展商之间的协调。
- 当地居民的决策卷入和对发展结果的鉴定、确认。
- 连续监测以评估发展的后期效果。

包括这些步骤的社会评估过程通常需要具备相应的意图和能力,以对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操作各个阶段所产生的社会变迁进行管理。此外,从早期以工程规划为核心以来的实践表明,社会评估在项目和政策中的应用同样是成功的。

正如第1章所述,社会评估是研究、规划和管理现行的或意向的政策及工程所引发社会变化的一种方法。它关注个体、群体和

其他社会成员所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不过，其范围往往是局部的或者区域性的，运用的主要方法有社会分析、监测和公众参与等。

社会评估的目标之一是预期变化的社会效应，以尽可能实现早期管理；另一个目标是卷入受变化影响的所有社会群体，以求变化导致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同分配得到合理控制。社会评估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措施，在操作上力求简洁和经济。

评估过程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和最大化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因为他们代表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公民，还包括开发者和变迁的拥护者。评估过程应当设计能够自始至终收集参与者信息流的机制，即：

- 确保有关社会效应的信息都已收集并提供给权益群体。
- 提供有关社会效应的沟通渠道。
- 向利益相关者提示变化的社会蕴意，以帮助他们最大可能地采取应对的计划和策略。
- 厘清工程、项目或政策所有的权益群体和受其影响群体的需求目标，告知评估和决策的有关标准。
- 鼓励通过诸如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利益团体等现有渠道的公众参与和卷入，如果需要，也可以举办相应的讨论会以及帮助这些机构开展能力建设。

受影响人群需要有获得和使用全部环境效应（包括社会效应）可用信息的能力，参与变迁决策和规划，并成为变化规划和管理不可或缺的一方。

简单说来，社会评估应当预期并描述社会效果，以尽可能在早期实行管理，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卷入所有群体以平衡变迁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当地社区和利益团体、区域性组织和政府、中央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和变迁的开发者或者倡导者，即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会卷入社会评估过程。评估因此可能需要专门组织对一些特别方案或者许可程序做出回应。受影响群体或者对社会知情发展和管理（socially informed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有兴趣的第三方都可以发起这样的评估。

社会评估过程的战略性应用

早期的许多社会评估实践和著作把社会评估应用于项目计划和执行。社会评估对战略性应用也是有益的,就如环境评估作为战略性环境评估(SEA)应用于项目、规划和政策的设计内容一样。已有详尽的文献论述了战略性环境评估(Brown and Therivel,2000;Eggenberger and Partidario,2000),出版的案例也演示了战略性社会评估的出现(Baines et al. ,2003)。

社会评估过程的组成要素

基本术语

早期对社会评估过程的认知以及其中诸多关键术语的定义来自查理·沃尔夫,他是该领域的著名实践者和学者(Wolf,1983)。沃尔夫提出的基本过程包括 10 个主要步骤,其论述成为后来众多出版物和社会评估手册的核心内容。

克拉威兹(Krawetz,1981)对早期社会评估使用的术语提出了最初的批评。她特别指出了社会评估过程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分界的模糊,尤其是社会影响"预测"、社会影响"评价"和社会影响"监测"等行动时常混淆不清。克拉威兹支持沃尔夫的模型,认为它的思路更具有整体一致性。虽然如此,评估者依然不能摆脱困惑,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沃尔夫模型继续以设计和计划作为社会评估的阶段焦点,尽管诸如监测、治理、管理和评价等活动勾稽关系比较清晰(不然的话,我们也会支持这个模型)。

沃尔夫模型显现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出自术语的使用没有反映出评估行为的内在逻辑。例如,第 6 步中使用的术语"评估"被沃尔夫描述为效应估计的具体活动,但它又常常被用来阐述社会评估本身的一般领域和过程,或被提及为准备社会评估报告的具体步骤。"监测"在第 9 步中被与评估活动区别开来,尽管社会影响监测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社会评估过程一个重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样,监测和治理、管理也被看作是联系紧密的活动,效应治理和管理需要监测程序提供的关于影响的基础数据。最后,"评价"在第 7 步中彰显出社会政策研究和政策规划的特别涵义,用来对项目或者活动进行正式回顾性评价。

过程的要素

进一步的定义和基本术语的固定强化了社会评估过程的简单逻辑(simple logic)。新西兰社会影响工作组的有关出版

物对显现的术语混乱提出了最初的解决方法(Conland,1985)。我们在本书第1版中提出了优化方法,并得到了广泛采用,具体内容汇集于表4.1。在表中,评估过程被分成设计和执行两个阶段。正如下文的讨论所言,尽管它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但表中与每个要素相关联的活动一般从上至下相互依赖。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主导分析模式同样也随着活动系统而变化。

支配影响评估的最初标准研究模式过程包括:确认问题,收集资料,做出预测,比较不同方案的结果。表4.1总结的过程更多的是一个"有机体(organic)"的思路,一个强调不断问题确认和效应分析的思路,不仅是为了一个工程、一个项目或者一个政策的执行,而是考虑这些全部的执行。

评估过程不会在完成了法定的或者实践对影响评估的需求目标之时就结束,而是一个对社会变迁进行反复重新规划和管理的程序,即应对问题、重新型塑目标和增加社会福利的策略。打一个比方来说,评估就是一个对未来的"导航过程(navigation process)"。以全程监测为基础,连续的中段校正(如治理)一定能够修正风浪激流(winds and currents)之中无法预测的变化。如果没有经过导航矫正,船只偏离港口越远,也就偏离航道越远,可能的结果是计划(预期)中的目的地将永远不可能到达。

厘清影响和效应概念

影响(impact)和效应(effects)这两个术语被交替地使用,并且在某些法律性定义中,它们的含义并无差异。在本书中,我们将"影响"定义为具体的、可以确认的改变,而将"效应"定义为结果(consequence)。这样定义与词汇一般的用法相一致:影响是短期的、突发的,而效应是长期的、结果性的。法律和正式文件一般采用一个术语而代表了两个词的涵义,如新西兰资源管理法使用了效应一词,用来描述短期或长期,暂时或永久,积极或消极,发生在过去、现在或将来以及累加的影响(参见案例研究1.1)。

人们经常听到"实际的(actual)"影响和效应这样一个表述。影响和效应前面加上形容词"实际的"意味着真正发生了

表4.1 社会评估过程

过程要素		过程的活动内容	主导的分析模式
设计阶段	定位	问题确认、变量描述/测量、生物-物理性变量和社会性变量之间的链接，以及影响区域和评估的可能边界	对提议变迁的预测：参照社会剖面
	社会剖面	对当前社会背景和历史传统的全面回顾和分析	现实变迁资料以及截止当前社会反应信息的整理和分析
	方案选择与制定	在效应预测和估计的基础上对应对变迁的各种方案进行分析和比较	问题和选择的分析：参照效应的预测和估计
	效应的预测和估计	对照决策标准对一个或多个选择方案的潜在影响进行细致审查	变迁预测，包括不同方案选择下的具体特点
执行阶段	监测、治理和管理	收集有关现实效应的资料，包括这些资料被不同的参与者在不同阶段用于避免或降低消极后应、增加积极效应，以及对变迁进行总体管理的情况	收集和分析现实变迁以及有关治理和管理策略的社会反应的资料——可能卷入更多的效应预测
	评价	对包括已经执行的社会评估过程在内的所有评估所发现的变迁的社会效应进行系统的回顾性的评论	回顾整个变迁期间的监测数据和其他有关现实变迁和社会反应的分析

(可测量的和可描述的)而不是预测的或者意识到的。但这样使用“实际的”一词会令人误解。在社会学中,一个公认的假设是一旦事物被意识,它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例如,人们会对意识到的环境变异做出社会性反应,而不一定需要经过科学术语的证实。他们会停止在“污染(polluted)”的河流上休闲,因为遭遇“电磁辐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al)”而出卖自己的住宅并降低不动产的价格,或者拒绝将孩子送往“受污染(contamination)”地区的学校。

术语“实际的”另一个误用是将其用于可测量、可计量的影响和效应(预测的或相反)的评估而不是描述性的研究(定性的),决策者经常犯此类错误。正如我们在第5章的解释,“实际的”一词的误用导致了偏见和对社会数据的不正确使用。然而,确定预期影响或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并鉴别其影响或效应与其他社会变化关联的大小和意义十分重要。

定 位

定位(scoping)通常是社会评估中的第一步,它的效力取决于后续章节将要描述的有关技术。执行一个初步调查以明确社会评估的主要问题和焦点、选择社会分析的关键变量、对影响的可能区域和研究的边界进行初步表述。定位一般也意味着一个协商过程的开始,包括与公共社团进行公开、坦诚的沟通:

- 确认与目标行动有关的重要议题和问题。
- 决定时间安排、所需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构思分析的细节。
- 链接生物-物理结果和社会结果。

如果提议行动的社会效应具有潜在重要意义,那么可以对分析中包含的关键变量的选择、社会剖面必需的范围、资料可用性和收集需求、评估区域的勾画、执行分析需要的资料和其他有关调查情报等做出初步决策。

定位一般以可及二手资料的初步整理和解释为基础,同样也需要通过初步咨询收集一些一手资料。如果在定位过程中确

认资料存在严重差距，评估者可能不得不采用社会调查和其他研究手段来获得另外的资料，通常可采用剖面分析中的方法来完成。然后，所有资料根据构想中的主要社会变量进行解释。

当社会评估成为环境评估的一部分，定位需要从基本的命题开始执行，即所有影响环境的行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效应。因此，设计一套程序以在评估过程中建立环境和社会之间的链接成为至关紧要的一步。分析建立链接是一项专门工作，需要各方协作和跨学科努力。假定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在任何程度上互不相关，或者认为各个分析可以相互独立而不是相互参照而完成是没有根据的。

网化和链化

因为评估包含的分析来自小组成员个人，而小组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将生物-物理变量和社会变量在一个因果关系“网”中链接起来。这个方法称做网化和链化(webbing and chaining)，它比编辑一个比较影响变量而建立，有时被评估小组使用的工程变量矩阵更具有分析性，由小组成员通过划勾，甚至排队的方式完成，在交叉表中确定可能的问题区域。然而，和矩阵训练一样，它可以成为评估小组各学科成员间最初的“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过程。

使用一个狩猎管理的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消防专家建议有选择地烧毁一处森林以减少未来火灾风险。该建议在一个会议上讨论，出席会议的有野生动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等。野生动物学家提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有选择地烧毁森林将增加鹿的栖息地，继而鹿群的数量可能增加。而社会科学家则根据森林和相关经济的影响得出了猎人在数量上增加的初步估计。另外的小组成员则表达了对拥挤和猎人安全的关注。每一个议题(如预期的效应)在初步定位会议上得到具体阐述，并通过箭头线连接到假定的因果关系变量。这将成为小组的工作文件，其他兴趣群体或受影响者，无论是一般人还是科学家，只要是为了鉴定他们可能受到的利害影响，都可以来查阅。小组成员可以向不同的相关利益者提供因果分析的工作文件，以激励他们作出响应和贡献。一套编码系统对描述主要的利害关

系及其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大有裨益。

在实践中,效应蛛网可以变得十分复杂,如图 4.1 所示。事实上,对复杂案例而言,用一系列关联图表将蛛网链接详细描述出来,并用不同的颜色来帮助对图表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快速识别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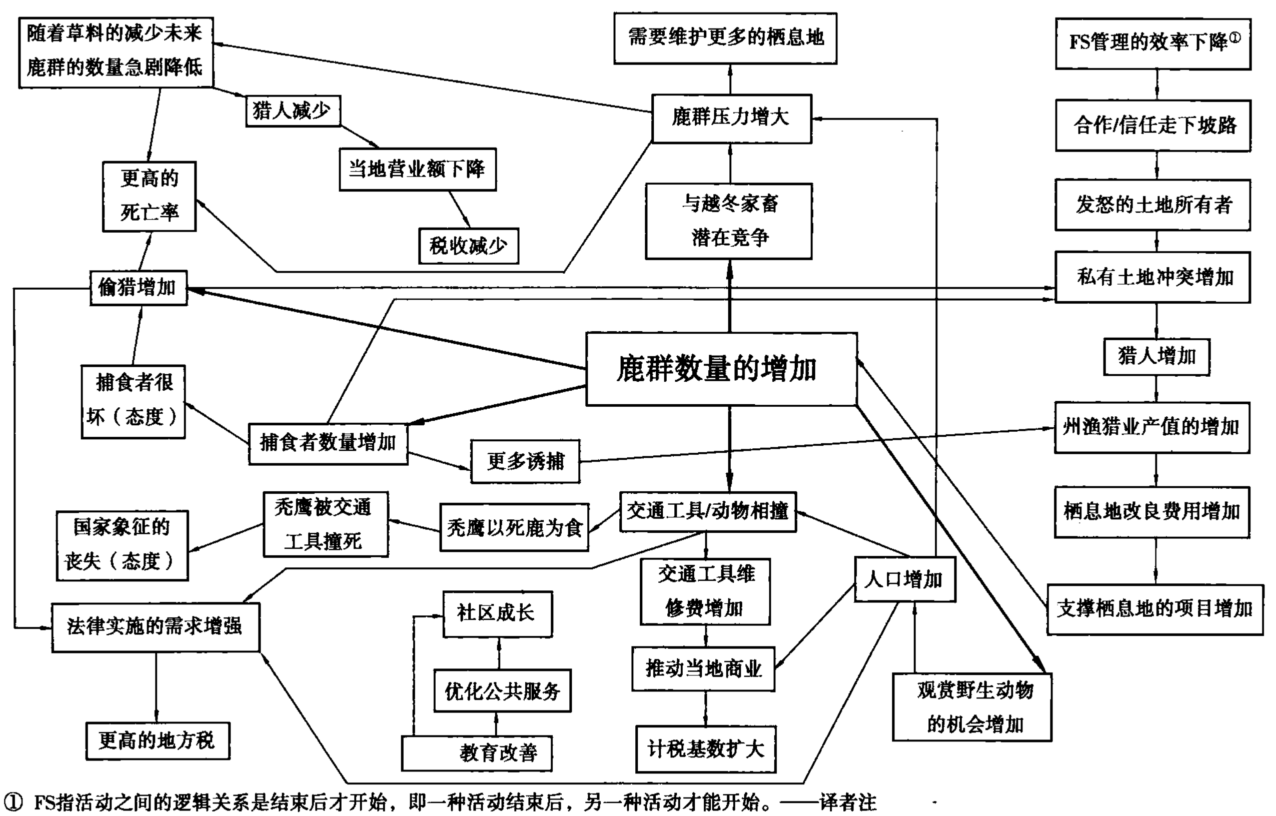
定位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加分析性而不是描述性。记住,它是"问题驱动的过程(issues-driven process)"。该方法的使用要求多学科真实互动,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们共同思考变量之间的链接。小组最初的作业成为讨论任何议题(预期效应)的参考点并服务于构思分析。最后,如果蛛网发展的参与者们总是被指示推动建立和社会领域的不同链接,那么,在生物-物理性和社会性鸿沟之间建立一个真正整合分析的桥梁将是不容置疑的。

分析的核心是进一步检视早期对效应的预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第 5 章将进一步探讨分析的方法。

利益相关者分析

社会效应只有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立场进行描述才有意义。因此,在因果关系蛛网中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图示,问题分析就进入到了社会领域,谁得利谁受损一目了然。例如,仅仅计算滑雪旅游或矿业开发将给地区经济带来的 X 量的增值以及新增的财富在经济体中重新循环后通过乘数效应所带来的 Y 经济总量的影响是不够的。分析还必须包括社区断裂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鉴别他们受到的不同影响。与新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商人可以从矿工大幅增加的开销中获得不错的收益。但是镇中受雇于其他经济领域的年轻人会发现买得起的住房短缺所造成的支出增加远超出他们从经济繁荣中间接获得的其他所有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提议行动不同的选择将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理想状态下,在定位阶段就应当考虑不同的方案选择(假设社会评估在计划编制过程早期就启动)。当然,目标是最大化积极效果并最小化负面效果。但是,如果所有的结果和影响不能根据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蕴



① FS指活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结束后才开始，即一种活动结束后，另一种活动才能开始。——译者注

图4.1　网化和链化

意进行追踪的话,这项工作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正如前文所述并将在第 8 章讨论所指出的,从开始就卷入全部有利益关系和受到影响的群体是咨询性评估必须的。

社会剖面

该方法有时被描述为执行一项基线研究,而且很少深耕焦点,除非特别需要。剖面法(profiling)包含的工作既要考虑剖面本身所需要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又要考虑能够促进剖面实践所包含的活动。既然如此,这两类活动及其衍生行动,都很自然地被视作初步评估的内容。初步评估报告是一个有益的里程碑,为全面思考更加详细的评估计划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机会。

社会剖面法还需要针对当前的社会背景以及历史传承进行分析和评述。评估地区的社会特征和历史应当被看作是变迁效应估计的出发点之一。为了形成具有潜在重要社会效应的决策,需要根据初步调查发现形成社会概观(social overview),包括对社会问题和趋势等数据进行解释,并在效应估计和比较之前为决策制定过程提供信息来源。

社会剖面应当包括(Conland,1985):

- 社会传统及其现状的描述;对当地典型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及其和社会变迁关系的分析。
- 对当地和区域经济状况、变迁和被评估地区潜在经济链接的描述。
- 图示受影响区域的公共机构,如地方当局及其用地范围、部落边界,并加上文字描述。
- 社会效应评估计划,包括发挥作用的社会因素,关键变量的定义、解释及其来源。
- 数据资料文件及其分析与预期假设的讨论。
- 数据可靠性的讨论,包括可能影响分析的数据不一致(inconsistencies)和缺口(gap)分析。

适宜社会剖面分析的数据源类型包括以下类型:

- 现有的统计资料:政府机构汇编的调查报告和其他数据,以及私人机构的相关数据。
- 书面的社会数据:给编辑的投稿资料(letters to editors)、报刊文章、书面证词、历史记录、毕业论文、年度报告,以及关于当地的研究资料。
- 观察和访问资料:与当地民众的谈话以及参与包括工作、休闲和其他社会活动的资料;还包括根据初步调查选出的系统观察变量以及其他重要变量所反映出的信息。
- 调查资料:包括执行的结构性访谈和邮寄问卷。在正式调查之前应当进行试调查,以保证问题和变量选择有效代表了现实状况(参考第 6 章)。
- 公共参与资料:在公共咨询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参考第 8 章)。
- 机构或项目成员:提供所在社区生活和工作的描述性资料。

第 6 章将详细讨论现状分析和社会剖面分析的方法。

方案选择与制定

方案选择行动从详细分析计划工程或政策可及的资料开始,当然,在定位和剖面分析中获得的信息也需要一并考虑。当社会评估从业者和发展项目的建议者以及他们的设计、规划团队需要深入交流和沟通时,方案选择的策略常被采用。另外,不同的备选方案,包括“不适宜的方案(no-go)”,都需要进行考虑。方案制定因此和工程性质以及不同方案的效应估计紧密相关。

当涉及地区或国家自然资源以及社会政策运行时应尽可能采用方案选择策略。在与承担政策制定和运行以及过程监测等战略任务的公共机构的职员合作时,也应当进行方案选择。例如,在新西兰,在当地政府和资源管理立法的监控下,此类政策工作的程序在当地或区域层次上得到执行。开发者和当地或区域政府进行合作更加重要。在这种意义上说,开发的

工程需要最大程度符合社区发展的目标。社会评估实践者最常提及的一个烦恼是,他们没有对方案审议做出足够的贡献。虽然理想地看来,他们应当在政策制定和资源规划阶段有所投入,但在其他层次社会评估有所作为也十分重要,即使在早期没有介入。这些包括:

- 自然和社会资源政策,如原始河流用作景观、游览、城市供水或者发电的决策。
- 活动类型,如发电——河流自然流淌还是截流成水库。
- 位置,如水库建在哪里?农田或居住地会受到什么影响?
- 操作,如建设大坝的规模和类型——使用当地还是外地的施工人员。
- 建筑,例如建筑方法——施工队工作场所。

在所有的决策阶段,方案选择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时间。例如,如果大坝需要快速建成,那么可能没有时间按照技术要求培训当地的建筑工人,因此,不得不使用外来的施工人员。假设时间不受影响,许多负面效应可以减弱。另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因素是财务,开发者是否在开始阶段就准备建立不良影响治理系统并将社会效应的管理纳入工程成本?

效应的预测和估计

效应的预测和估计应当包括"无行动(no-action)"方案,也应当包括对治理和管理影响的可能需要进行识别。不同资源使用或政策方案通过诸如社区稳定和发育能力、生活质量因素、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经济增长等相关的标准进行检验和比较。在确定决策标准时,需要关注所有不同的意见,包括"积极的"结果和潜在的效应,也包括"消极的"一面。不同的社会群体、公共机构和私人部门最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

该阶段的具体任务包括:

- 确定效应的规模、强度、意义、持续期限和可能性概率。

- 决定是否需要进行风险分析。
- 比较不同效应及其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的权衡。
- 按照允诺的程序要求适可展示环境文献信息。

多年来许多社会科学文献都关注预测社会变迁技术的发展和提炼，而且特别强调一两种技术。事实上，无论是在生物-物理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精确的预测都很难实现。但使用多种预测技术比局限于一两种技术在战略上更加可行。再以航海类比，如果航海家在船上只有一个罗盘或者只能依靠观察星际方位，万一罗盘失灵或者天空多云，预测到达的日期和时间将成为问题（更不用提测定当前的位置）。合理地使用多种不同的预测技术，以便能够“三角验证（triangulate）”提议方案是按照预期的结果方向发展。

有许多预测技术可供社会评估实践者使用。其中，有些技术被认为是“经济预测（economic projection）”方法，包括我们认为的那些应对社会效应的一般方法。换句话说，经济预测只是计算“社会（social）”影响的另一类方法（关于经济影响的详细论述见第 7 章）。

趋势研究（Trend extensions）

这是一种简单的根据目前趋势预测未来的技术。例如，在最近五年小径使用数据基础上预测徒步旅行（hiking）的趋势，或者根据先前的产业数据预测木材工业就业量减少的趋势。

人口乘数方法（Population-multiplier approaches）

在此方法中，用当前人口规模乘以一个系数来计算另一个变量的变化额，如根据地区人口增长预测数来估计对社区基础设施服务（学校、医疗设施）需求的增长。

计算机模拟（Computer modeling）

此方法有效结合了以上两种方法，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变量之间的前提、过程和权重关系。该方法依靠专门的计算机程序而变得更加方便，但其中最大的局限是获取适宜分析的基线数

据。莱斯特瑞慈等人(Leistritz et al.,1994-5)提供了一个案例,他们用计算机模型评估发展工程在地区、县域和地方等不同层次上对诸如经济活力、就业、人口和社会服务等不同因素的社会经济效应。

专家咨询(Consulting experts)

该方法显然是一个利用他人知识的技术。所谓的专家可以包括大学研究人员、专职咨询者、地方权威人士或者知识渊博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一个评估的早期定位阶段,地方官员和居民按惯例会被问及存在的问题和期望的效果。一个特别实用的策略是咨询其他地方已经经历同样发展过程的人们,问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参见下文的社区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经验丰富的当地人是当地情况的专家。通常,忽略开发和诠释地方知识而仅仅依赖技术知识是导致环境评估冲突的一个根源。

社区比较(Comparison communities)

这种技术是将受方案影响的社区与已经经历同样变迁的社区进行比较。一个例证是通过测定其他相近的发展项目给社区带来的变化来预测某种特别类型工业发展的效应。必须注意的是确定讨论中的社区至少与比照的社区在基本特性方面(如规模、社会经济概况等)大致相似以保证可比性。

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

对社区社会结构的分析一般包括对社区生存和繁荣有重大影响的人类服务供给的数量、性质、渠道多样性等方面。此处的一个例证是通过确定小镇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数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出租公司的现状和行为等来预测社区对提议的修建通往高速公路的机动车道路的反应。这类分析可以通过对电话簿"黄页(yellow pages)"上有关社区服务供给的范围和类型(如法律援助协会、计划当局、医疗专家、会计师、金融策划师)进行列表计算的方式完成。分析为社区基础结构的性质和力量以及其依赖的专门技能的评估提供了依据。一般而

言，社区越是一个制度性的综合体，面对提议的变迁越有能力最大化自身的收益而最小化自身的损失。注意，在另一种背景下，制度性分析是决定提议行动“政治可行性”的一种工具——不管社区是否能够或者愿意动员起来，也不管实际上从自身利益出发如何反对或矫正变迁。

经济基础模型(Economic base models)

当地方的经济活性(如就业)来源于向其他地区出口商品和服务时，经济基础模型的预测方法常被使用。这些“出口(exports)”产品(称为“基础活性”)激发出相应出口服务领域的其他经济活性(称为“非基础活性”)，其价值会通过计算一个系数反映出来。例如，如果某个特定地区的矿业开发需要雇佣 200 个员工，而非基础业(服务)相对于基础出口业的历史雇佣系数是 0.5，那么可以预知将有另外 100 个工作岗位创造出来($0.5 \times 200 = 100$)。因此，矿业运营带来的就业量的变化总共是 300。

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s)

投入-产出模型的核心聚焦于用来生产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消耗(“投入”)和由此得到的产品量(产出)之间的关系。不同经济部门的生产根据每元产出需要的投入价值而相互比较，加入由初始变迁引发的全部需求变化将产生出“乘数效应”。例如，对产业 A 而言，1 元产出的需求变化创造的全部经济变化是 1.34 元，略高于已经发现的产业 B 的乘数。如果产业 A 是木材生产，产业 B 是观光业，那么木材生产对经济的总体价值将高于观光业。

成本-收益分析(Benefit-cost analysis)

该项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比上文总结的传统经济影响分析模型的分析范围更加广阔。提议工程或计划的所有收益和所有成本都被计量并相互结算盈余，不仅仅根据市场价格核算可计量的效应。

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这种方法提供了外在性(也就是非市场影响)对于个体价值的间接测量。例如,预测一个湖的资源或者社会福利服务的价值,问卷调查技术将对潜在用户提出诸如他们为了得到特定的使用准许而愿意支付的货币水平等假设性问题。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文献十分丰富,知名的有条件估值法①。

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 models)

该模型包含系统的数学方程式,用来捕获特定经济体的复杂结构和相互关系。例如,实践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发展场景分析并模型化产业的特定影响。尽管构建这样的模型是一个费时的过程,而且受限于变量数据的可得性,许多主要大学在其研究领域坚持采用经济模型来预测和评估经济影响。

关于脚本建构(Scenario construction)的解释

脚本建构有时被列入分离而单一的预测技术。事实上,脚本建构运用分析法(第5章详细讨论),由一系列预测技术结果和数据源组成。一个脚本建构的例证包含了许多具体的预测技术:社区比较方法用来探讨相似条件下相似社区的变化,人口乘数方法用来确定人口和就业效应,专家咨询法可以反映出对社区不同群体(获益或者受损群体)、社区经济和社区基础设施的可能影响。所有不同分析的结果通常经过组合成为可能性影响的整体模型或者脚本。当一个个专家或者有见识的人们被号召"建构脚本"并发展出成套选择时,相同的过程就会出现。至少直观上,多数人会使用多种技术来建构对未来的想象,即使简单地以他们或者其他人的经验或者对主题的熟悉为基础。对未来的想象也包括了对未来预知的评估,特别是那些因为实施计划或者建设工程而将要无可挽回而放弃的选择,

---

①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通过询问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受到损害后的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来评估环境物品或服务的价值。——译者注

如建成大坝之后的河流观光、居住和农业用地功能的丧失。

监测、治理和管理(Monitoring, mitigation and management)

监测方法直接应用于对工程、项目和政策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治理和管理。社会影响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鉴定某一行为的实际影响或效应与预期值之间的任何重要差异。为了减少不期望的和不必要的效应或者为了增加受益,对变迁过程进行相应调节是必要的。这不仅为工程评估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另时另地的效应评估和预测提供了案例比较的基础。

监测应当贯穿整个变迁过程,以便治理的有效性能够得到评估。评估反馈集中于发展趋势、影响和存在问题等方面,如果需要,可以帮助进一步修订影响管理的方案。

社会影响监测在加拿大及其他国家被认为是推进社会评估的基本要求。然而,正如克拉威兹等人(Krawetz et al. ,1987:15)在关于加拿大、新西兰及其他地方的社会影响监测的回顾中所发现的,多数社会监测实际上是“一个看起来混乱、无序和费解的过程”。他们提出应该建立一个系统方法来规范这一活动。

从国际视角看,关于社会影响监测的经验集中于以下几点:首先,在社会评估过程中,影响监测必须尽早启动。理想情况下,监测过程和社会评估的定位紧密关联。接着,社会剖面分析也为进一步监测提供了基线资料。在评估过程的早期阶段,可以建立后期监测实践所涉及的开发者、社区和公共机构等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工作性关系。

尽管社会影响监测已经付出了广泛而有益的努力,例如新西兰的亨特利,马士顿点,塔拉纳基和克鲁萨河等项目的评估,但是,没有一次监测纳入了整体的社会评估过程。在亨特利和克鲁萨河项目中,投入了相当精力实施监测,但是没有和治理行动建立明确的联系。在一些诸如工厂关闭、国家部门减冗的案例中,虽然做了不少工作来减少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帮助被裁减的员工,但是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测。社会影响监测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很难完全获得开发者的合作,而这对监测在影响治理和管理中有效发挥作用十分重要。

监测中遇到的主要方法性问题包括对社会变迁的描述和测量,以及对其意义的评估(Krawetz et al. ,1987)。区分出具体社会变迁的不同起源十分困难。监测需要围绕关键变量(如移民、可求的工作岗位、住房以及可及的社会服务)建立一些标准并关注关键问题。社会影响监测的部分典型主题需要收集的资料参见表4.2,这些案例信息来源于作者的经验以及加拿大、美国和新西兰有关工程监测的比较研究(Krawetz et al. , 1987; Fookes et al. , 1980; McPherson, 1985; Houghto et al. , 1986a)。

表4.2 社会影响监测变量举例

变量类别	变量举例
工程劳动力特征	规模 技能 年龄、性别、种族 婚姻状况 子女数量及年龄 工作经历和居住地 工程支出和工资
人口统计学特征	当地人口规模 年龄和性别结构 种族 家庭规模和构成
经济特征	劳动力市场 失业状况 家庭收入和支出 工业和职业结构 培训项目 零售状况 商业活动和前景 当地政府财政

续表

变量类别	变量举例
基础服务设施	住房和住房用地(housing lots)的可及性/价格 出租屋 卫生保健 教育服务 交通 社会福利服务 其他公用事业
社区特征	社区分组和生活方式 志愿组织 原住民社群 休闲娱乐 社会问题

在已经建立的监测系统中,收集、储存和分析资料的系统是重要的。资料处理系统应当建立在定位和剖面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届时建立的文件和数据库。这样为监测做安排的需求是在社会评估过程中尽早建立监测的进一步理由。

如果可行,监测还应当尽可能早地融入到工程管理之中。最常见的可能性是,将监测和作为变迁组成部分而建立的任何公共联络机制链接起来,该机制通过识别相干问题有助于监测的聚焦,同时,监测数据、问题和趋势的反馈又使得该机制变得更加信息灵通。有关咨询过程将进一步在第 8 章详细讨论。

社会监测的参与性(参见第 2 章)同样是重要的。例如,涉及群体和地方组织在社会评估过程中的参与,将及时促进相关的监测及监测信息在影响治理和管理中的应用。

评　价

评价是社会评估过程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它既独立于社会影响的监测和管理又给予必要的补充,一般作为工程、项目和政策变迁过程管理的重要一环。然而,外部监测同样被采

用,有时这种外部评价是为了维护其他群体,包括受影响人群的利益。外部监测和评价也可能部分出于正式要求,通常由外部机构提出,一般将评价用作审计相关的程序。

卡斯勒和库马尔(Casley and Kumar,1987)提出了应当参照工程发展阶段执行相应评价的三个典型时期,即:

- 工程执行的中期,其全部的社会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 工程执行的末期。
- 项目完成以后进行事后追溯,这时长期效应可以确认。

评价在农村发展项目,特别是作为部分国际资助的项目管理中得到最为明确的定义。卡斯勒和库马尔认为监测和评估互不相同,但都是工程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作为管理过程有机部分的连续监测相比,评价是根据一定期限的目标对工程的适当性、执行情况、效率和影响进行阶段性评估(Casley and Kumar,1987:2)。另一方面,评价毫无疑问需要从监测中提取相关数据,不过,它还需要其他的资料。评价还可能包括和其他相似或相关项目的比较,或者与尚没有经历社会变迁设置和问题的地区、社会部门或者群体进行比照分析。

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是作为社会评估过程的评价自身应当是变迁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评估过程中的定期评价将改善个体工程的管理,并将对社会评估过程的概念和方法的改进有所贡献,为日后个案比较等新的应用建立特别的基础。

程序与工程/项目周期

上文描述的社会评估过程可以应用于工程/项目周期的不同阶段,如图4.2所示。在确认阶段,应当在整合的政策或者发展策略背景中诠释工程项目并筛选出真正的社会问题。作为工程、项目或者政策设计阶段的工具之一,社会评估开始越早,效果越显著。定位研究将在设计取得进展并逐步细化之后执行,此时对受影响群体和社区的剖面分析通常也需要启动。在更加详细的设计阶段,社会评估需要检视备选方案和对可能的社会效应,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进行评价。接下来,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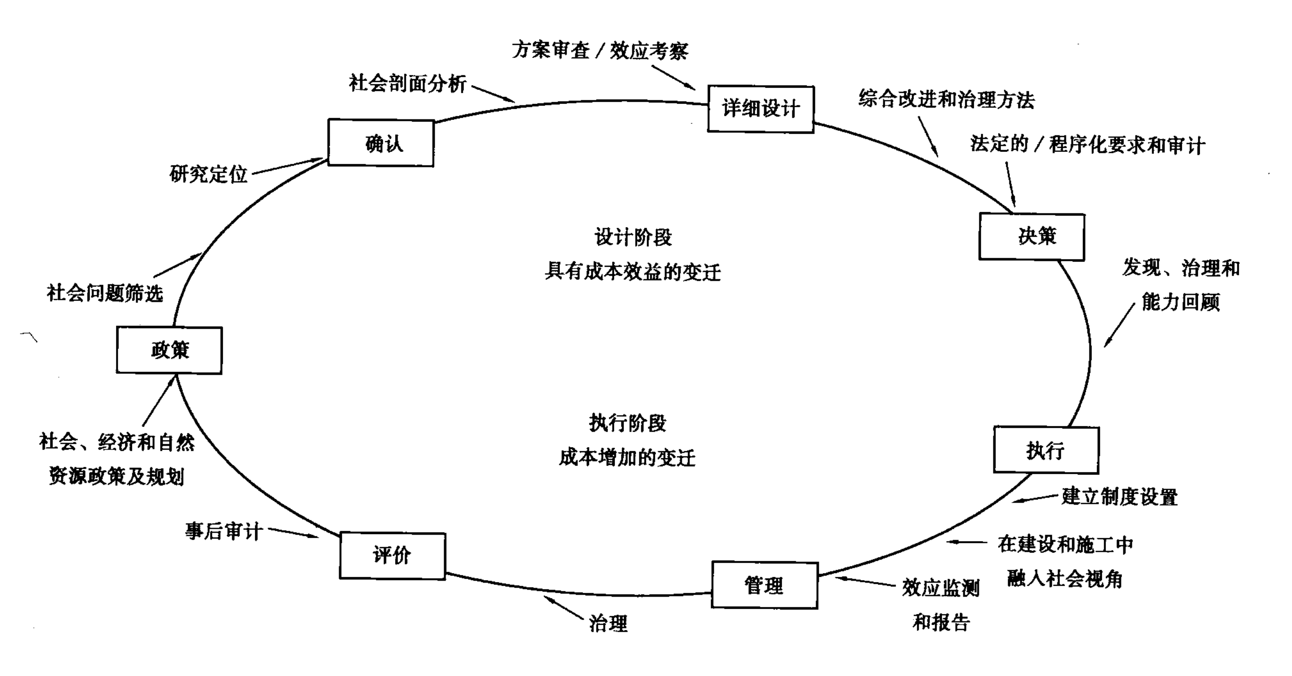


图4.2 社会影响评估和工程/项目周期

要建立将社会问题融入工程项目执行的程序,包括持续的监测和评价。此间可能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持续的监测(为适应工程管理)和阶段性评价(例如:年度、中期和后期回顾)在工程施工的全部阶段都需要开展。另外,同样需要在工程/项目回顾和事后审计中使用社会评估。

过程的制度性基础

实践经验反映社会评估存在许多制度性需求。全部完成评估过程需要开发相关的能力并得到持续性支持。例如,在国家层次,需要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需要努力保持社会和自然资源政策的一致性,并需要为社会评估制定全国性社会研究策略和建立数据库。以前,这些工作主要由社会评估从业者个人和他们的网络来完成。来自不同的机构、学院和地方职业社团的评估实践者认识到社会评估需要更加有效的制度性基础。他们通过游说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资金帮助和立法支持,为社会评估争取了在管理方案选择和决策建议中更加主动的地位。

社会评估的制度性基础需要在以下三个层次分别建构:中央政府、区域政府和地方政府(社区)。下面将依次讨论,并将探讨所有三个层次都需要的技术问题,包括社会评估的研究基础、培训和专业发展、性别分析和评估者指南。

中央政府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其他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经验表明建立社会评估制度性基础困难重重(Dale et al. ,2001)。国际上有关中央政府层次社会影响评估制度化的主要成功经验包括:

- 不同国家一般在中央政府,有的也在州或者区域政府建立独立的机构或者在机构内设置专门部门。
- 招募社会科学家进入政府机构,为社会评估和社会发展配置资源。
- 许多国家在资源管理立法中对“环境”社会维度的接受

程度逐渐增加，社会评估和公众参与作为正式要求也逐步加强。

- 广泛开展关于社会评估的研究（Taylor and Dale，2001）。

这些成功的经验表明中央政府机构、政策研究和企划部门需要在社会的、经济的和自然资源（环境的）的整合政策框架内形成妥协和合作。然而，在众多负责有关领域公共管理的机构间找到一个整合的方法并不容易。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中央政府层次付出的政策、研究和协调等努力的效果并不总是有效，主要障碍来自于经济问题、土地使用和自然资源政策，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供给机制。应用性研究很少涉及社会变迁，即使有，也与变迁的管理没有关联，而且执行中丝毫不考虑关于社会变迁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全国性资料。

例如，在新西兰，曾一度呼吁成立一个社会评估的中央政府机构（Renoufand Taylor，1985；Cronin，1987；The New Zealand SIA Working Group，1988）。正是这样的机构被视为社会政策制定、社会评估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基础，它的工作范围可以包括各机构之间行动的协调，给政府建议，社会评估程序的管理以及对具有社会效应的工程和政策的审计。它将与涉及环境和经济政策制定与管理的各个机构紧密合作。康兰德（Conland，1985）提出有效执行和发展社会评估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 中央政府层次具有足够的制度性基础。
- 足够的经费支出以及对专业人员的支持。
- 立法支持、触发机制和严格的控制（审计）。
- 政府、私人部门和社区分担成本的机制。

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社会影响机构是一个 1989 年建立的小单位，但是因为政府的更替而于 1993 年结束了使命。该机构致力于促进开发商和社区共同参与、寻找和处理决策制定和工程管理中的问题。它通过环境保护局就工程项目书的社会可接受性给政府提供建议，还提供社会评估的培训、综合公共教育和网络平台服务。但是，它没有正式授权，难以对社会和自然资源政策产生主要作用，甚至在政治是非中缺乏

力量保存自己。昆士兰州政府当初仿效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建立了社会评估的独立机构,但随之也解散了这个机构。新南威尔士州的社会政策理事会为政府提供社会政策事务的咨询服务,出版了关于公共咨询技术的文献,参与了悉尼2000年奥运会的社会评估。

在美国,社会分析主要作为环境影响评估的附加或者独立部分而存在,但有时也没有包括进来。社会评估一般关注经济的、人口的、健康的和安全性变量[尽管后者不一定包括在"社会(social)"领域分类之中]。著名的社会影响评估准则和指南国际委员会正在努力改变这个状况,以求形成一个文件来帮助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机构和组织能够按照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的授权开展社会影响评估,该法案授权直到1994年时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现在,总统环境质量顾问委员会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监督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似乎已经倾向正式采用这些指南(2003年修订并出版)。

社会评估的成功制度化需要强有力的关于工程、项目和政策周期程序的立法支持。泰勒和戴尔(Taylor and Dale,2001)曾清楚指出,明确的授权和严格的执行(审计)是必须的。社会评估的多数立法条件和环境影响评估的需求相同(Taylor and Dale,2001)。在此,"环境(environment)"的定义在整合考虑社会影响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国家制度化发展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 赋予社会评估和生物-物理性评估同等的立法地位(可参考案例研究1.1)。
- 发展社会评估的专门机构或单位,形成整合社会评估发现和为决策程序提供建议的机制。
- 在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中央、州或者区域、地方)应用社会评估要做到任务明确。
- 视社会评估为有益的计划工具而不是管理的篱笼。
- 支持参与的思路,避免专家技术主宰论和结果导向的思路。
- 把注意力集中于为政策形成和资源(土地使用)规划服务的战略性社会评估。

区域规划

为推动社会评估并提高其地位,整合性的区域政策和规划策略是必须的。作为区域就业战略、商业发展项目和公共服务提供一部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也将有助于社会评估的开展。区域政策和规划在调和国家和地方目标的差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其发展设置的优先次序与都市中心可能截然不同,区域规划工作显得特别重要。举例说来,制定自然资源政策和变迁管理的区域框架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社会政策指南。相关的工作还包括为资源依赖地区面对经济繁荣和萧条循环而制定就业和地方企业发展战略。这个框架需要包容关于重要自然资源政策问题的不同观点。一个例证是关于资源的可持续性,如果其他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已经启动,对储备资源的使用就应当作为促进社区发育和演进的重要措施。

在新西兰,选举出的区域议会对资源规划和资源管理法案(1991)的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它在社会评估方面的能力不足,通常非常有限,因此无法采用整合的方法实施行动。在一些案例中,区域政府为社会评估工作提供了制度性支持。政府召集了包括议会的相关成员、高级官员和开发者在内的指导小组(steering groups)一同安排具体的发展项目或者制定发展的设置。指导小组能够发起社会评估工作,包括组建当地的任务小组、协调平衡区域和国家之间的成本和收益、参与社会监测和从工程中征收的社会发展资金的分配。同一区域不同社会评估之间的协调也由政府来完成,如政府必须对水资源重新分配和土地资源变迁具有重要影响的系列灌溉方案的评估进行协调,以保证水资源公平、合理供给。

如果没有区域的重点,就很少能够对众多变迁的累积效应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充分得到当地的或者具体的回应。例如,在案例 4.1 中,几个能源工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同时实施了社会评估作业,但重点是对其他工业项目的关闭和丘陵地区农业系统面临的资金困难等影响。

案例研究 4.1

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新西兰的塔拉纳基区域政府对几个主要能源工程的建设和逐步关闭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的社会评估。那时,随着众多小工厂(生产黄油和奶酪)的关闭和几家新的大工厂的开张,区域的牛奶加工业得到了"优化(rationalized)"。同样,因为关闭了一个大的工厂,肉类加工业也发生了改变。进一步的问题是,绵羊放牧津贴的取消意味着丘陵地区放牧业在需要抵押销售和合并农场等方面遇到了实质性挑战。

为应对区域经济发生的这些不同的变化,塔拉纳基实施了几个社会评估。在评估工作中,区域规划的权威部门——塔拉纳基联合理事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理事会原本负责监测使用来自毛伊岛煤气的几个主要能源工程给地区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并出版《塔拉纳基能源监测报告》。这以后,理事会把帕特亚冷冻厂关闭以及农场和农村服务部门变化的有关信息加入了监测报告。在此基础上,理事会还另外发表了关于此丘陵地区农场界变化的专门报告(Taranaki United Council,1986)。

联合理事会还协调各部门对变迁影响进行治理和管理。其中的推动力来自从主要工程中征收的发展经费,也来自为响应地方的需求而调整社会服务的实践要求。在此,社会评估特别工作组常常在链接监测、治理和管理之间表现出良好效果(见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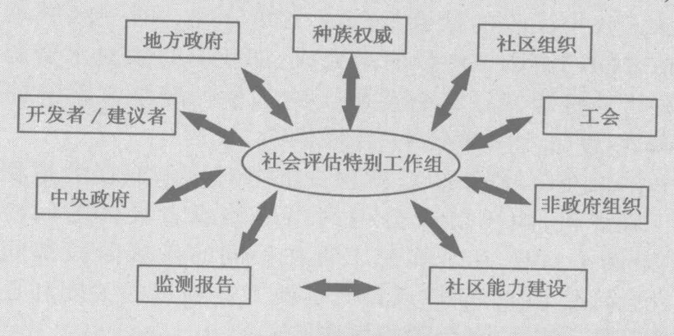


图4.3 社会评估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地方规划

在一个地方,有效的社会评估过程和社会发展行动之间存在诸多互相关联。社会评估工作促进了对地方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也用相关的资料支持了此类发展的案例。在有些案例中,社区发展工作者从工程项目资金之外接受薪金,帮助提高地方社会评估的能力和执行效果。社区发展工作者能提供广泛的公众参与的技能,推动新群体网络建设和社区行动,激励弱权群体(less powerful groups)、决策者和一般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Conland,1985:10)。

社区工作者在社会评估过程中执行的社会发展工作需要相当的地方和区域制度支持。因此,地方的特别工作组和技术顾问团被证实具有显著影响。这些特别工作组一般由社会评估工作者招集,主要包括中央和区域政府相关机构、开发者(公共部门的和私人部门的)、地方政府和公共社团的代表,其任务主要是信息收集和咨询、评价并为社会评估者提供指导,特别的监测工作,以及协调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非政府组织(NGO)和应对变迁所需要的社会服务。所以,特别工作组对弥补经常出现的研究和行动之间的断裂具有显著的作用(图 4.3)。

专业能力

社会评估的研究基础

社会评估在其过程中要实施和运用社会研究(Burdge,1998)。在社会影响评估发展的早期,弗罗伊登伯格和基廷(Freudenburg and keating,1985)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外推法(extrapolation)"即根据已知的影响推断比较个案的效应,是预期社会影响评估的一项基本技术。但是他们指出:"直接运用该相关技术时常出现的失败可能不是因为失察,而应当归因于事实上先前的知识经常不能获得。科学家们不能仅仅根据猜想来外推;他们需要生动的、可靠的和经验的数据。"(Freudenburg and Keating,1985:583-4)对加强研究支持的呼吁似乎悄无声息地远去,很少看到旨在为改善社会评估实践的具体研究。在另一方

面,将社会科学文献转化为方便其在社会影响评估过程中使用或应用的表达方式有时非常困难(Taylor et al.,2003)。

正如在第5章中所讨论的,研究帮助发展了评估的概念框架。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将展示评估如何能够吸收利用社会统计和其他经验数据。时间序列和趋势分析有助于促进社会影响预测变迁方案的形成。在此,案例比较分析对变迁方案缜密性的发展也十分重要(Taylor et al.,2003),主要包括两个具有位源优势的案例:一个是社会研究提供的比较案例,另一个是作为特别评估部分执行的案例。所以,评估本身既可以使用自己的比较案例,又可以生产出新比较案例。博尔杰在1977年最先提出并发表了一个历时模型(diachronic)来阐述为社会评估或者社会评估自身生产比较案例的特征(Burge and Johnson,1998)。泰勒(Taylor,2003)指出,该模型在社会影响评估界的认可和使用比较有限,需要通过以下措施来强调社会研究在社会评估中的重要性,以推动模型进一步发展。

- 用某一地区类似案例推导出另一地区社会变迁的总体概览。
- 对某个案例的数据进行监测和评估后用于其他地区另一案例的分析。
- 对同一地区的相似(重复)的影响源进行纵向研究。
- 对其他尚未受到同样影响的地区开展研究,以获得不同于受影响地区社会变迁一般过程的资料。

应当从第2章所阐述的研究和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关系得出社会研究常常不能很好地指导或者应用于社会行动。遗憾的一点正是如此,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他们的客户都没有从中得到激励而避免使应用性的、行动导向的评估工作陷入乏味(treadmill),并建立积聚具体案例经验的资料库,尤其是运用社会剖面分析、监测和评价的手段。

培训和专业发展

如果缺乏培训和专业发展,仅依赖强有力的合法指令和良

好的研究并不足够支持社会评估实践(Taylor and Dale,2001)。尽管从国际上看,社会评估的培训和专业发展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其专业性仍然落后于其他自然资源评估。为增强社会评估的能力,需要配合采取多种措施,包括从大学和专业课程中汲取现有的技能和经验,获取专业组织和网络的支持。培训应当包括诸如定性资料分析、公共参与及其推导、谈判和仲裁、社区行动研究,以及使用地理信息系统专门方法等在内的技术技能。另外,还需要将社会评估纳入其他学科的培训之中,以克服与环境科学以及资源管理课程培训的分割。至于大学课程、国际影响评估联合会(IAIA)在国际上的专业网络以及诸如新西兰影响评估联合会等国家性专业网络,都将对能力建设作出无价的贡献(Taylor and Dale,2001)。

性别分析的能力

和其他社会评估的内容一样,在项目周期的所有阶段都当应执行性别分析,而且分析早期就需要考虑在治理和管理的策略中对性别分析做出直接的反应。监测和评估程序中也应当明确性别分析的内容。当然,性别分析的结果也应当反馈用于后期工程、项目和政策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包容性别发展更多的具体目标和目的,以及促进性别沟通、参与和新的管理系统的形成,最终在实践中努力实现妇女的需求,例如改善个体和家庭的健康、生活和工作条件,或者促进收入增长,以及更加广泛的诸如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的重要需求。

对男性和女性的相关权力进行全面考察对性别分析和发展社会评估的制度性基础大有裨益。权力的差异在本质上可以是社会和文化性的,也可以是经济和政治性的。其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妇女在社会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各种水平的决策制定。例如,妇女作为开发者、律师、地方议员、审判员和种族领导的参与程度是不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常常承担重要的角色,比如作为一个社区组织者和环境保护的倡议者。然而,在许多评估案例中,妇女都处于相对无权的地位。

存在多种因素影响环境决策制定的参与。性别分析探讨哪些因素影响参与的水平。举例说来,男性和女性可能喜好不

同的参与模式。同样,影响他们参与的限制性和促进性因素也是独特的,包括参与通道的类型、活动时间和需要的技术技能。参加评估的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类型同样也具有意义,考虑该类组织的领导能力、角色和责任以及它们代表男性或女性的程度有助于性别分析的开展。有时,需要特别的机制来保证女性能够有效参与,比如使用敏感的性别语言、提高意识水平、倡导妇女行动,以及动员妇女组织进入参与过程。

如上文所述,拉贝尔·博尔杰为首的一个美国小组在1994年第一次发表并于2003年修订了第一个国际使用的社会评估指南(The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1998)。该指南最初的宗旨是为了促进形成良好实践的原则,并为美国政府机构的社会影响评估提供实践指导,不过,它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这些指南包括:

- 探讨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下社会影响评估(SIA)的合法性指令。
- 提供社会影响评估基本模型,清晰勾画出项目/政策发展从计划到关闭/废止所有不同阶段的轮廓和要点。
- 为评估社会影响准备30个变量的矩阵。
- 帮助梳理评估的过程,包括定位、描述基线条件、效应预测和预报,以及监测和治理。
- 为包括社会影响反馈的公共卷入提供建议。

在第1章的个案研究1.2中曾提到,国际影响评估联合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发表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国际指南(Vanclay,2002)。工作小组确定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指南对在一个特别的制度背景中具体应用社会评估大有裨益。而且,每一个指南都需要从最初的能力建设中得到支持,包括制度发展和合法指令、专业能力发展和培训以及对研究和数据库的应用。这方面的实践有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和亚洲开发银行(www.adb.org)等多边机构为工程项目建构的社会分析指南,包括性别分析指南、被动移居指南、壳牌国际开采和B.V.制造

开发的工程指南(1996),以及在马来西亚作为社会评估制度建设项目一部分而提出的国家指南(Baines and Taylor,2002)。马来西亚的经验揭示的原则是:

- 应当帮助评估实践者和潜在用户认识到社会评估可以应用于多种场合,而不仅仅是项目。
- 应当由受众铭记于心,诸如机构管理者或者非政府组织(NGOs)。
- 必须在要求更加具体的思路和方法建议与能够将一般原则应用于多种具体情景两种需要之间维持平衡——灵活性与标准化之间的平衡。

因为关于社会评估方法的著作和文献比比皆是,用户没有必要在指南中再去详细回味这些方法。指南中包括的方法主题的框架参见表 4.3。

表 4.3　指南发展的主题大纲

社会评估的领域——指南的背景
指南的受众
指南的预期应用——工程、项目、计划或政策
特殊情境中社会评估的合法指令
程序条件,包括外部审计和监察的规定
工程/项目周期——具体要求是:
定位
方案评估
影响报告
监测
治理和管理
评价
情境中需要考虑的典型社会影响变量
汇总情景中社会影响评估需要的具体问题资料
社会影响评估中可能的参与形式和手段
特殊利益——包括性别和本土居民
特殊内容——诸如对再安置的预备
特殊部门的需求和条件

结　论

一个清晰的能够应用于工程-项目周期的社会评估过程已经发展出来。本章的宗旨是详细描述并推动社会评估过程朝着参与的、与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和执行相整合的方向发展,旨在减少社会变迁的不确定性,避免过去经验已经证实的错误,最大化社会收益和最小化变迁成本。这种收益和成本的分担引人关注。

本章小结

社会评估过程是一个研究、计划和管理由预期和现行政策及工程引起的社会变迁的方法。该过程包含对变迁的社会分析、公共参与、监测和相应的管理,目的是激励和代表受影响的社区和群体、公共机构和私人部门。

社会评估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 定位。
- 剖面分析。
- 方案选择。
- 效应预测和估计。
- 监测、治理和管理。

理想的社会评估过程是前摄的而不是反应性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社会评估可以由开发者或者变迁的代理机构响应正式要求或者为了可知的社会管理(socially informed management)目标而启动,也可以由受变迁影响群体、公共机构或者其他声称维护自己利益的机构提出。只要可能,在任何自然资源政策的背景中都应当有社会评估的诉求,从设计和规划

到建设/施工，再到运行和最终关闭的所有发展阶段都应当接受社会评估。

社会评估过程卷入了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公共机构，当然也应当包括地方层次的参与，包括社区个体、社区群体和组织、社区工作者及地方政府等职业群体和机构都应当参与进来。无论如何，社会评估的制度性基础需要随着不断加强的专业能力而得到支持和发展。

第5章
问题导向的方法
The Issues-Oriented Approach

社会评估在为一个更加前摄和可应用的社会科学提供基础方面具有相当的潜力，尽管它至今仍然为一些有时看起来几乎是该领域特有的思路和方法问题所困扰。本章将阐述一种能够超越诸多此类问题的关于资料收集、组织和确认的思路，它包含了第4章所描述的评估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社会评估从业者常常因为时间和财力的限制而不得不依赖于使用二手资料。但其中大量可用于分析重要社会变量的资料属于定性数据性质，因此不能用于工程项目定量基础技术分析。定性数据被一些决策者认为和诸如物品和服务的支出、人口变化、就业数量或者新建房屋数量等“硬性(hard)”数据相比具有更少的“科学性(scientific)”、更少可靠性和更低的有效性。这些关于数据的问题又经常被难以使用的“冗长清单(laundry list)”方法所恶化，以致调查者试图对受到规划或工程影响的社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展开研究。

本章讨论的问题导向的思路被作者广泛应用于大量的案例研究，从大型煤矿发展和水库建设早期规划中对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的初步确认，到美国林务局土地使用变迁的社会分析；从“农场危机(farm crisis)”和西部农业社会服务减少的影响评估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规划分析。问题导向的思路已经应用于分析不同规模的社会变迁，从大资源项目的发展到小村庄的当地决策。正如问题导向的涵义，分析围绕熟悉评估文献的知识群体和受预期变迁影响市民双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该思路和包含对社会变迁综合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思路相对照，其主要优点是聚焦于使能(enable)知情和及时决策的“重要事项(what matters)”，从而节约时间和经费。

问题导向方法的应用

问题导向方法是一个迭代和适应的过程(参见图 5.1)。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动态方法,能够在社会评估的任何阶段正在提供信息的同时接纳另外的数据。该技术经常用于收集和分析信息并可以按照评估的需要调整,处理新的信息以增加对影响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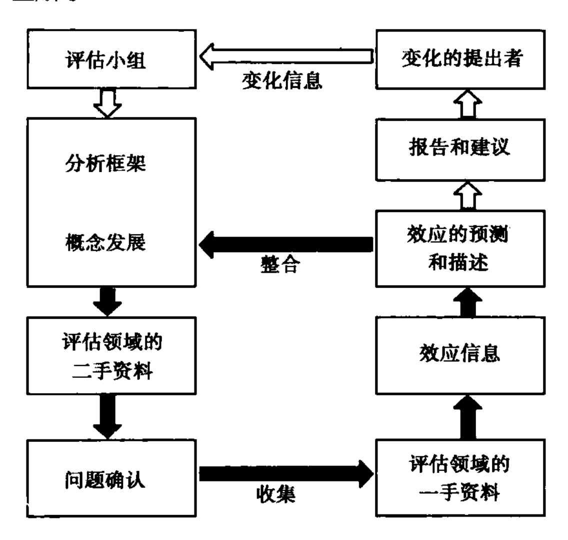


图 5.1　问题导向的方法

该方法有助于社会评估从业者在一个多学科的队伍中建设性地开展工作。它集合了探讨一个切合实际方案所需要的成熟方法,能够促使一个没有很好社会科学背景的评估者成为团队中有效率的成员。虽然团队执行社会评估常常最有效率的原因,但问题导向的方法能够并已经被个体从业者成功使用。使用团队可能最重要的理由是团队能够带来多样的技术、经验和观点,时间限制等问题更加容易克服。这种多样性很重要,因为需要考虑的社会问题分布在从"经济"、"环境"到"社会"的广泛领域。另外,评估也需要开展多样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事实上,在美国,评估小组的跨学科是国家环境政策

法案(NEPA)的要求条件。

分析框架

评估小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形成一个社会评估的分析框架(图5.1)。分析框架是对提议变迁原始信息的响应,它以一套概念为基础,为评估提供智力引导,为工作指明方向,确保对影响做出尽可能综合和符合成本效益的基本描述。框架通过综合多种学科的观点,从评估小组的经验和理论背景中发展而来,不过它通常仍需要用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概念进一步整合。

在评估的早期阶段,分析框架包括关于变迁规划的资料以及关于其他地区相似社会设置中此类变化产生影响的文献。迭代法(iterative approach)要求在进一步资料可及时通过分析归纳(下文阐述)法的评价而对框架不断修正。

数据收集和公共卷入

问题导向方法的下一个主要任务涉及分析框架在评估领域的应用。最初,该任务包含了对所在领域文献的回顾和二手资料的搜寻。尽管问题导向思路在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中强调使用定性分析技术,但如果可能,定量资料同样可以使用,特别是在目前的发展时期。数据收集在评估中启动越早越好,一般从定位或者下一步的剖面分析阶段开始。二手定量数据可以包括诸如人口或土地使用等信息。二手定性数据同样重要,主要包括历史信息和生活史(传记),一般在当地社区就可以得到。关于二手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将在第6章详细讨论。

社会评估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确认所有提出的社会问题都真实有效。问题确认的检验以及从根本上说社会影响的最后描述都来自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问题导向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缺少它,从业者在识别和核实社会数据和问题时将面临相当的困难。这一点在第4章已经讨论过。社会问题可以从实际效应和预期效应两方面去考虑。田野工作能够帮助评估小组确定最关键的论点并最终获得关于变迁决策的认可。因为对主要问题的确认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需要尽早和受影

响社会群体紧密合作。因此，田野工作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它是参与性的，能够卷入最受影响的群体参与解决关系他们自身的问题。

许多田野工作的方法甚是接近人类学被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田野调查技术，包括网络分析、深度和半结构访谈、参与性观察等。社会评估的问题导向思路在本质上无论对从业者还是利益相关者都是一个参与的过程。由计划行动促使的公众群体或者利益群体的聚会将在评估初期卷入评估者。评估本身同样也愿意卷入会议和活动作为田野工作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活动都将依次为观察社区运作尤其是社区对变迁如何做出响应提供机会(参见第 8 章)。

建立一套田野联络关系并确认社会网络是该方法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民族志或社区研究中，接近田野可能是个问题。然而，在社会评估中，走进田野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当地领袖和职业群体，其中后者因为在当地就业而成为新来者，可能对社区有敏锐的观察，但从拥有知识而言并不是真正的"当地人"。社区变迁中的获利方和受损方都提供了社会评估的需要，特别是当他们和变迁的动因没有关联时这种需要就更加迫切。

社会评估者的主要挑战是，确保所有的社会群体和亚群体都能够被顾及，并且他们的利益能得到认可。特别重要的是要保证相关脆弱、无权或者缺少表达机会的群体有发言权。

正式的调查，尤其是耗时耗力的高成本研究技术，只有在绝对需要时才应当用于社会评估资料的收集。例如，一个关于家庭、就业、收入和支出的全面调查可以为当地提供详细的数据剖面图，但是，它需要吗？现有的数据，比如人口普查资料或者官方的就业数据可能已经足够。不过，为澄清田野工作中发现的关键问题可能需要实施问卷调查。例如，就业情况是建立或者关闭一个产业的关键问题，所以除了最近的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官方统计之外，新增数据可能为评估所必须。对雇佣者和就业者网络的访谈可能带来大量有用的资料，扩大了官方统计资料并弥补了其不足。但是，未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依然存在。比如研究小组发现了最近兼职工作的妇女增加的迹象，那么一

个关于雇主特定雇佣方式的调查能够为该问题提供决定性的资料。调查在社会评估中的应用将在第6章进一步讨论。

框架的迭代性和适应性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循环过程并不是一步一步推进而直至最终(final)报告。正如图5.1的黑体箭头所示,循环过程通过再访问任何一个关键部分而自我实现。过程同时是适应性的(灰体箭头所指),在任何时点都可以融入新的信息。举例说来,政府的新政策可能不会顾及计划的变迁,一个新的"反对(opposition)"群体可能出现,或者工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可能发生变化而引起计划进展的减速或者变形。

类似的是,在评估的任何时点都可以提取或者报告信息。例如,在一个水库工程评估的早期阶段,开发者可以要求关于为劳动力提供房屋的新住宅区的有关初步资料,关于劳动力的原初资料也应当提供给早期的定位和剖面工作。反过来,劳动力预测也会根据开发者对所提问题的反应进行调整,而整体评估只有去适应新的方案。随着可能的影响被告知,社区的疑虑和意见改变了。结果,土地价格恢复自然升降,当地社区的新领袖出现,离校就业者也改变了他们关于地区未来工作前景的态度。此时,需要对社会剖面进行调整。

问题导向方法针对影响评估和管理的持续进程而全面推进。它在工程-项目的全周期自始至终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应用于效应评估,在评估周期包括执行、治理和适应管理等不同阶段都是必需的。随着分析思路的展进,一些循环可能是必须的,如图5.2所示。常规情况下,关于评估过程的报告将由定位报告、效应初步评估和全程评估报告,以及监测和评价报告等一系列报告综合而来。

规划和管理变迁过程的动态分析技术包含一些更加严格的方法,这些方法一般由规则或程序界定。国家环境政策法案下的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趋势是,在工程建议之前实施影响评估而政策变迁则较少使用。批评家指出在这种方式的评估过程中,社会评估即使不是一个断裂的部分,也是一个相对自我运行的系统,或如博尔杰(Burge,2002)所称的评估过程中的

"孤儿(orphan)"状态。案例研究 5.1 展示了一个反例,它说明社会评估同样应用于政策设置(policy setting)。

案例研究 5.1

社会评估应用于整合研究和政策形成

该案例研究(Samya et al.,2003)阐述了将社会评估整合于一个关于改善环境和健康状况的研究设置之中。研究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发起,主题是:亚拉巴马-莫比尔①河流域(协议号:R827168-01-0)人体受侵(human exposure)于涉及土地使用和物理化学过程所致汞之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的动因源自基础科学研究和相关政策之间的断裂问题,即研究成果只停留在学术杂志上,不为正致力于构想有效环境修复措施的政府官员知晓;或者就"热门(hot button)"问题而言,研究成果对问题争论的极端化和政治选择的僵局视而不见。

研究围绕导致汞侵入食物链的因素进行。汞是一种对人体有毒性作用的重金属,食鱼是一种主要的暴露途径。来自阿拉巴马大学生物学、地质学、环境工程,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组成了跨学科小组,沿着美国东南部的亚拉巴马-莫比尔河流域展开调查。目的是测定引发汞侵入水生食物链(the aquatic food chain)的原因,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利益方案和政策应用。社会评估和公共参与过程开始于研究的发端,并持续到研究结束以后,旨在通过以下途径减少研究和其后续政策之间链接的障碍。

- 获得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信息和支持,减少问题的极化对峙。
- 将生物-物理研究成果和政策选择方案转化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寓意分析,以求在政策创新之前为决策过程提供关键信息。

至少从这两方面看,经由社会评估和公共参与过程进入政

---

①亚拉巴马州西南的一座港口城市,位于墨比尔湾(a port in southwestern Alabama on Mobile Bay)。——译者注

策领域而实现研究成果主流化(main streaming),不仅重要,而且适时。研究者发现一些鱼类含有高量汞,便假设死水或者水流过缓以及有机物浓度高和沉淀积累等变量是起作用因素。然而,一个关于汞消耗危险标准的关键因素被发现。阿拉巴马州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环境保护署和其他大部分州以及加拿大的两倍高。在阿拉巴马州的标准下,研究样本鱼的汞含量很少有超标的,这和严格限定标准的其他地方形成反照。该案例研究同时揭示出咨询性社会评估应用于政策形成而不是作为环境评估的附属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亦可参见案例研究8.6)。

分析归纳法案例

分析归纳法(Analytic induction)是问题导向方法的核心本质。尽管这个术语听起来很深奥,不为多数人所耳熟能详,但其方法却不仅被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物理学家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和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等不同学科专家所喜爱,而且也为天文学者、深度报道记者、小说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及其真实生活中的原型所广泛使用。

近来,物理科学的多数研究强调做演绎推理的逻辑模型,从一般的原则绘制(演绎)具体的预期(如果乌云密布,则演绎出天将很快下雨)。不过,归纳法则是通过具体观察产生一般原则或者概念的逻辑模型(下雨时乌云密布,是乌云引起下雨)。

当然,在实践中,调查人员两种方法交替使用,从一般原则到具体案例,再考虑案例不“符合(fit)”或者不支持先前原则的情形而对原则进行修改(天上乌云密布,因此推论出将下雨,但乌云并不总是带来降雨,只有刮西南风,雨才能降下来。因此,原则必须修改成:降雨是由西南气流带来的饱含湿气的云形成的)。

社会科学中强调演绎、假设检验的思路和物理及自然科学很类似,但忽视了归纳和理论生成(theory-generating)的方法。人们可以推测其中的理由,也许认为通过“铁的事实(hard facts)”检验理论或假设似乎更加科学或者缜密。对定量的强调当然必须有助于减少演绎的偏差,因为用未经加工的数据为一个理论建立基础很难,而用它来预测(演绎)数量变化的方向则比较容易(如果数据不是很庞大)。例如,人口普查结果反映出农村人口在减少,据此可以延伸(演绎)推知将来农村人口的趋势。但是很难从人口普查结果建构一个理论(归纳)来说明这种趋势、可能的逆势或者随着时间而反复的变化。因此,需要一种适应范围更加宽广的方法。

分析归纳法和社会评估

归纳法技术(the inductive technique)如何和社会评估相关联?多数人会认为预测未来对任何学科而言充其量都是不确定命题。但是在社会评估中,指导理论和概念缺乏,加上评估过程中常见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类型数据的混合(如主要依赖二手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因此,通过归纳法来预测效应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管怎样,作为社会评估一部分的分析归纳法比单纯的归纳和演绎的涵义更加系统和具有包容性。简而言之,归纳过程包含对当地或社区现有的最直接的数据进行综合,并形成一个概念框架或者模型来说明这些数据。接下来,进一步的检视是用新增的数据来试验原始模型能否预测或者说明这些数据。如果出现不一致的发现,研究者将回到始点重新考虑方案并修正它,以求差异能够被解释。这个关于检视和修正的过程将反复进行,直至研究者能够说明全部或者大部分收集的数据(图 5.2)。

举例说来,假如一个社区临近一个煤田并将对大规模采煤的发展建议实施社会评估。社区以农业为本,大约 2 500 人口规模。对当地经济有所贡献的还有一个规模不大但稳步增长的观光业,其吸引游客的地方在于它的海滨,一年四季气候宜人。参照已有的关于同样的工程社会效应预测的经验以及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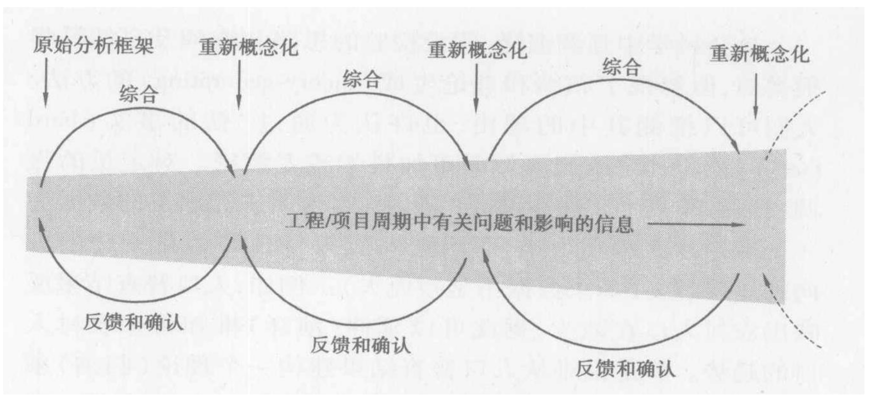


图 5.2 分析归纳法的应用

地区文化的熟悉,你最初的推断是采煤工程具有相当多的社会影响。你预测到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当地的服务和保障(如运输、教育设施和社会支持)供不应求,住房开支急剧上升,经济实惠的住所短缺。你预测农民从土地移出,离开他们传统的社会方式。与这些社会成本相对的利益是对物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刺激,移居农民得到土地补偿金(或者得到可耕种的替换土地)的事实,当地经济的多样化,以及煤矿生产带来的地区性或者全国性收益。最值得关注的是,你会提出疑问:既然受影响社区相对较小而且资源有限,居民将没有能力动员太多的抵制力量或者不能有效主张对负面效果进行治理,尽管这是他们的忧虑所在。

初步调查(定位)发现,关于可能出现的社会效应的最初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但是随着公共参与的深入,你发现了出人意料和在某种程度上不一致的结果。社区会议的出席率很高,大量组织完备的当地社团对发展建议不寻常地表达了保留意见,尤其对如此规模的社区而言。面对采煤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推动项目进展(get the project rolling)"的合谋,社区团体似乎没有做太多的让步。

如何解释你最初关于社区可能被动屈从的设想和实践中发现的现实之间的反差?重新回顾整体数据之后,可以把区别于其他类似新兴城市(boom town)的不同情境归因于这里的海滨、宜人的气候和正在发育的观光业。你相应重新构建你的社

会评估框架:社区对开采煤矿的反对异常显著,因为使用煤矿资源被认为与观光产业所需要的海滨度假胜地的环境存在审美上的不一致。农业家庭的意见增强了反对方的力量,因为农民看到他们稳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

公共参与的进程在继续,新的数据不断进入评估框架。然而,又会出现重新概念化的框架不能很好驾驭的不一致。尽管对开采煤矿存在很多反对,但一些社区代言人认为该工程确实也有利益,尽管同时会给地区带来很大的社会(经济)代价。来自社区不同部门的领导人形成了一个联络小组,旨在确定如何能够促进小镇和地区从中最大受益。这完全不是一个被动屈从的社区!

通过分析电话号码簿的黄页(一种常见的概览数据资源)对小镇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检视,你惊讶地发现,如此小规模的社区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却极丰富。相对于同等人口规模的地区,小镇具有 2 倍数量的医生、3 倍数量的律师和 1.5 倍的会计师。

假设你现在可能发现了哪些因素造成了社区的不同,你访问了社区的几个在公共参与程序中出现过的意见领袖,向他们咨询了社区多样性的原因。答案告诉你许多人因为“生活方式(lifestyle)”而来到这里生活。他们喜爱这里温和的气候和毗邻大海,他们因此而来到这里,尽管在其他地方可以“在职业上有更好的发展(done better professionally)”。你再一次修正分析框架,并对可以说明地区服务多样性、社区领袖活跃性,以及意见丰富性等问题的信息重新分类和描述。

你现在预期,假设社区具有显著活力,个人和群体将有效反对不符合他们利益的采煤方案,并致力于管理和治理不良影响,促使工程雇佣和支出使社区获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握自己的未来。

作为更大过程一部分的分析归纳法

当然,在进行具体形式的预测或者形成方案纲要可自行采用方法的组合中,分析归纳法一般不是单独使用的技术。分析归纳法可以作为建构一个关于假定和理解社区或者地区分析

框架的基础。有关人口结构的数据一般是现有的,比如年龄-性别组成及趋势的信息。还将得到有关建设工程的信息,比如可能增加的新的工作岗位(数量和类型,学历和技能要求),以及其他相关的经济信息。这类信息可以用来预测发展趋势(例如,使用不同的人口乘数)。此外,社会评估文献综述形成以后,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社区在不同规划和行动之下经历不同类型变迁的比较案例资料(Taylor et al. ,2003)。所有这些经验积累以及对社区如何对变迁做出反应理解的加深将有助于增加对未来理解的精确性。

在分析归纳策略中,所有不同资料以及通过不同预测技术产生的结果都被注入"侦断(sleuthing)"程序,和预期结果的差异受到关注并会给予必要的解释调整。该技术为社会评估的各个阶段,包括监测和评价提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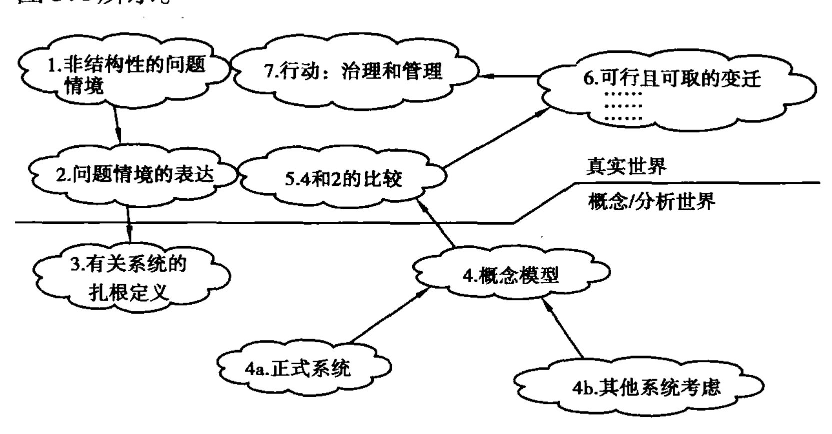
也许会有人提出:"这难道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直在使用的方法吗,只不过我们没有给它一个独特的名称,如分析归纳法?"该方法确实是大多数问题解决者所使用或者应该使用的技术。但如果要全面认识这一方法还需要把握重要的一点。分析归纳法是确认调查结论有效性的强有力工具,不管调查实施的领域是物理学还是天文学,也不管是用于解决犯罪问题、杂志报道还是社会评估。它是所有学科的一个基本范式过程。这一认识有助于抵制一些人持有的社会科学的归纳程序是"软性的(soft)"、缺乏缜密方法论基础,以及有效性不强等看法。事实上,正如希尔(Hill,1984)所描述的,这些方法一般具有对数据进行检验的强有力的、成熟的三角测量系统。

软系统方法论和社会评估

社会评估实践者经常使用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系统即是著名的软系统方法论(soft-systems methodology)。该方法论应用于许多战略性的背景,从社会政策改革分析,如新西兰的健康政策重构,到与世隔绝的太平洋岛屿的农业发展项目的规划。软系统方法论的特点是试图抓住"整体(wholes)"的本质,

在先前的"硬(hard)"系统方法应用于复杂社会问题难以奏效时,发展出一种复杂技术系统问题解决的路径。软系统方法论的意义可以通过一个事实来说明:"硬"系统方法的注意点集中在精确、细节的问题情景,如怎样能把人送上月球?然而,对于复杂社会问题,存在大量有待实现的需求,以致"问题(problem)"概念不得不用"问题情境(problem situation)"概念来代替。正如沃伦等(Warren et al.,1992)告诉我们:"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问题情境'被认为是一个无结构问题的集合。"相反地,"……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和定义本身包含了'解决方法'的存在"。该观点的一个关键释义是:要致力于事物存在条件的改善,而不是仅仅解决出现的问题。

切克兰德(Checkland,1981)提出了一个表现最为灵活的软系统分析方法论。这是一个动态且互动的方法论,表现出的理念是任何部分的变迁将影响系统其他部分。相应地,该方法论要求回溯和反复修正以保证有效性(一种和本章所勾画的方法极为相似的概念性技术)。切克兰德认为他的方法论用作分析框架时最为有效,"……不是一本烹饪学书中的烹饪术"(Checkland,1981:63)。该方法论包含两种不同的机能,如图5.3所示。



来源:修订自 Checkland,1981

图5.3 软系统方法论

切克兰德做了进一步解释,阶段1,2,5,6和7是"真实世

界"包含"问题情境"的活动,而在穹型线的下方(阶段3和4)是"系统考虑"或者概念化活动。切克兰德指出,该方法应用时这几个阶段并不必须序贯地进行。原则上看,该方法可以从任何一点启动,他甚至建议方法使用者应当在整个过程不同阶段的不同水平同时开展工作(Checkland,1981:163)。

随着对软系统方法的逐渐熟悉,正如切克兰德和其他学者(如Jackson,1982;Jackson and Keys,1984)所描述的,软系统方法论和社会评估中使用的分析归纳法的相似性越发清晰。无论是软系统方法论还是问题导向的社会评估都允许向更具有解释性的视角转变,包括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整合,以及在分析过程中参与者和利益群体全范围的卷入。

在图5.4中,社会评估过程(如第4章所描述)参照软系统理念和方法论进行了重新定义。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真实世界(real world)"活动与"概念(conceptual)"或"分析(analytical)"活动之间的区别。这样,分析归纳法覆盖了一般社会评估过程的"每一步(steps)",解决了由于这两大关键因素分离而存在的问题。将"真实世界"活动和"概念化"活动分离是武断的,它们可预期在评估过程中通过迭代反复而不断产生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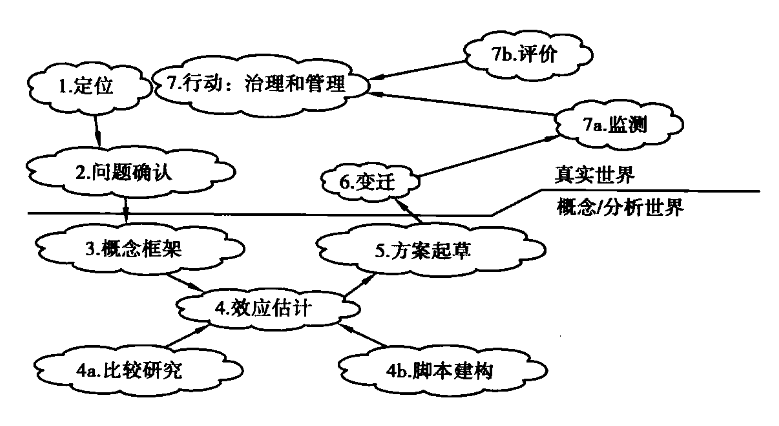


图5.4 重新定义的社会评估过程

重新定义后的社会评估过程是从软系统方法术语中的非结构性问题情境(1)开始的,在图5.4中标示为定位;问题确认(2)和概念框架(3)包括对引导各种分析的不同概念模型进行

检验;效应估计(4)和方案起草(5)运用诸如比较研究(4a)和脚本建构(4b)等技术,力求接近软系统方法论中强调的"可行且可取的变迁(feasible and desirable changes)"的要求;社会评估反过来促进变迁的行动(6)以及改善问题情境和推动最可行且可取的变迁的行动;变迁都被监测(7a)和评价(7b),并将信息传输给治理和管理程序(7),最后回到问题情境(1)。

概念性框架

可以这样认为,问题导向方法在分析和管理社会变迁中受到概念框架的指导。由概念框架驱动的分析归纳过程力求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聚焦于对决策、规划或者变迁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明确概念框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理解多种社会变迁背景大有裨益。如果运用的框架总体上得到了第 3 章所勾画的基本理论概念(表 5.1 中的水平 1)的支持,可以进一步考虑其他三个水平的概念(表 5.1 中的水平 2 到水平 4),对受影响群体的卷入随着水平的上升而增加。

表 5.1　社会评估中理论概念的应用水平

水平阶段和受影响群体的最低卷入	概念框架的要素	相关活动
水平 1	环境社会学整体理论(第 3 章)	社会评估案例、参与/咨询计划的整体路径与方法的建构
水平 2	资源社区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第 3 章)	文献回顾、个案分析、社区比较
水平 3	社会剖面的社会宇宙方法(第 6 章)	社会数据收集和分析,特别是用于社会剖面的二手资料
水平 4	理解社区和利益设置的基础(第 8 章)	田野工作和咨询研究,以确认问题和效应以及治理和管理战略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参与计划为评估程序提供了基

本的思路。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变迁的特别阐述为全面理解具体案例提供了工具。例如,关于资源社区的理论可以为社会评估提供相应知识,即自然资源的使用将带来快速的人口模式变迁。在此讨论的分析思路的背景中,概念框架的相关部分通常主要从已有的研究和个案调查的文献中发展而来。所以,需要组织性变量(organising variables)来具体指导对二手资料的分析和综合。最后,对社区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力的理解可以为咨询性田野工作提供知识信息,反之亦然。

宏观概念和历史概念

在任何一个关于社会评估的概念方法中,历史和宏观视角总是有益的。如第3章所阐述,诸如一个新的产业工厂的建设或者一个传统的农村产业的关闭等不会是孤立发生的事件。它们通常都是正在进行的经济重组和技术变迁宏观过程中的一部分。所以,任何社会变迁都会与发生于某种产业的更广泛的变迁融合在一起。

博尔杰(Burdge,1998:15)曾指出,在"理想(ideal)"思路中,概念框架需要以下基础:(1)一个或更多的关于社区的"控制性(control)"研究,这些社区与那些已经被分析过但没有经历过建议变迁的社区具有共同性;(2)对讨论的社区与经历过相同变迁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3)对讨论的社区经历一系列特别变迁的状态进行研究(Taylor et al. ,2003)。实际情况自然是社会评估分析很少或者很难从如此一整套数据中获益。现有的文献和资料以及新的研究成果只有在可得时才能使用。遗憾的是,产生此类信息的必要研究基础时常并不存在。而且,在没有实施分析归纳程序时,社会评估常常只能追求对现有数据进行最佳利用。

任何社会评估都应当针对由不同变迁类型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社会、经济及文化背景下引起的社会变迁的相似范式建立批评性研究机制。一旦对这些范式进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则可以成为当前影响评估概念框架的一部分。应当说明的是,不管社会背景如何特殊,历史过程的不同设置可以在几个地方同时运行。即使已经对各种变迁的地区影响进

行了各自评估，仍然需要评估这些变迁对地区的总体效应。变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同一宏观影响力，因而对社会评估执行者而言，理解和说明这些影响力，建立可以应对累加变迁并拥有很强预测力的社会评估过程极其重要。

社会变迁有时根据诸如住房或者公共交通(尽管这些变量并不总是都被考虑)等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变化而识别出来，也可简单地根据社会性机构的变化来认识，如一个社区警察(警官)被一个现代化的警察局取代，或者只有一个教师的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的学校，或者一个当地购物中心被附近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所淹没等。不过，这些可以观察到的变化也可以通过一种包含社会科学概念范畴的更加复杂和包容的方式来考量。例如，社会变迁可以根据诸如全球化、城市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化等过程来加以分析。

无需对大量社会学文献和社会变迁的分析论争进行研究便可知，对大多数社会评估工作而言，一个令人满意的概念库并不总是唾手可得。例如，假如一个小的"农村(rural)"市镇住着大量新来的劳动力，那么该镇的人口可能出现了 2 倍或者 3 倍的戏剧性增长，因此从社会学视角而言，它应该定义为"城市(urban)"。但是该镇依旧坐落在相对隔绝的农村地区，一旦短期工程完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然依赖地区内部的贸易。社会网络可能揭示出新来者的城市特征，但是老一辈依旧保持着与众不同的亲密群体状态。在这个案例中，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够分明的区别可以产生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

目的不是为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最终的理论，而只是运用社会和社会变迁的理论在分析归纳法的思路中集中进行实用性分析。分析框架一般产生于提出了环境-社会交互作用的学科间视角、参与式以及使能性的评估过程等思路的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观点。诸如在资源性社区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概念为在评估中形成一个宏观的、历史的视角奠定了基础。它们同时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支持。更多的概念聚焦于社会剖面(social profile)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参见第 6 章)，促进了对社区及其内部利益设置的理解，并为咨询性田野工作(consultative fieldwork)提供了基础(见第 8 章的讨论)。

结 论

可以推测决策者对社会数据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数字(即赋予数值的变量)与资料或研究结果的确定性之间的混淆。分析归纳法及其作为正式方法的显式认知(explicit recognition)能够克服所谓的定量数据和定性技术之间的不一致或差异。事实上,对数字的依赖以及对它们的偏袒反映出对科学调查中数字作用的无知。构成"科学信息(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本质不是看变量转化为精确的度量单位是否直接、简便,而是看科学家能够认可什么样的测量单位以及随后是否可以运用它们检验和复制最初的调查结果。如果结果一致,"专家(experts)"认可结果是"真实的(true)",结论就转变为科学知识的一部分,直到被以后的检验所否定。换句话说,是否"科学(scientific)"取决于专家的一致同意以及他们采用的方法,而不是直接依赖数字或者相关测量的精确性。

通过分析归纳法这一正式、系统的方法论,可以确认将定量和定性资料合并进行逻辑分析的程序,为专家形成一致意见提供基础条件。在分析归纳法中,不是数字赋予了资料有效性,而是来源不同、分析方法不同的数据经过逻辑整合后形成了单一的、一致性解释。事实上,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的整合确定了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并对不一致做出了解释),因此增加了分析效力。而当处理社会数据并且从中做出预测时,分析效力一般并不依赖于测量的精确程度。只要从数据中获取了足够的推论,并且与特定的解释相一致(剩余数据效应可以解释),那么研究成果即被认为是有说服力或者有效的。

本章小结

一个用于社会评估资料的收集、组织和验证的问题导向的方法是值得期待的。这种方法有助于尽可能在早期确认发展

议题以求问题能够解决或者冲突能够减少。该方法不但富有效率而且契合实际,因为它抓住了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键问题,而不是依赖高成本和长时间的综合社区研究。

问题导向的方法同样是适应性的,具体说来,分析归纳法的程序以及从中发展的概念都可以灵活使用,可以根据评估过程,或者田野工作,或者方案内容变化的需要对概念进行扩展、缩小或者调整。此外,它是跨学科的,任何学科背景,包括外行的评估从业者都可以尝试,但通常为评估小组所运用。只要是生态性或者经济性的,所有问题都被假定至少在性质上是社会性的。该方法假设受影响群体的参与同学术或者技术的贡献一样重要。问题导向思路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方法,没有任何的理论、意识形态或者方法论的优先。它还假定在任何时点都可以使用一系列的概念和方法。为了建立问题分析的有效性,田野工作应当同时包括定性和定量方法。

概念框架为社会评估提供了"智力地图(intellectual maps)"。它们帮助确定社会评估的边界和关键变量,并为整体推进提供方向。概念框架具有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推崇资源社会学的理念,强调社会评估所面临的经济、技术变迁的历史背景和进程。

问题导向方法是反应灵敏的。在评估的任何阶段,信息都可以提取出来满足特殊需要。它通过关注可能发生的问题为组织信息提供了有效途径。与软系统方法论相似,问题导向思路也突出"可行的(feasible)"变迁。因此,工程或政策规划以及执行中潜在的犯错误代价可以被有效识别并避免。计划变迁进程中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不断减少而收益不断增加。

第6章 二手数据和调查[①]

Secondary Data and Surveys

最后三章将讨论社会评估的信息来源和使用。本章的焦点是二手数据(secondary data)的使用和调查(surveys);下一章(第7章)论述经济数据;最后一章(第8章)将对关于咨询性方法(consultative methods)的检讨和技术讨论进行总结,并形成问题导向方法的要点。

在社会评估中,从各种可用的信息源收集数据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料而是为了尽可能少地取得必需的资料。按照我们的观点,社会评估应当是问题驱动的,聚焦于特别问题或者具有潜在社会意义的变迁。不过,问题优先的假定并不否认理论发展的作用,也不拒绝对更大范围相关社会问题或研究问题进行检验(参见第5章)。

至于数据收集或研究工作,主要议题确定后的第一步是制定数据收集的方案。在社会评估中,这一工作应当在定位阶段完成(如第4章所讨论)。这一基本步骤将确保主要目标聚焦以及数据收集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得以实现。

在定位阶段,需要确认并开始收集现存的主要数据或二手资料。在识别评估地区的关键人物、公共机构或者其他行动者的联络中同时进行部分资料工作是明智之举。收集的信息有助于确定

---

①感谢新西兰基督堂市菲茨杰拉德应用社会学课题组的杰拉德·菲茨杰拉德为本章提供了二手资料部分。我们认为本章的作者应当署名为尼克·泰勒、科林·古德里奇、杰拉德·菲茨杰拉德、霍布森·布莱恩。

分析边界，或者成为剖面工作和后续任何底线研究的基础，因而对定位本身也有所帮助。作为社会背景和社会变迁的关键信息，二手数据的使用贯穿评估过程的不同阶段。

不管现有数据的性质多么综合，每个评估阶段都需要新的或者原始资料(primary data)。获得社会评估原始数据最重要的技术是参与，包括访谈和会议，以及对研究社区的观察(这些技术将在第 8 章详细介绍)。

一旦需要，同样可以执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在随后的评估阶段最有帮助，它用于收集定位工作、社会剖面早期活动以及二手数据回顾等确认所需要的特别数据。社会调查能够为建立变迁基线以及估计诸如社区对方案的反应等潜在影响提供具体信息。它同时也能为变迁监测提供初步数据支持，只要变迁已经发生。

概念框架：社会剖面变量

任何社会评估都要求对变迁影响下的社区进行一定的初步描述。虽然有许多框架可以应用于评估的这一早期阶段，在此我们仅提出其中相对简单的一种，它以下面的描述性范畴(descriptive categories)为基础：

- 居民的土地分布和土地使用情况(人口/土地使用)。
- 居民如何通过组织化来实现需求(社会组织)。
- 居民的思想意识(态度、信念和价值观)。
- 居民的习惯行为模式(生活方式)。
- 健康(生理的和心理的)。
- 经济(商品和服务贸易)。

描述性范畴在表 6.1 得到了更详细的介绍。这些包含了“社会宇宙(social universe)”主题词(descriptor)的使用将有助于由可能缺乏足够社会科学背景知识成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建构他们最初的概念框架。对一个包含了多种专家的组合团队而言，在数据收集期间有一个共享的关于社会领域构成的概念性要点，以及在数

据收集之后有一个共享的既简单又容易理解的关于数据分解的出发点,是十分关键的。

表 6.1 社会剖面的社会宇宙方法

描述性范畴	变量详细资料
人口特征和土地使用:居民居住的范围和方式以及如何使用地表	反映地区居民的数量、性别和年龄构成、居住方式和历史根基,土地使用包括城区和乡村
社会组织:居民组织起来实现需求的方式	反映诸如家庭、教育、政治、宗教、休闲等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组织起来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方式,如垃圾清运、消防和警察保护
态度、信念和价值观:居民的思维模式、世界观	反映居民对建议行动的意见,其文化标准、恐惧、风险认知,以及居民的所想所思对他们的社区和生活方式十分重要
生活方式:居民生活的方式	反映居民的工作方式、休闲和娱乐行为,居民如何以及在哪里参加宗教活动,朋友和家庭间的网络和走访形式
健康和安全:生理的和心理的健康	反映健康和疾病模式,包括人口的直接健康效应、职业病和职业伤害,也包括由诸如交通拥挤和快速变迁压力引起的间接影响
经济:商品和服务交易的形式和数量	由一系列度量社区或地区经济福利的指标反映出来,包括失业、就业变迁、单位资本收入和支出,以及商业活力

表 6.1 所示的社会宇宙框架在社会剖面的初始研究中帮助最大,提供了收集和组织所需资料的必要支持。在准备数据收集时,研究小组可以采用“头脑风暴法”选择变量和确认“内部(in-house)”资料、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件、图书馆资料、官方记录和类似的信息资料。需要围绕定位分析发现的问题对内部资料进行讨论,以及视情况进一步收集有关资料。这种团队工作模式可以在第 5 章讨论的迭代过程的恰当阶段再次使用。

社会剖面是社会评估的重要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变迁发生的基础状况。然而，在对这一状况进行描述时，必须注意避免把社区视作静态实体的假设。事实上，任何描述性范畴都是一个动态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尽可能收集历史数据和社会趋势证据。最终剖面中的主要变量应当描述出接受评估地区任何新的主要变迁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动态社会背景。博尔杰以他众所周知的26个社会评估变量列表给出了一个相似的思路，在社会宇宙方法框架中集中关注变迁的主要领域(Burdge,1998:43)。

二手资料

正如前文所强调,二手资料通常是社会评估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对形成社会剖面而言。在这一部分,将根据笔者的实践经验提供二手资料使用的一般导论。尽管需要的具体资料和信息类型随着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变化,但是基本思路是普遍适用的。布兰奇(Branch et al. ,1984:274-278)和博尔杰(Burdge,1998:22-25)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简言之,二手资料不是研究者亲自采集的数据类别,而是主要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数据。二手资料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描述性的(如文字材料、图片、地图等)和数量性的(即诸如官方统计等数据)。

使用二手资料的理由包括如下方面:

- 二手数据一般容易获得,许多是基于计算机可以阅读的形式或者可以从互联网上直接获取(和亲自采集数据相比只需花费很少的精力),因此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尤其是遇到有最后时限要求的项目,这在社会评估中是常有的事。
- 使用二手数据一般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比,特别是和执行访问、问卷调查和观察等方法相比较(也就是说已经有人为这些数据的采集支付了费用)。
- 二手数据一般是关于地区整体人口状况的资料,因此比研究者自己所能采集的任何数据在统计和总体分析上都更加全面。
- 二手数据可能是唯一可得的数据,对评估工作而言,实际上没有时间和渠道收集其他更大量的原始资料。
- 官方统计,从定义上看,是可靠性的标志。

社会评估中使用二手资料的例证包括:

- 产生一个人口特征剖面,也就是确认总体人口的状态,尤其是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以及和其他地区的人口相比有什么特点。
- 为准备评估地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趋势报告提供支持。
- 提供地区的交通指南(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如地图等。
- 评估基础设施以及诸如学校等社会服务的可得性和效用。
- 评估住房和住宿的可得性,包括价格等。
- 确认商业运作的类型和当地经济的状况(可参见第 7 章)。
- 洞察社区的日常生活和事件。
- 分析当地的交往、社区群体和网络(如名人录)。
- 确认社区一般资源的变化。
- 对相似地区在类似环境下的事态变迁进行比较分析。

评估初始阶段的有益数据

在社会评估的初始阶段,如定位分析,最好从使用描述性资料开始,包括地图和照片、旅游指南和参观者信息、文字历史资料、当地和区域的报纸、电话号码簿的“黄页(yellow pages)”和“白页(white pages)”或者企业名录,以及最重要的——已有的其他社会研究或者其他用途评估的资料。很多现有资料可以利用流行的搜索引擎和具有搜索功能的站点从因特网上得到,但要注意检查资料的有效性。

在初始工作以后,需要研究更详细的定量数据。有很多有帮助的数据源。其中最明显并容易得到的是关于人口和/或家居的普查(census),尽管普查数据在社会评估中的使用常常出人意料的有限。

人口普查资料

大多数国家实施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如新西兰每 5 年做一次人口和家居的普查)。人口普查提供了一个国家最综合的社会数据,而且一般细化到区域和社区层次。普查数据产生于缜

密的调查,在每个地区都覆盖了100%的人口,并且各种类型的普查数据具有一致性,因而,人口普查数据是高度可信的。

人口普查一般可以提供不同层次的数据,从国家水平到州和地区、省或者区、城市和镇、郊区、村庄和集聚点,下至所使用的最小"建筑单元(building blocks)"。这种逐步建构数据的分层系统也有助于利用一些专门为普查技术服务而设计的地理信息系统进行自身映射(mapping)。人口普查技术也具有潜力转置用于另外的领域,如当地政府的管理、部落发展,以及诸如健康机构或学校等社会服务组织的运营。

需要借助人口普查系统的地图和知识,对不同水平信息进行汇集和整合,它们才能够被精确解释并被社会剖面分析运用。

人口普查数据对社会评估早期阶段最直接的价值是帮助形成人口和历史剖面(也就是社会宇宙方法中的人口和土地使用范畴)。另外,它们还能够提供关于人力资源和社区生活水平或者特别人口群体的多种基础资料,并可演示其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然而,人口普查数据的效用最终取决于使用者对已有材料的熟悉程度。有许多途径可以用来创造性地开发这些数据,并将获得的数据与其他途径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和融合。因此,对评估从业者而言,提高对人口普查数据特性以及国家人口普查部门提供的相关服务的熟悉程度十分重要。

下面是在区域或者行政区水平现有的一些代表性的人口普查变量:

- 居民男女性别人口数。
- 男女性别的年龄人口分组。
- 男女性别的种族出身。
- 男女性别的婚姻状况。
- 男女性别的职业。
- 男女性别的就业率。
- 男女性别的就业领域。
- 男女性别的收入。
- 男女性别的社会福利金。
- 家庭构成。

- 住房类型或者建材类型。
- 住房或房基地的保有权。
- 住房占有空间的水平。
- 住房的各种设施。

人口普查机构、经济规划部门和社会福利机构经常根据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制作各种报告。撇开节约研究者时间不说，这些各种各样的概况报告还常常包括有价值的比较统计资料和计量指标，诸如抚养比率、劳动力参与率，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指数等。概况报告可以从机构网站或者图书馆获得，其中时间序列的资料对历史回顾和趋势分析有所裨益。

表 6.2 给出了一个地区剖面经常使用的一些典型人口统计变量例证。当然，根据本书强调的问题驱动思路，为每个评估建构一个具体的变量清单以避免陷入教条的方法十分重要。

表 6.2 人口剖面的变量例证

变 量	使用的代表量度
总人口	数值
近期普查反映的人口变迁	百分数
性别人口	百分数
15 岁以下人口数	数值和百分率
65 岁以上人口数	数值和百分率
种族构成	百分率
教育水平	百分率
个人收入低于某值，即低收入人口数	数值和百分率
个人收入高于某值，即高收入人口数	数值和百分率
家庭收入，分组	数值和百分率
主要产业组别	数值和百分率
主要职业组别	数值和百分率
劳动力市场有薪雇佣数量	数值和百分率
家庭数	数值
家庭平均规模	数值
“大”家庭数	数值和百分率
住房类型（如建筑或屋顶材料）	数值和百分率
住房自来水供给，厕所类型	数值和百分率
有权使用的交通类型	数值和百分率

上文已经提到过,从人口普查数据概览组合需要的资料时,需要注意人口基数是否已经变化或者变量分类可能并不一致。

其他官方统计

官方统计数据通常可以通过统计机构得到。例如,新西兰统计机构除了人口普查之外,还提供很多主题领域综合的官方统计数据。数据设置的范围和效用在各个部门的服务指南中都有描述。另外,官方统计名录列出了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收集或者掌握的信息。其中许多统计资料可以从官方网站上获取(www. stats. govt. nz)。在美国,关于社会、人口和经济统计的官方资源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www. census. gov)可以得到。该网站内容包括新闻发布、期刊订阅服务以及搜索引擎服务。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www. abs. gov. au)提供澳大利亚及各州与管区的统计概要,以及当前主要经济和社会指标统计值。

社会评估中最常使用的统计资料有经济运行数据,就业和失业资料,社会福利对象,家庭收入和支出,农业、制造业和零售业等产业部门普查资料,商业统计,信用和开发贷款,健康统计,教育机构和学校学生名册,房地产评估,住房开发,治安和审判(犯罪),环境管理信息如规划内容,社区设施,交通(车辆登记)和基础设施资料,以及游客量。

二手资料的其他来源

下列二手资料的来源被证明常常对在当地开展实地研究大有帮助:

- 提供铁路和道路、礼堂、医院和教堂等地理、居住和基础设施快速指南的各种地图。
- 公众联系办公室和信息中心,尤其是市民意见咨询办公室、社区资源中心和社区名录。
- 地方议会/郡县办公室,特别是那些有地方规划者或者

有专人负责背景资料及地方社会概况与监测的机构。在早期确认任何发展项目和其他种类的社会变迁在当地议会备有文件或者提交过材料十分重要。

- 当地就业服务部门和培训机构。
- 学校和幼儿园。
- 当地的住房、房地产和住宿服务部门。
- 当地和区域图书馆。
- 公共和私人博物馆。
- 社区中心和公告牌。
- 宗族组织和活动记录。
- 当地医院、医疗中心和健康机构、公共或社区健康服务。
- 能源供应机构（社区迁入，迁出的最新信息）。
- 报纸、社区简报、广播和当地电视。
- 汽车协会办公室和业务指南。
- 商业名录和名人录出版物。

表 6.3 提供了统计性二手资料当地来源的汇总。

表 6.3　统计性二手资料当地来源例证

资料类型	资料典型来源
当地人口变迁	出生和死亡记录、学生名册、新的关联信息/人员流动，例如能源供给变化给出了最新迁入、迁出信息
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失业	地区就业服务办公室
地表使用和农业	农业推广服务部门、农村信贷机构
教育	教育当局、学校董事会、学校办公室
犯罪	警察局、司法机构、法院
健康	卫生当局、健康服务提供者
住房	住房管理机构、社区住房组织、房客组织、房地产商/房地产经纪人
其他住所	旅游组织和游客信息中心、住宿调查、游客指南

续表

资料类型	资料典型来源
土地使用分区等	当地议会、地区和当地规划、建筑许可、资源使用准许和许可
房地产评估	房地产商、评估机构、当地议会
运输和交通	交通量计数、车辆登记、事故记录

表6.4提供了描述性二手资料当地来源的汇总。这些社会剖面需要的资料渠道更为完备。

表6.4　描述性二手资料当地来源例证

资料类型	资料典型来源
商业活力	电话簿、商业名录和名人录出版物、当地议会/郡县办公室、旅游指南/小册子、报纸
社区和社会服务/俱乐部和当地组织	社区名录、当地议会、图书馆、区社会福利办公室、社会服务理事会、国民咨询办公室
土地所有权/位置和使用	推广服务、农民组织、房地产中介/经纪人
社会和经济变迁历史信息	当地议会、郡县(官方史料机构)、当地图书馆、旅游和游客指南、当地博物馆、历史研究协会
娱乐方式	当地议会/郡县娱乐业官员、户外休闲中心、场所俱乐部和组织、游客信息中心、社区调查
种族社区和问题	种族当局和议会、年长者、当地政府种族机构
社会问题和需求	学校、卫生诊所和社区健康工作者、社区资源中心和当地服务提供者
社区总体活力	报纸、当地电台、公告牌、地区电视
先前的社区调查	一般覆盖社区娱乐、当前和将来面临的问题和需求、社会服务,以及包括学校项目在内的规划问题等

性别分析资料

在大多数国家,在挣钱机会和社会角色等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的性别差异与生俱来。性别差异在评估相关的人口与社区剖面变迁分析中反映出来。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可应用于效应评估。例如,在评估一项工程时可以预期:建筑工一般主要是男性,而操作工则大半是女性。建筑工和操作工对当地经济、家庭和社区活力的含义可能是不同的。工作方式的不同可能影响男女不同性别对社会评估过程的参与,如选择社区会议在一天的召开时间将影响男性或女性能否前来出席。

关于工作和其他活动的性别界限信息可以通过活动剖面(activity profile)分析得到。这种方法运用一个包含许多变量(活动类型)的简单矩阵来描述男性和女性的活动。矩阵尽可能使用二手数据进行完善并随后用作确认和填补数据缺口的引导。活动性质尽可能定义完整,应当包括每天和每周代表性的时间,还要适当考虑季节性变化。如果要求进一步细分男性和女性纵列的每一个小格,那么可以将年龄维度加入矩阵。准备一个活动剖面分析矩阵的典型变量包括:

- 从事的有酬工作的种类,包括工作性质、技能要求、就业水平、薪金水平。
- 从事的家庭无酬工作的种类,包括子女抚育、清洁、照顾病属、家务管理。
- 从事的家庭商业和农场的工作类型。
- 志愿劳动,对社区活动的无酬贡献。
- 教育和培训活动。
- 休闲与娱乐活动。

性别分析进一步的关注点是使用和控制资源的权力。资源具有许多特性,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矩阵进行初始评估。然后评估者先用得到的资料对矩阵进行完善,再执行必要的研究以弥补数据差距。用于准备一个关于使用资源权力矩阵的典型变量包括:

- 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权。
- 诸如食品、燃料和衣物等家庭资源的控制力。
- 家庭现金收入使用权和控制力。
- 贷款的使用权。
- 接受教育的权力。
- 获取信息的权力。
- 享受自由时间和休闲的权力。
- 拥有从投票到代表资格的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力。

二手数据的使用和演示

二手数据的使用和显示十分重要，不适当使用将给阅读和引用社会评估报告的决策者带来误导。总体上，二手数据有两种使用途径：(1)绝对使用法，即不使用其他信息资源或参考。(2)比较使用法。很多从人口普查和其他统计资料衍生的，包括定量指标的数据(如人口年龄剖面、抚养系数、住宅拥有率、失业率、平均收入)只有和参照点资料(如人口总量、区域人口、农村人口、不同时间的人口)，或者和不止一处的地方或人口资料相比较才有意义。

材料的使用将引导评估小组根据研究结果进行相关决策。一个有效的办法是用图表和直方图配上一定的对数据主要观察结果的描述和总结来进行对比演示，但要避免繁琐的表格和冗长的评述。个人电脑中方便的制图和统计软件以及电子数据表程序为数据分析和演示提供了相当的创造力。然而，仍要坚持"保持简单(keep it simple)"原则，以避免复杂图表。社会评估报告应当具有良好的可读性以保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所理解。

案例研究6.1提供了一些报告演示方式的例证，包括用条线图(bar graph)表示诸如年龄-性别结构等信息。如果组合使用，条线图也可以反映出诸如失业率变化或者人口规模发展的相对趋势。饼图(pie graph)则用于表示诸如研究区域的就业类型或者劳动力产业分组等分类信息。

案例研究 6.1
查塔姆群岛的社会剖面

1989 年，新西兰政府对其在偏远的查塔姆群岛的经济资助和管理进行了全面审查（Baines and International, 1989），对群岛的资源、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政府政策变迁影响等方面执行了全面回顾。全部工作由 13 个专家组成的小组经过 10 周集中努力而完成。其中，前两周实施了定位研究，初始田野作业和社区咨询在第二周执行，关于人口、住房和经济活力的综合剖面分析在第一周形成了初稿并为田野调查提供了参考。接着，剖面分析报告经过提炼，形成了最终报告的附录材料，而其他回顾工作也同时不断推进。

2002 年，成立于第一次审查之后管理一个发展资金以促进群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查塔姆群岛信托公司发起了又一个十年发展的审查（Baines, 2003）。审查小组与当地社区紧密合作以评价近十年的变迁并对正在推进的方案提出建议。在关注社会和社区存在问题的同时，审查小组运用了多种统计数据和其他二手资料，为评估报告提供渔业、农业和旅游业等关键部门的分析。剖面分析的资料都摘自已有的统计和报告，特别是人口普查数据。这些以图表形式呈现以备实际查阅需求的二手资料在最终审查报告中同样以图表形式反映。举例来说，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数据涉及社区的发育能力以及岛上缺乏初级中学等社区问题（图 6.1）；家庭供热类型和依赖昂贵进口燃料发电的成本相关（图 6.2）；和新西兰总体数字相比，住房的保有权状况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图 6.3）。为了便于比较，在此为每一个变量给出了新西兰总人口的条形图。

通过专题地图（thematic map）演示社会数据是表现人口社会特征空间分布的一种有益方法。专题地图还常常用于帮助评估社区的社会需求和服务，例如，图示诸如 6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家庭平均收入或者住房类型。有些国家提供可在个人电脑运行的人口普查数据的专题地图系统。社会结构、邻近地区和社区资源分布的主要特征在地图上一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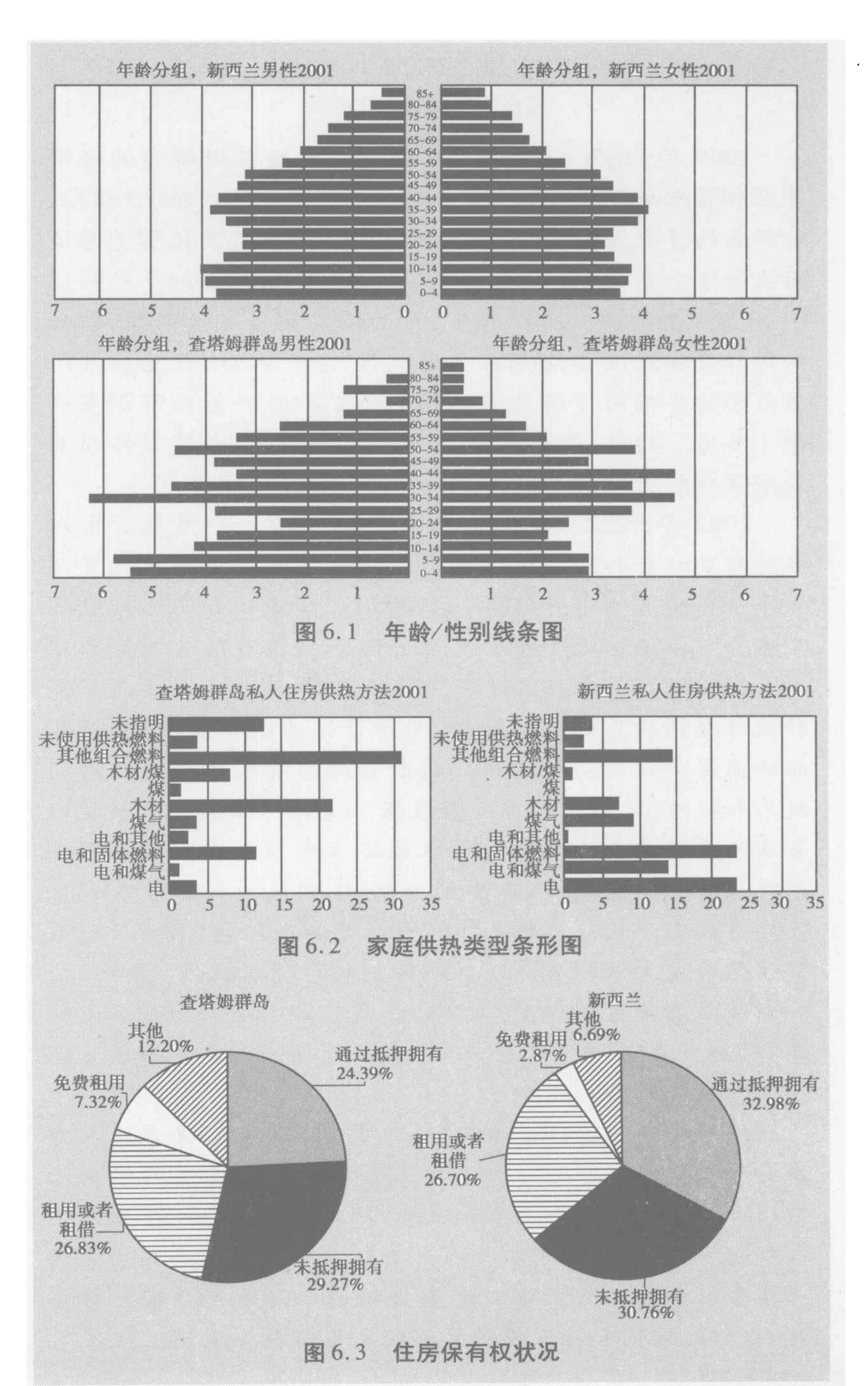


图 6.1 年龄/性别线条图

图 6.2 家庭供热类型条形图

图 6.3 住房保有权状况

然(图 6.4 和图 6.5)。在这两个案例中,基督堂市和新西兰家庭供热采用的固体燃料的类型在分布图上展现出来。一个分布图显示大部分住房依赖煤,而另一个分布图则显示大部分家庭依赖木材。可以很容易发现在东部老郊区燃煤最为常见,反映出该地区老式住房类型(明火取暖)和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西部新郊区则主要燃烧木材供热,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地区。地图分析有助于资源发展政策的战略管理,如对空气质量管理方案而言,应该帮助低收入家庭转换固体燃料以减低冬季严重的空气污染(Baines et al.,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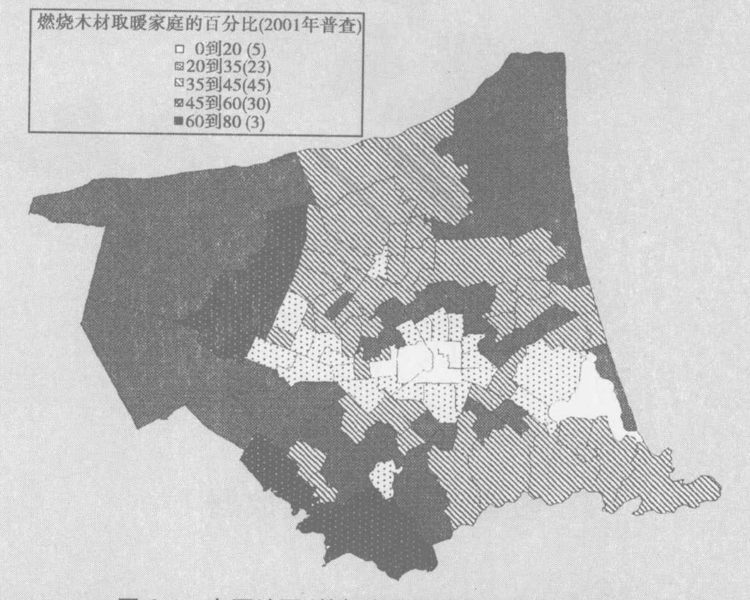


图 6.4　专题地图:基督堂市燃烧木材取暖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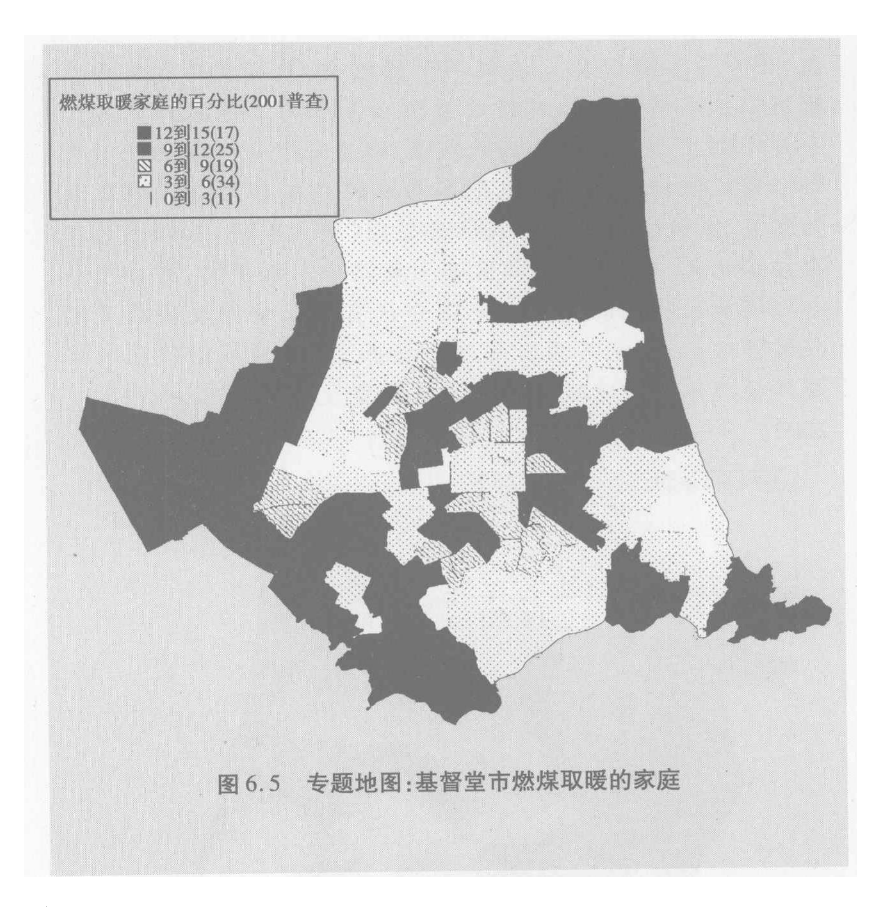


图 6.5 专题地图:基督堂市燃煤取暖的家庭

收集和使用调查数据

本部分讨论如何使用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获得的数据。调查运用许多技术收集社会资料,问卷(questionnaire)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种。除此之外,诸如系统观察(systematic observation)、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s)和选项计分法(option scoring)等同样都是值得采用的调查方法。

调查的特征是数据具有结构性或系统性设置,如众所周知的变量样本矩阵。其中,研究者为相同变量或特征收集至少2

例而通常是许多样本的信息。该种矩阵最简单和最为熟悉的案例是政治民意测验，其报告会显示人口的 x% 支持 Y 党。表 6.5提供了另一个案例。

表 6.5　变量样本矩阵案例

	个体特征(样本)			
变量	1	2	3	4
性别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年龄(岁)	42	53	49	23
当前工作年限	4	14	1	2
受赡养者人数	2	4	0	1

因此，调查是一种通过系统测量技术反映一系列样本信息而形成数据矩阵的研究方法。矩阵中的变量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是否存在某种模式。

马什(Marsh,1992)提出调查的主题必须依托一个社会背景。根据第 3 章的逻辑，这一限制对评估者而言并非多余，也就是主题必须具有“社会性意义(socially significant)”。如此，收集社会评估数据的调查项目可能包括：实有住宅数目列表、家庭设备和交通工具、社会服务、有形的(physical)或其他基础设施、储蓄和信贷以及娱乐资源。

对社会评估中以问卷为基础研究的一个常见批评是该方法采用的技术和分析具有技术专家决定论和人为操控性的倾向。当然，这种批评也好预防，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将社会调查仅仅视为一种获取社会信息的方法，特别是将调查技术纳入第 5 章所述的分析归纳法的框架而使用。

社会调查获得的不良名声通常不是针对方法本身而是它的应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产生于一个普通的信念，即认为社会调查是一种最容易和最适宜的获取社会资料的方式。然而，社会评估者在执行或委托问卷调查前应当关注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考虑问题的性质、其他类型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备选方案的成本效益。评估者特别要考虑到大多数评估所共同面临的时间和经费问题。

另一个问题起源于关于执行社会调查不需要任何专业培训的错误观念。正如任何需要技能的事业一样,评估者越有技能,研究结果越是完美。如果社会调查是收集社会评估数据最适宜的方法,那么,研究者或者研究小组应当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应当向有经验的专家寻求建议和帮助。从事社会调查和分析的组织,比如说政府或私人部门的研究机构、大学的社会科学部门、社会调查公司和咨询机构,其职员常常拥有相关的技能。

社会调查的过程

本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供全面的"如何做调查(how to do it)"的论述。因此,下面仅对这种方法的一些潜在易犯的错误做一个简要概述以为评估者提供警示。关于社会调查的优秀文献很多,为如何使用该方法提供了评述,本章下文也会适时给出参考文献。

在社会评估中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点是,无论选择什么形式,社会调查必须在评估的整体布局中执行。社会调查自身很少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足够信息。因此,如第5章的观点,将社会调查仅仅视为获取描述、理解和详细说明有关问题性质信息的方式之一是适当的。和社会评估中应用的其他任何研究技术一样,社会调查的使用也是问题驱动的。只有根据面临的问题确定是获取某种信息最适宜的手段时,社会调查才能被使用。而在任何规定性背景中确定什么是最适宜的手段并不容易。下文关于社会调查过程的简明流程图可以帮助社会评估者进行相关决策。

研究过程,即用于执行社会调查的程序可以简化为四个基本阶段:

I	➡	II	➡	III	➡	IV
界定问题和数据需求		形成研究计划和问卷		执行研究计划		分析和解释研究成果

Ⅰ. 问题界定

在社会评估中，调查问题界定和研究对象陈述一般见于调查概述。然而，这些简述通常不够完整或者缺乏细节。考虑到经常应用于社会评估的狭窄定义（注意一个业外人士使用“调查”术语替代“评估”术语的次数），“调查”的含义甚至被用为社会评估所做的最初概述来规定就不足为奇。为澄清评估需要什么所付出的努力从来不会白费。但澄清可能需要与评估框架中的关键人物磋商，包括变迁的支持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理想地看，关于执行调查以及调查类型的决策，应当在定位工作全部完成以及对一些二手数据分析之后做出。

一旦研究问题得到界定，与评估有关的数据源得到回顾，评估者就比较有把握确认需要哪些数据来弥补各种资料缺口。将调查和其他可以执行的技术一同考虑，就有可能决定哪个是收集资料的最佳方式。应当记住的是调查既可提供定性资料，也可提供定量数据，而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设计则由问题性质和三角测量程序（process of triangulation）所支配。

此阶段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评估的政治背景和评估研究结果使用的可能性。例如，如果研究结果需要与其他学科的成果一同在正式听证会上发表，那么，相比之下效度（validity）和信度（credibility）就很重要。正式听证要求报告使用正式的表格和大量数字，而且数字要符合惯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to two decimal places）。评估从业者必须遵照这些参数要求做相应准备。研究方法论的潜在适应性是社会评估的优点和灵活性的一面。所以，数据类型的选择及其最佳的收集、分析和报告方式取决于数据最终使用的背景。

Ⅱ. 调查研究方案和问卷的设计

调查的准备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即调查研究过程。为获得有效信息需要进一步确定调查技术的具体细节，包括需要的资料类型和最容易收集它们的方式。在此假定调查恰是提供所需信息的最佳方式，那么下一个任务就是确定调查总体

(the survey population)。

通常,目标人群随着评估过程的推进和研究问题的细化而变得显而易见。如果目标人群不清楚,那么可能需要运用二手资料或者通过咨询做进一步努力。

调查人群一般很小以致不能代表全体成员的意见。此时需要考虑样本的大小(sample size)和代表性问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样本越大,结果中的预期误差越小。但是过了一定的点,增加的样本量的收益递减,因为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调查的成本也在增大。迪沃斯指出:"……样本规模由两个关键因素而定:调查需要的准确度……与研究的关键特征有关的人口变异程度。"(De Vaus,2002:80)可以说,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关于如何达到调查内在要求的讨论。

调查程序的下一个任务是建立样本。样本的类型主要有两种:概率样本(probability)和非概率样本(non-probability)。在概率样本中,研究总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出现在样本中,而非概率样本的情况不是这样。

多数社会调查是概率样本类型,有助于研究者尽最大可能为研究成果增加相关设置,从而摆脱系统谬误(error)和偏差(bias)的影响。概率抽样的类型主要有五种,即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系统选择抽样(systematic selection sampling)、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聚类抽样(cluster sampling)和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选择抽样类型的依据主要有准确性的要求水平、调查可用的资金大小、抽样框架的质量以及资料收集方法。实际上,每种抽样类型的具体原理在关于社会研究技术的所有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

有时,概率抽样技术的应用既不可能又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则会采用非概率抽样。非概率抽样技术包括具备样本抽样(availability sampling)即所知的偶遇抽样(haphazard sampling)、"典型"人群抽样("typical" people sampling)、配额抽样(quota sampling)和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维斯伯格和鲍恩(Weisberg and Bowen, 1977:26)对各种技术的相对优、缺点做了有价值的总结(见表6.6)。

表 6.6　抽样类型

	抽样方法	优　点	缺　点
概率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	抽样误差(准确度)可以估计	被调查者过于分散;需要调查总体列表;周期长,成本高
	系统抽样	方便,准确度可以估计	研究总体列表常常过时;周期长,成本高
	分层抽样	确保足够的代表性;一般能降低误差;误差可以估计	有时需要加权,成本高
	聚类抽样	准确度可以估计	误差增加,可估计;成本相对不高
	多阶段抽样	对大研究总体而言,成本低于简单随机抽样;误差低于聚类抽样;准确度可以估计	误差比简单随机抽样大;成本比聚类抽样高
非概率抽样	偶遇抽样,典型人群抽样,立意抽样	可以得到的样本,特点是成本较低	和调查总体缺乏必要关联;准确度不能估计;可能出现偏离中产阶级或其他误差
	配额抽样	自愿样本,成本低	和调查总体缺乏必要关联;准确度不能估计;可能出现偏离中产阶级或其他误差

注:引用自 Weisberg and Bowen, 1977:26

在结束抽样讨论之前,关注一下无回答(non-response)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各种缘故,样本中的部分对象或者拒绝成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或者通过任何常规手段都联系不上。无回答的群体规模一般占样本的 10% 至 40%。关于无回答群体影响重要性的观点各异,但是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努力弄清无回答是否存在系统误差。例如,如果一个人正研究不同少数族群适应“主流”文化的程度,发现只有一些族群的无回答率很高,那

么,需要采用一定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单凭经验的判断是,无回答率越高,查明无回答是否具有系统误差越重要,如一个特定的样本群体是否拒绝参与。

样本建立之后的下一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收集数据的方法。有三种常见的调查技术:邮寄问卷(postal questionnaires)、电话调查(telephone questionnaires)和面访(face-to-face interview)。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技术正在兴起,如以网页为基础的问卷调查。表6.7给出了这些技术的小结。调查方法的选择根据诸如时间、资金、需要信息的类型以及方法的局限性等因素进行决定。

邮寄问卷法的一个优点是可以相对低成本运作较大的样本。其缺点则包括被调查者没有可能澄清问卷中的问题,也没有机会把问题备份下来或者记录被调查者主动给予的评论。然而,邮寄问卷调查最常提及的缺陷是低的回收率,常常低于50%。在多数情况下,75%左右的问卷回收率被认为比较适可。有一些屡试不爽的提高回收率的方法,迪尔曼(Dillman, 2000)和格雷兹(Graetz,1985)对此做了有价值的评述。个人跟进,一般通过电话途径,虽然是最常用的技术,但是耗时耗力很快使初审中使用邮寄问卷法的优势变得荡然无存。

电话调查具有明显的偏差,即将没有电话或者没有列入电话名录的群体排除在外。电话调查对大量分散人群非常有效而且成本相对较低。该技术在保持匿名测量的同时给访问员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机会。迪尔曼(Dillman,2000)为电话调查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指南。

面访(个人化管理)的优点是给访问员和被访者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互动,但是和其他两种技术相比需要在时间、旅行费用和人力方面投入更高的成本。而且,对面访而言,训练有素的访问员是必须的。

所以,问卷需要努力建构。因为问卷建构投入的精力不足十分常见,致使许多调查在问卷设计中未能使用必须的技术。一般情况下,问卷设计可以考虑五种因素:

表 6.7 社会调查类型

技　术	用　途	优　点	备　注
邮寄问卷：通过邮寄书面问卷请求被调查者回答	覆盖人群广，包容问题多，设计的专业化要求高	匿名性，被调查者答卷的时间充分，无访问偏差	一般应避免开放性问题，充分利用封闭和多重选择问题。回答率低是一个严重障碍，需要电话调查跟进
电话调查：访问通过电话执行，一般由一个访问小组完成	可以覆盖大范围人群且成本相对较低。应用于题量较少的调查	和邮寄问卷相比较为经济，回答率也较高。结果反馈迅速。允许一定的互动。保持匿名性	回答记录通常可以直接录入并分析，尤其在抽样完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结构性访谈：调查员和被调查者面对面互动。可以包括封闭和开放两方面问题，使用提示卡和其他统一器具	用于较小的调查总体而要求高的回答率；对开放问题效果好	为访问员和受访者提供一些互动机会。允许收集定性数据。可获得问题提出和答案填写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回答率	调查成本增加，可能需要相当的交通资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如果访问员不止一个的话可靠性将降低。如果是一个访问员小组，则需要足够的培训

续表

技　术	用　途	优　点	备　注
德尔菲法: 专家小组或者关键人物各自回答系列问题直到取得一致意见。过程反复进行,经历几个回合或几轮调查评价。每一轮结束,结果总结后再反馈给每人,以此增加可用信息,推进一致意见的形成	主要用于预测,制定战略,关于后果、目前和将来情境特征与认知的鉴定。帮助确认未来的议题、问题、机会等,对复杂和非结构性问题特别有效	带来分析问题或议题的多样性、多视角和专门技能;因为答卷的匿名性,参与者能根据所想自由回答,避免了人格因素和身份的影响,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见解	参与者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基于时间限制的弃权和无回答问题。该方法需要不易获得的高水平专门技术和整合技能;依赖技术专家的总结和评论,一致性意见可能不可实现。需要有技能的研究者
选项计分: 在问卷中列示选项/问题陈述,要求被调查者在一定条件下根据相邻或者群体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一选项/问题进行选择或者估价/排列	可以在会议或者通过邮寄问卷完成以获得社区相关特征参数。需要关注样本的代表性、整体方法和选项/问题的表述和呈现	增加对计划中限制条件的理解,促进计划制定者和公众的联系,能够到达平常不参与的人群	问题和选项取决于计划者的定义。其他选项和问题可能被忽略。社区因此应当在早期纳入选项定义。存在问卷回答率低的危险。需要大量前期工作和管理调查的专门技能

- 所提问题的主题选择。
- 问题的结构。
- 问题是否能为分析和报告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 问卷的布局，包括问题的顺序。
- 问卷所获信息的分析方案，各种预期表格（Expected tabulations）。

实施任何类型调查都需要技能和经验，以使此阶段资金投入获得的信息能够带来有价值的回报。有益于评估者的优秀著作和手册很多，包括：Oppenheim（1970），Weisberg and Bowen（1977），Sudman and Bradburn（1982），Statistics New Zealand（1995），May（2001）and de Vaus（2002）。

Ⅲ. 调查实施

问卷设计完成之后的下一步工作是试调查（或称试验）。不管问卷设计如何得到有效控制，试调查（pre-testing）都是绝对必要的程序。试调查即将问卷纳入“真实世界（real world）”环境进行检验以进一步修订和发展。

试调查将帮助解决问卷长度和内容范围等考虑中难免出现的一些问题。关于问卷设计的一个经验之谈是，记住资料收集的目标仅仅是获得必须的数据。事实上这个原则是任何信息收集程序都应遵守的，评估者应当抵制诱惑或者外部压力，避免提出与评估需要信息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试调查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确定所提问题是否“有效（work）”，使用语言是否符合用意。

试调查还将帮助澄清逻辑问题，包括问卷的执行时间长短。同样需要考虑的问题还包括问卷访问的地点（例如在家庭还是在工作场所），访问时间（包括一天什么时间最佳），户外执行调查时的天气影响，或者一年中、一个季节中什么时间执行调查最适宜。其他的逻辑问题包括谁来实施问卷调查、交通需要以及访问的检验和质量控制。

Ⅳ. 分析、解释和演示调查结果

问卷调查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对信息进行检索、分析

案例研究 6.2

调查应用于社会评估的范例

调查类型和抽样方法	范　例
访问员实施的简单随机抽样	汤加外群岛发展工程包括一个农村快速评估和社会规划研究以为孤立的纽阿斯群岛制订综合农业发展计划提供准备。社会评估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提取了二手和原始两方面资料对群岛进行社会剖面分析。由于缺乏生活水平的二手资料,执行了一个简短的家庭抽样调查。调查获得了人口统计、家庭收入和支出、家用建材和设备等信息。汤加每五户家庭抽取一个对象进行面访,由当地访问小组执行。为配合问卷调查,还对农民和妇女执行了深度访问,召开了村庄会议,收集了有关发展问题的详细信息
访问员实施的立意配额抽样	作为新西兰基督堂市废水处理方案影响研究的一部分,即针对是将废水继续排入一个老海湾,还是新建一个入海口,实施了一项关于人们在老海湾和海滨地区休闲的问卷调查。另外,通过观察和图示得到了休闲活动的种类和计数资料。共有 188 名被访者接受了访问,采用的是立意、随机抽样。最初,人们自然进入研究区域积极参加休闲活动,然后被询问是否愿意参与评估,如果愿意则接受访问。每个样本参加的休闲活动的类型根据被访者组成的数目划分。与观察的休闲方式相关的每组人群被用来计算回答数目,为样本加上了立意的性质

访问员实施的立意/随机抽样	这项研究分析了新西兰几种固体废弃物管理设施的实际影响与原初规划的差异。研究包括对附近居民进行结构性访谈,样本根据离开每个设施点的距离采用数目递减的方式选取。访问获得了个人关于设施有关体验的信息。被访者先被问及问卷中未列示但他们注意到的设施影响的问题,接着被问及问卷中已列示但他们没有确认的影响问题。针对个人感知的每一项影响,另有一套问题继续追问他们的体验。另外,采用不同问卷访问了休闲客和当地商人(Baines et al. ,2003)
全体人员自填	作为一个港口城镇重新选择岛际渡船通道社会评估的一部分,执行了一项关于劳动力剖面分析的调查,收集他们的人口统计、工作类型、技能、家庭位置、上班的交通方式等有关信息。问卷发给工作中的所有职工并要求他们在完成回答后投入封闭箱内。因为调查得到了雇主的支持,被访者对研究的保密性很放心

和形成报告,而这些工作从第Ⅱ阶段(调查研究方案和问卷的设计)开始就应当着手准备,上文和有关文献引用讨论中已经有所涉及。

社会评估调查信息的分析和报告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必须始终以客户需求和社区利益为指引。需要强调的是研究成果"属于(belong to)"所有相关当事人,除非存在特别限制,这些成果应当容易为所有人得到并理解。问卷调查成果可以包含在评估总报告中,或者有时也可以单独呈列。客户,或者被调查者,在评估过程中有时可以指定报告的最终形式,或者包含调查结果的中期报告的实际样式。付诸精力检查报告的类型和格式,包括对调查研究问题的解释、获取资料的方法、用于资料分析的方法、调查发现的诠释,以及,如果需要的话,从中得出的结论。需要注意标明图、表和例证与问卷调查资料的关联。调查概要作为对研究总体的反馈手段,或者作为其他可能执行的诸如会议和专题讨论等社会评估活动的附录十分有帮助。另外,不应当试图用众多不加任何解释的复杂数据表格来呈现大量的调查资料。

结　论

社会评估需要许多资料。本章描述了获取资料的不同技术和典型途径,包括二手资料和社会调查。这些技术是本书着力论述的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应用于一个循环的框架。重点应关注评估确认问题所需要的资料。

关于在所谓的定性和定量技术之间选择资料收集方法存在两极化的趋势。接受两分法观点令人遗憾,因为意味着假定其中一种或另一种数据是最好的。但实际情况很少这样,而是在研究问题的支配下两种形式数据的结合通常能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第5章所论述的三角测量程序也需要应用不同研究技术获得的成果来推动。

二手资料的用途最终取决于它们可用的形式、反映的趋势、可靠性和精确性、它们有助于三角测量或者检验其他资料有效性的程度、资料中隐含的事实,以及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开

发资料的技巧。

调查只是构成社会评估研究方法的一个可能方面。如果应用适当,调查可以成为收集相关数据的有力工具。但是必须记住调查技术只是收集社会信息的可用方法之一,只要可能,研究者就应当混合运用多种技术以加强对研究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最后需要考虑的一点是研究报告必须兼顾委托人以及获利人和受损人不同的需要。研究成果"属于"所有相关各方,除非存在特别的限制,它们必须容易被各个当事人得到并理解。

对大多数评估而言,二手资料和调查通过咨询方式获取或执行,并在"开始阶段(hands on and feet wet)"卷入受变迁影响的群体,在第 8 章将详细论述。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以问题导向方法为核心及与其相关的社会评估技术。关于问题的早期信息、研究区域、信息渠道以及对新增信息的可能需求等初步资料在评估的定位阶段收集。

在此定位阶段,二手资料使用特别多。获得二手资料的成本相对较低,且在初步研究中节约了宝贵的时间。这些资料提供了基本的地理和历史描述,是人口剖面分析的基础,如果形成系列,则能够提供一段时间内变迁的轨迹。

普查数据是社会评估中最常使用的统计资料,能够提供评估地区多种综合图画。其他官方统计和其他二手资料,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一样也十分重要。社会调查只有在其他可能的信息渠道都用尽之后才能使用。

调查之前应当全面定义需要收集资料的问题和议题。如果认为调查是必须的,那么就制订调查计划,包括能满足目标人群的样本选择,以及采用的技术,如邮寄问卷或者电话调查,抑或个人面访。特别需要重视的是问卷设计,包括提问措辞、问卷版面设计,以及便于分析等。问卷的前测或试测是重要的步骤,如果评估小组缺乏搜寻二手资料或者执行社会调查的必要技能,那么需要考虑引入这些技能。

第7章
区域和当地经济影响评估①

The Assessment of Impacts on the Regional and Local Economy

本章是关于当地或区域经济影响评估技术的介绍。产生于规划或者实际变迁的经济影响是多数社会评估发现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区域水平,经济影响评估对资源政策和决策制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源管理立法一般以区域水平的资源政策为重心。资源政策设计需要有关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多种信息。而且,当地经济不可避免受到区域变迁水平的影响并与其相连接。政策和决策制定者将需要获得区域和当地两个水平上经济变迁的信息。

经济影响评估一般与社会评估联合执行。本章讨论的经济影响是指,与规划项目或者实际变迁、受影响地区的社会特征直接相关的后果,而不涉及国家水平的成本收益分析或者关于工程及项目财政成长能力的分析。本章也不讨论非市场价值的技术,诸如享乐主义的定价、条件估价或者用于估计"意愿购买(willingness to pay)"公共产品的选择模型,以及旅行成本的计算方法,这些可以用来帮助计算康乐产业货币投入的收益。

工程、项目和政策需要在区域经济水平上考量是因为,区域经济系统为当地经济提供了总体设置,区域资源使用、就业及其发展的方式为变迁提供了背景。在变迁的经济影响评估中,一般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总体投入的性质和水平,包括采用的技术、

---

①我们感谢林肯大学的杰夫·克尔博士领衔了本章的修订工作;我们认为本章的作者署名应当为杰夫·克尔、布莱恩·霍布森、尼克·泰勒和鲁思·霍顿。

劳动力的规模和特征，以及随时间推移对原材料与诸如交通、能源、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的需求。需要关注的被研究地区的特征则包括现有产业的性质、劳动力状况、就业、基础设施及其扩展能力和公共服务，例如住房、卫生、教育和培训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福利的供给。

在当地经济影响讨论中，小企业作为许多社区的主要元素而受到特别关注。不少区域经济变迁导致的对当地就业的传导影响都可能对小型企业造成冲击。

关于区域和当地经济变迁分析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然而，因为缺乏足够的区域、当地和企业水平的经济数据，评估这些经济变迁一般仍然比较困难。资料局限造成了区域和当地经济评估的难度，如果它不只是做一般性描述。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影响的类型

经济分析对区域经济水平上的社会影响预测极有帮助。直接经济变迁通常是显而易见,其他变迁则不是这样。因为经济、社会和环境是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故效应可以出现在系统的任何角落。投入-产出分析为确定和预测传导效应(flow-on effect)、冲击效应(knock-on effect)、下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或连锁效应(ripple effect)等非直接效应的规模提供了方法。

区域分析以经济影响为重心,社会和环境因素也可以被顾及。例如,利用投入-产出模型鉴定提议变迁污染排放的影响,其中提及的变迁类型可以有多种,包括规划变迁的评价、土地的选择使用、旅游业的影响、企业关闭、基础设施工程以及经济条件的变化(如农产品价格变化或者经济增长)。

为了辨别区域经济变迁,将它们划分出直接、间接和衍生影响等类别是有益的。直接影响是指那些产生于发展工程直接需要的影响,包括工程本身的直接购买和劳动力雇佣。例如,在旅游胜地工程建设中,直接影响包括从宾客身上获得的年收入(也被称为营业额或者产出),旅游胜地运行的人员成本和归属于所有者的净收入(利润或增加值)。

间接影响产生于维持和推动发展所必须的商品和服务的不断增加。在旅游胜地案例中,间接影响产生于旅游胜地运营所需要投入的产品,如众所周知的食品、交通、洗衣店等。当然,每一种投入都具有自身的间接影响,如洗衣店需要投入建筑物、电子设备、交通、劳力和化学洗剂等。

衍生影响是由直接和间接从工程运营中获得的新增收入带来的增量消费促进的经济活力的增加。对产品的衍生需求作为传导(flow-on)效应进一步创造了工作和收入。

区域效应的评估技术

变迁对区域的整体影响只有在考虑了间接的和衍生的，或者传导（flow-on）效应之后才能确定。例如，不同的旅游工程对区域就业和收入的创造具有不同的影响，因为它们对技术、劳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要求不同。这些投入可以在区域内实现或者从区域外引进。一个工程对区域投入的依赖越重，一般对区域收入和就业创造效应也越大。而且，区域性生产投入可以带来不同的进口需求，因此产生不同的间接效应。比较设计（alternative projects）由于兼顾了不同的消费倾向可以给区域不同部门带来额外的收入，所以具有不同的衍生效应。

乘　数

原初工程的传导效应称为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乘数因此被用于比较所有效应规模与原初影响的大小。乘数类型Ⅰ是直接效应加间接效应之和与直接效应的比率，乘数类型Ⅱ是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衍生效应三者之和与直接效应的比率。

图 7.1 是一个关于旅游胜地工程乘数的简单演示。假定在旅游胜地的住宿花费是 100 美元，其中的一部分留在区域内，而有一部分直接流入区域之外购买商品和服务。如果除从区域内零售商购买食品 25 美元外，其余投入都从区域外购买。区域外购买的成本是 50 美元，给当地旅馆业主留下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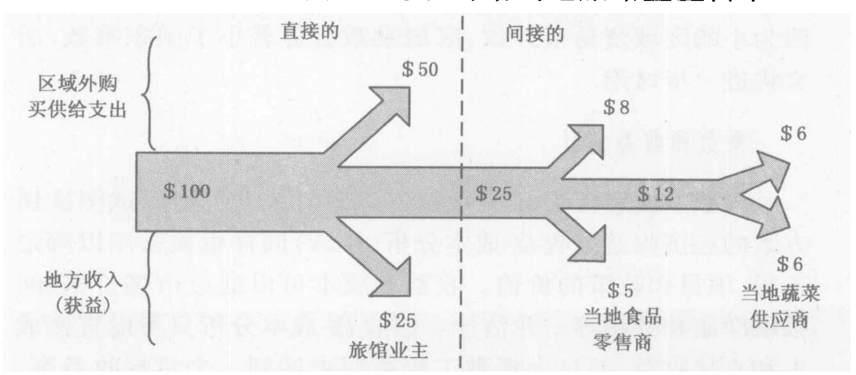


图 7.1　直接与间接经济影响

美元利润。直接营业额 100 美元因此给区域创造了 25 美元的直接收益。

间接区域影响包括当地食品零售商 25 美元的销售额,其中付给当地市场蔬菜生产者 12 美元。间接的区域收益是食品商获得的 5 美元和蔬菜生产者获得的 6 美元。那么,直接的 100 美元营业收入已经创造了直接和间接区域收益 36 美元以及直接和间接区域产出 137 美元。

本例中的直接加间接乘数(类型Ⅰ)是:

营业收入乘数　1.37[(100 美元 +25 美元 +12 美元)/100 美元]

收益乘数　1.44[(25 美元 +5 美元 +6 美元)/25 美元]

还将有衍生影响产生,因为当地新增的 36 美元收入中有一部分将在区域内花费。

可以使用的乘数有多种不同类型,因此要十分注意每个乘数的说明。有的乘数仅包括间接影响,而有的还包括衍生影响。有一些乘数通过选定的变量以绝对值描述变迁(每美元支出的就业量),而其他一些乘数则以相对值来表示(每个直接雇工带来的间接与直接就业量)。小型开放经济具有相对小的乘数。新西兰Ⅰ型产出乘数(126 个产业部门)的变化值从 1.30(公共秩序和安全)到 2.67(自建房屋者),平均值是 1.85,中位数是 1.86。美国经济体相对更大、更少开放性,其Ⅰ型乘数(91 个产业部门)的变化值从 1.25(业主自用的住房)到 3.20(煤气生产和供给),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 2.05 和 2.03。因为小的区域贸易很开放,区域乘数会显著小于国家乘数,后文将进一步讨论。

乘数和收益估计

乘数效应经常为开发商和公共部门官员引用以试图推销方案的经济收益。收益-成本分析(BCA)同样也被采用以测定工程、项目和政策的价值。收益和成本可以通过市场价格、间接税净额和补贴等一并估计。但收益-成本分析只考虑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而且大多数工程被要求达到一个目标收益率,比如新西兰政府规定 10% 以上才能被批准。实践中的计量包

含不同的价值容易导致混淆:有时计量要求二者选一,有时只有一个可以采用,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合并试图计量“总体(total)”收益。

收益-成本分析并不用于分配性目标,而是仅仅用于测量常常因国民收入而引起的社会福利的变迁。在另一方面,乘数却应用于多种经济目的,一般包括收入、产出(销售)和就业。收入乘数包括用收益-成本分析法测量的直接收入效应,所以它们不能加入收益-成本分析的产出。乘数测量值比收益-成本分析测量值大,因此它们常常得到预期的开发商的偏爱。然而,经济学家会避免用乘数代替收益测量。他们的主要理由是,除非存在特别环境,这些额外的效应只是简单地从经济体的一部分转移到了另一部分(进一步详细资料参阅:Eckstein,1958;McKean,1958;Gittinger,1972)。

乘数对解决市场运转不完美很重要,例如,当工资率不能代表劳动力的真正成本时,实行分配性目标(distributional objectives)或者多重目标(multiple objectives)就很重要。

财富分配,尤其是在一个地理区域内,是政策制定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恰如环境质量和就业一样。乘数分析为比较基于这些标准的不同选择方案状况提供了一个方法。

在收益-成本分析中纳入这些内容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目标间明确的交换关系(如 1 职位 = X 美元,或者 1 个 M 的职位 = Y 个 N 的职位,或者 1 职位 = Z 吨的排放物)建立之后才会有效。假定必须完成交换但是各方又没有达成明确协议,那么一般需要通过政治竞技做出决定。乘数成为了告知政治家作出决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的又一种途径。

尽管乘数是一种有效的总结有关社会影响的方法,但是它们一般应当与收益-成本分析一同使用,并与整体的社会和环境评估一并考虑,因此,决策不是根据一套有限的标准做出的。

投入-产出分析

乘数能够反映出区域经济的总体变迁,但却不能指出具体是哪些产业出现了变迁。确认具体领域的变迁需要更加具体的经济体内交互影响的信息。这类信息可以运用投入-产出模

型总结出来。矩阵列入了每一个产业到所有其他产业的投入需要,并且有专门区域描述家庭对每一个产业的需求,向每一个产业的输入,等等。

表7.1列示了1999年美国10个产业的矩阵的一部分。举一个例子来说,矩阵反映出农业产业每年需要483亿美元制造业的投入。表7.2展示了一个简化但完全假设的矩阵。

表7.1 美国1999年产业间交易(单位:百万美元)

	农业	矿业	其他产业	产业间交易总额	非产业间交易总额(GDP)	商品产出总额
农业	67 179	87		244 583	32 640	277 223
矿业	348	31 951		204 630	-54 230	150 401
建筑业	3 232	4 082		226 544	839 829	1 066 373
制造业	48 321	15 400		2 337 774	1 677 639	4 015 413
运输、通信和公用事业领域	13 253	12 204		736 882	617 365	1 354 247
贸易	14 602	3 682		489 408	1 189 977	1 679 385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	19 250	37 582		1 020 399	1 626 867	2 647 267
服务业	9 826	6 541		1 578 163	2 365 728	3 943 891
其他	178	31		85 089	1 053 278	1 138 367
不可比较的进口	67	2 052		74 771	-74 771	
产业间交易总额	176 256	113 612		6 998 243	9 274 323	
增加值	103 000	48 145				
产业产出总额	279 256	161 757				16 272 566

来源:www.bea.doc.gov

为了这些信息使用成为可能,典型的做法是假设每个产业都是同质的,具有一定比例的固定收益。也就是说,所有企业使用同样的技术,不管生产量多大,产品的单位成本一样。该假设的含意是边际和平均投入量要求是同一的。这样,可以运用历史数据预测潜在变迁的结果。在一些实例中,有可能运用技术差异知识进行测算,从而避免这一同质假设。

对任何产业需求变迁的间接和衍生效应均可以通过矩阵代数计算。产业需求通过技术系数(technical coefficients)矩阵

(表7.3,产生于表7.2)汇总得出。该矩阵可以做相应解释:每一美元的农业产出需要0.11 美元的农业投入,0.03 美元的货运投入和0.15 美元的劳动力投入。

表7.2 简化的投入-产出矩阵(单位:百万美元)

从/到	农 业	农业服务	货 运	其他产业总和	家庭消费	其他最终需求	全部产业总额
农业	110	1	1	600	90	198	1 000
农业服务	10	1	0	3	0	6	20
货运	30	2	5	133	20	10	200
其他产业总和	500	5	104	6 734	2 000	657	10 000
劳动力	150	10	40	1 530	505	600	2 835
其他初级投入	200	1	50	1 000	220	490	1 961
全部产业需要	1 000	20	200	10 000	2 835	1 961	16 016

表7.3 技术系数矩阵

从/到	农 业	农业服务	货 运	其他产业总和	家庭消费	其他最终需求
农业	0.11	0.05	0.01	0.06	0.032	0.101
农业服务	0.01	0.05	0	0	0	0.003
货运	0.03	0.1	0.025	0.013 3	0.007	0.005
其他产业总和	0.5	0.25	0.52	0.673 4	0.705	0.335
劳动力	0.15	0.5	0.2	0.153	0.178	0.306
其他初级投入	0.2	0.05	0.25	0.1	0.078	0.25
总计	1	1	1	1	1	1

技术系数矩阵经过数学运算得出里昂惕夫逆矩阵(Leontief inverse matrix)。表7.4 报告了美国1999 年农业列10个产业领域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反映出每一产业对任一产业每一个单位直接需求的增加所带来的产出增加的总和,加上系数列得到该产业的 I 型乘数。美国农业的 I 型乘数是2.307,每一个单位农业销售额的增加带来整个经济2.3 个单位销售额的增加,由农业(1.337 单位)、矿业(0.023 单位)、建筑业(0.029单位)等产业销售额的增加累加而成。当投入-产出矩阵通过融入家庭支出而扩大,里昂惕夫逆矩阵考虑额外的居家

收入以及产业间的需求,并提供更大的Ⅱ型乘数。

表7.4　里昂惕夫逆矩阵的农业列(美国,1999)

从/到	农　业
农业	1.337
矿业	0.023
建筑业	0.029
制造业	0.41
交通、通信和公用事业领域	0.11
贸易	0.104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	0.151
服务业	0.13
其他	0.014
总计(产业产出乘数)	2.307

来源:www.bea.doc.gov

因为快速技术变迁、一些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资料限制,投入-产出分析永远不能给出具体行动影响的完整精确图画。不过,并不能因为潜在的不精确性而抛弃了投入-产出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对许多用途而言应该足够精确,特别是应用于数量级的测算,而且理论性应用的分析使用边际数据而不是平均数据。

在此不会深入探究运行投入-产出矩阵以获得乘数的有关数据技术(参阅 Richardson, 1972 或 Miller and Blair,1985),而是把精力集中于方法的应用以测定区域或地区(而不是国家)具体行为的影响。

区域性投入-产出分析

使用投入-产出分析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大量的数据要求。收集数据建构交易矩阵任务之艰巨可以通过制作国家水平表格所需要的时间来说明。例如,新西兰1996年的终表直到2002年才出版。也就是说,到出版时,投入-产出表最新收入的数据其实已经完全过时。分析人员因此应当对只有一种信息来源的表格投入过多的精力保持谨慎。

寻求区域数据的境况并不更好。政府部门很少制作区域投入-产出表格。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加拿大和芬兰,因为加拿

大的省表格(www. statcan. gc. ca)运用于区域比其他国家更多。新西兰政府目前正评估制作官方区域表格的价值(Statistics New Zealand, 2003)。还有很多学者和私人部门研制区域投入-产出表以满足具体产业和社区需要的案例。典型的情况是,区域表并不是用原始数据建构,而是由国家数据修订而来以更好地代表区域内产业的分布。对国家表按要求进行修改需花费时间意味着区域表在研制上比相应的国家表更加过时。

区域投入-产出表生成法

区域投入-产出表生成法(Generating 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s,GRIT)是昆士兰大学发明的一种技术,它使用现有的全国水平数据。该方法假设,如果一个产业的区域产出与所有产业的总的区域产出之比小于全国水平,它将不能满足区域内部对产品的需求,那么将不得不从其他区域进口产品。技术系数将下调,由此得出有关产业的区域乘数小于国家水平的乘数。如果该产业在区域非常具有主导性,那么可以认为所有额外产出都用于了出口。

因为区域经济比国家经济更加"开放(open)",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区域表趋于高估区域内的系数。换句话说,区域投入-产出表生成法(GRIT)的假设是区域内的贸易方式在全国水平和区域水平相似,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区域越小,贸易越容易越过边界。很显然,区域投入-产出表生成法(GRIT)所做的假设很特别,在理论上没有适当的方法从全国表获得区域表。在对此问题进一步分析之后,理查森(Richardson,1972),米勒和布莱尔(Miller 和 Blair,1985)以及休因斯(Hewings,1985)讨论了区域表估计的其他方法。

改进的区域表可以收集区域内产业间交易的原始数据进行建构。但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般不会去收集原始数据:一是收集原始数据代价昂贵,二是收集原始数据十分困难,即使经济上可以承受。区域越小,当事人对一个产业越容易鉴定。然而,制作投入-产出表所必需信息的商业敏感性使得许多公司不情愿义务提供数据。

从头开始建构区域投入-产出表既需要产品物理流程的知

识,也需要它们价值流转的信息,不仅在产业之内,而且在产业之间。假如当地各产业的产出已知(不可能),技术或者标准已知(同样不可能),那么产业间的传输可以计算出来。不管当地需要的投入是否当地供给,毫无疑问需要掌握其中信息,就如家庭花费的分布一样。后者的资料可以通过家庭调查采集,但前者可能极其难于获得。正是这些问题,不包括获得这些信息的费用,推动了运用全国性数据构建区域和当地模型方法的发展。

运用区域投入-产出表生成法(GRIT)和其他方法生成区域投入-产出表的一个首要条件是需要当地的产业概况信息,主要是产出资料。该信息常常不容易获得,或者统计资料收集以后的变化缩减了它的价值。如果全区域的技术类似,用每个产业的就业量代表其产出水平是适宜之举。对小的区域而言,就业信息一般容易得到,而且成本不高。

案例研究 7.1

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影响

巴切尔及其同事(Butcher et al. ,1998)承担的关于旅游业对新西兰社区影响的系列研究揭示了区域投入-产出分析的部分作用。他们运用该方法并使用从具体社区研究中得到的优质数据为几个小型社区建立了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每个模型中,作者都生成了关于就业、产出、增加值和家庭收入的乘数。结合有关旅游业支出的调查资料,这些乘数可以预测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表 7.5 总结了其中的直接效应和乘数。

表 7.5 旅游业的直接影响和乘数

		A 社区	W 社区	K 社区	R 社区	基督堂市
直接效应	就业(全时约当数)	160	810	327	3 500	10 970
	产出/(百万美元)	17.3	82.4	27.9	310	1 103
	增加值/(百万美元)	6	43.9	11.8	126	376
	家庭收入/(百万美元)	3.9	23.7	6.8	83	244
Ⅱ型乘数	就业	1.08	1.11	1.21	1.39	1.46
	产出	1.11	1.19	1.3	1.49	1.75
	增加值	1.15	1.19	1.38	1.59	1.98
	家庭收入	1.1	1.17	1.32	1.51	1.81

A(阿卡罗阿,Akaroa)社区、W(韦斯特兰,Westland)社区和K(凯库拉,Kaikoura)社区是人口少于10 000的偏远社区,大约50 000人口的R(罗托鲁阿,Rotorua)社区是区域的中心,而基督堂是一个300 000左右人口的城市。对小而隔离的社区而言,旅游业乘数值也低,只能期望很少的传导(flow-on)效应,一般在10%到30%之间。因为经济基础较为宽广,R社区和基督堂市的乘数效应相应也较大。各地每1个直接雇佣产生直接的旅游业销售(产出)相似[每1个全时约当数(Full Time Equivalent, FTE)90 000美元至110 000美元],而不同的乘数创造了总体就业影响的更大差异。R社区只需要63 000美元旅游消费就可以在区域创造1个全职岗位,而A社区在计算了乘数效应之后需要超过100 000美元消费才能在当地创造1个工作岗位。

表7.6演示了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作为规划工具的丰度(richness),显示了每个当地经济体中由旅游业带来的工作岗位的分布。

表7.6 旅游业生成的就业

	A社区	W社区	K社区	R社区	基督堂市
住宿	33%	27%	25%	33%	20%
餐馆和咖啡馆	40%	24%	27%	40%	38%
活动	11%	19%	28%		9%
其他	6%	30%	7%	11%	5%
零售	9%		13%	16%	14%
旅行	2%				13%

这些研究的产业分类稍有差异,"其他(other)"类的组成各地有所变化。然而,很显然的是各地旅游业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在基督堂市,住宿业只出现了20%的新增就业,而A社区和R社区则出现了33%的新增就业。餐馆和咖啡馆业是旅游业重要的受益者,增加近40%的全时约当数(FTEs)。

该案例研究提供了单个产业影响及其如何随地点不同而变化的轨迹。了解这些以及其他影响对规划基础设施发展,以满足诸如商业衰落或者旅游业增长等未来预期变迁需要是很

重要的。这类方法对比较区域内不同潜在发展的影响以及稀缺资源的最佳用途正有帮助。例如,福特等人(Ford et al.,2001)比较了新西兰一个区域水资源不同使用方案的收益,参见表7.7。如果水是社区发展的制约因素,那么,绵羊和肉牛养殖可以比发电或者园艺等方案带来更大的社区利益。生成表7.7的同样模型可以用来帮助识别社区内任何一个用水方案的影响定位。

表7.7 每1 000 m^3用水的总体影响

	就业(FTE)	增加值(百万美元)
电力生产和供应	0.1	0.011
肉类加工	0.4	0.019
乳制品加工	0.4	0.023
绵羊/肉牛养殖	2.2	0.1
乳业养殖	1	0.048
园艺	0.5	0.015

在经济因素常常支配决策标准的情况下,这些类别的评估促进了关于政策和工程决策的政治进程。案例研究7.2阐述了对分析工作起作用的有关背景和政治力量,在案例中它们在一个政治化的环境中决定了体育项目的价值。

案例研究7.2

主要运动项目钓鱼锦标赛自从1967年在美国发端以来广泛流行。随着主要赞助机构如巴斯钓鱼运动员协会(已经被美国主要体育电视网络ESPN购买)及其竞争对手巴斯活动机构的成长,钓鱼锦标赛变得制度化。巴斯钓鱼锦标赛实际上复制到了全国。据估计,美国每年举行的"地方(local)"钓鱼锦标赛不下100 000场,另外有20多个职业选手的重要赛事。现在,越来越多的钓鱼运动员在奖金和酬金之外代言产品而获得体面的生计变得可能。

钓鱼锦标赛的赞助者注意到钓具和钓船产业随着钓鱼爱好的增长而繁荣起来。新技术的发明带来了创新产品卖给了比以前大幅扩大的钓鱼群体。渔场也投注了更大精力来改善管理并

提高性能以满足需求。钓鱼锦标赛在全球的发展和扩展以及延伸到海域种类，对申办活动的城市和社区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不必说带来了对清洁水路和维持鱼类良好栖息地的支持。社区期望经济利益而竞争举办钓鱼活动，包括预期到经济和推广价值而投资以吸引主要锦标赛。

对运动兴起的批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渔场面临钓鱼压力显著增长的未来发展。尽管赛事产业推动鱼放生(live release of fish)，但陡然剧增的参与导致了拥挤和一些水域钓鱼机会的受限。由于大坝建造时代和水库兴建的结束，老库区鱼类栖息地的减少和非点源污染，钓鱼者也面临前往品质钓域可能性的下降。

一些州的管理部门通过征收特别费、税，并增加举办赛事的许可条件，试图加强对赛事活动的限制。一些湖区的大的赛事被禁止，已经成为钓鱼联赛主要基地的社区开始就在当地举办赛事的成本/收益进行辩论。当地的钓鱼者抱怨钓船下水滑道难以为非赛事参加者利用，而在一些赛事活动中有多达两百条钓船下水和收回。

随着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主要赛事组织者发起并通过阿拉巴马大学在 1987 年至 2000 年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影响研究以回答某些关键问题。赛事活动的经济利益究竟是什么？在经济话语中这些体育活动的宣传价值有哪些？举办赛事怎样在成本、经济及其他之间权衡？评估揭示影响是显著的：每年主要赛事的参赛者、陪伴的家人和朋友、赛事官员和观众的支出达到 75 万至 100 万美元。每年年末在全国彼此角逐最佳钓鱼手的“传统的”节目吸引了 20 000 到 30 000 观众亲临猎获称重现场及关联活动，六天活动时间里带来直接花费 1 200 万至 1 500万美元。

赛事活动的经济乘数大小依赖于经济体的位置和区域大小，区域越大，乘数越大。然而，越来越显然的是，为本市筹划赛事的商会都声称乘数很高，而锦标赛的批评者却能获得乘数很低的计算结果。尽管审查者依靠一个值得信赖的大学商业研究中心对乘数进行计算，但如果给出的乘数是一个区间值而不是

一个绝对数字的话,似乎能使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满意。举例来说,如果直接花费是1 200 万美元,可以表述为对地区的经济利益贡献在2 400 万(使用的乘数为2)至3 000 万美元(使用的乘数为2.5)之间。

当地经济

本书关于当地经济变迁评估的方法建立在作者获得的有关经验基础之上,这些经验来自新西兰和美国,也来自许多其他国家,其中既包括太平洋岛国如汤加和库克群岛,也包括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各地经验都指出区域经济和当地经济以及社区水平的变迁周期(参见第3 章的讨论)之间存在重要关系。它同时还指出需要特别评估小企业的变迁,包括农场,需要考虑的焦点是变迁对个体和家庭生计的影响。

小企业特征

小企业(small businesses)在许多国家是就业和经济活力的主要贡献力量,它们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特别角色。德夫林(Devlin,1984)估计新西兰有大约100 000 个小商业体(不包括渔业和农场经营体),雇佣54%的私人劳动力。根据德夫林的资料,小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在32%与50%之间(以增加值为计量基础)。小企业的明显特征是雇工数量少,同时组织结构、所有权结构和经营方式比较简单。企业规模可以根据雇工数量分类。小企业的职工数量因企业所在部门不同而变化,许多小企业仅有1 ~5 名职工。一般情况下,小企业不超过50 名职工。

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结构

小企业的结构和所有权是重要的区别特征。许多小企业由所有者或者所有者与其家庭成员经营。他们倾向在所有者/经营者以及所有者家庭的财政事务中发挥支配性作用。然而,

随着业务的成长，所有权方式趋向从一人制（sole trader）和合伙制（partnership）向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转变。在一人制或合伙制中，企业债务是所有者个人的责任。企业成长之后，可以转向有限责任公司的结构。顾名思义，有限责任公司对所有者个人债务责任做了限定。

尽管新生的小企业很脆弱，但它们的所有权和经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趋于稳定。在一个调查研究中，80%的企业存在时间超过了 5 年，75%的经理在企业工作也超过了 5 年。同一调查还发现53%的企业运营时间在 20 年或以上，41%的经理在企业工作已 10 年或以上（Houghton et al. ,1986b）。

与更大的诸如银行、政府机构或大型农村服务公司等企业或组织相对照，小企业的所有人和经理倾向留守在自己的企业和社区。因此，一个区域中心的商业和管理部门将经历更多变迁，因为它们的职业方式和小镇不同。所以，大镇的商业社区可能比小镇对变迁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当地企业经营者一般在小社区的生活中发挥整合的作用。在一些农村地区，男性依然主导着农村企业，但在许多地方妇女在企业经营和所有权方面开始发挥积极影响。在社区的社会生活中，企业主/经理源自各自的企业可能拥有高的地位，因为他们对当地就业的影响令人尊敬，或者因为他们诸如面对变迁的领导能力和创造性等个人品质对社区具有重要意义。企业所有人/经理很可能参加了社区组织，充当地区委员会的选举代表。

当所有人或者所有者们亲自经营小企业时，决策制定与社区关系密切，日常经营决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经济前景以及当地经济发展信心的影响。企业经理的信心是当地经济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关于人员雇佣或者发展投资的意愿是反映当地企业部门对变迁可能的反应方式的指标。

顾客消费形态对小企业和当地经济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时间以及不同资源周期的表现不同。在新西兰农村进行的一项关于林业部门家庭消费形态的研究（Gold and Houghton，1985）演示了这一影响。尽管和其他部门家庭相比，林业部门家庭年收入较低，同样年支出也较低，但是他们更大

比例的花费是在当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当地经济的重要元素。在这类案例中,除了在区域水平的任何评估之外,对林业部门劳动力变迁的评估还需要考虑对当地企业的传导效应。

影响小企业的典型问题

小企业与众不同的特征将影响它们置身于其中的当地经济和社区受变迁影响的方式。社会评估特别应当考虑小企业面临怎样的束缚以致限制了它们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或者反过来,小企业为什么比大企业可能受到负面效应的影响更大。

小企业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有些是特有的,尤其对新生企业更是如此。新生企业具有更高的失败率和更容易被接管。问题包括:

- 企业在一个或多个操作领域缺乏经营技能,没有一个成熟的预算系统以及现金规划,没有充足的时间或资源制订有效率的计划。长时间任期所含的薪酬计划似乎经常不能与成就贡献相称。所有者经理人与企业太“近(close)”,不喜欢“正式(formality)”的书面计划,至少在企业寻求信用准许之前。
- 小企业独自影响市场的无能一般不会被界定。因为时间和资源限制,市场营销以及有关计划不足或者不存在是小企业经营的特征。市场营销更多是“说说而已(word of mouth)”。
- 缺乏公共部门的认知或支持。和大企业相比,地方小企业存在游说中央政府的明显局限,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立法一般倾向大规模企业的活动,有失公正地使小企业处于劣势。
- 缺乏大企业可得的各种专家服务。一旦必须从外界寻求支持服务,如专业培训或通信技术,小企业将不可得或者负担不起。
- 从传统渠道融资困难,原因是被列入“高风险(high risk)”类型,其中也有资产规模有限的问题。

- 依赖一个单一大客户或产业,因而应付来自客户任何变迁的能力脆弱。这个问题在许多由一个主要产业支配的资源型社区尤其严重。
- 依赖个人(业主或者他们的家庭)。一旦业主发生任何不利变故,企业随即进入危机状态。
- 小企业业主和雇工面临更大比例的直接、严重的倒闭后果,而大企业所有人和股东一般能够将不利结果分担给一个大的人群。

许多国家通过中央政府机构或区域政府来对小企业提供资助,多边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对此也积极行动。激励小企业部门并帮助克服上文所指各种困难的努力通常在当地层面组织并执行。这方面的案例包括一个当地企业协会的发展,一个旅游业促进组织连续宣传了它所在地区,或者再加上一个小额信贷计划。当地企业资源中心和发展委员会也提供建议、培训并选择支持企业创业。

小企业资料的收集方法

小企业的资料从常规统计或者诸如上市企业报告等其他二手资料渠道一般不可得。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些收集当地经济原始资料的技术,尤其是要建构小企业的信息作为社会剖面的一部分。

社会评估中对作为当地经济一部分的小企业的分析,适合置于小的社区或者邻近街区这样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环境进行。研究人员应当与被访人建立融洽关系,与企业经营者建立信任和合作以有利于必需资料的收集。合作需要专业商业知识人才与研究中的企业社区建立可信性。在定位阶段与当地企业代表或者协会的早期联系是有益的。这种合作的益处之一是企业可以使用社会评估的信息实现其他目的,比如制定当地发展战略计划,或者用于当地企业社区的促销活动。

表 7.8 列示了关于小企业调查可能覆盖的主题建议。详细而具体的问题应当在考虑对评估的用途以及资料处理的容易性后进一步提出(参见第 6 章关于问卷调查的讨论)。少量

的措辞通俗的问题调查会比冗长的"学术性(academic)"问卷获得更高的回收率(参见案例研究7.3)。

表7.8 小企业调查的主题举例

变 量	典型资料收集
企业主要活力表现	企业活动的主要领域
企业年龄	企业建立年数 现任经理运作本企业年数
企业雇工	企业雇员人数,全职、兼职 企业雇员人数,男性、女性 按就业年限分组的雇员人数
企业需要的技能	按培训和/或主要技能分组的雇员人数 目前和预期的技能需求
雇工变迁	最近5年的雇员人数变迁 下一个5年雇员人数变迁的预期
企业规模	客户的典型数目(随季节变化) 上一年或会计年度的销售收入 促进和降低企业活性的因素
信用需求和使用	上一年或会计年度的长期和短期负债额 目前偿债水平 预期新的贷款需求
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未来预期	目前企业景气评价 对将来企业景气的看法商业计划

社会评估中所做的当地企业调查通常受样本数量限制,不足以进行高级统计,一般仅限于做基础表格和交叉表格分析。从企业运作人获得的定性资料将增加对当地经济描述的丰富性。

在完全保护个人私密性的前提下,将调查结果尽早分发给被访者和当地企业家群体常常是必要而有益的。一个有用的技巧是给参与者提供研究的进程报告。举行会议使当地公共部门和社区能够了解调查结果同样十分有益。调查结果和问题也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澄清和验证。在有些情况下,资料

收集和分析可以与一个当地委员会协力完成，以简化寻求合作问题。使用社区合作方法之前需要仔细准备，以保证分析和报告程序能够保护被访者的机密性。

案例研究 7.3

当地商业中心的影响评估

新西兰奥克兰为了审查全城区各商业中心新扩张的大型购物中心的潜在影响，执行了系列社会评估方案。评估既考虑了中心的功能性便利设施，主要是它们提供服务的范围和可利用性，也审查了中心的社会性便利设施。社会性便利设施包括与零售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社区服务，如休闲、娱乐及联谊场所的提供，给顾客的社区感和归属感（Taylor et al. ,2003）。社会评估的资料来自零售支出研究、居民调查和对社会服务提供者以及社区组织的访问。

为评估被提议的购物中心发展对当地相关企业的影响，对这些企业经营者或经理进行了半结构访问。简短（1 页）访问表包括的问题有企业的年龄、经营者业主身份的时间长短、雇员数量、主要的企业活动和对地区企业景气的看法。访问一般在企业机构执行，1 页纸的访问表被置于剪贴板上以便于访问员工作。不过，企业经营者也被问及提议的发展计划和关联的变化，如交通状况。接着的半结构问题建立在一系列关键词（参见第 8 章）的基础之上以便被访者对影响进行识别和对适宜治理措施进行选择。除对当地商业领域的影响之外，所列示的影响还包括购物中心的交通、泊车、噪音和视觉效果。调查结果通过社区会议和开放日向公众汇报。

社会影响的分析显示，从社会或社区视角看有理由在现有中心和其周围建立新的零售发展基地，只要有相关措施控制影响和应对变迁。评估后的修订方案使居民和社区，包括企业经营者，能够使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有所保障，增强了商业中心在宽广的城市环境中作为社会生活、社区活动和社区身份识别的焦点地位，也考虑到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发展，如交通系统。

结 论

一个工程或规划变迁的成本和收益一般在区域经济水平进行评估,它提供了与任何全国性分析的有效比较。调查区域经济变迁的可用技术有许多,都不外乎要利用二手资料和调查研究。

了解经济影响的不同类型是社会评估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可能对决策制定者有重大帮助,有助于对工程带来的机会和影响进行测定。例如,决定林业还是旅游业更适合一个经济不景气区域的开发,项目总体能创造的工作岗位量可能是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在每种资源使用的财务回报相似的情况下。同样重要的是测定每一项目推进后对卫生、教育、交通、娱乐以及其他服务的需求有多大。

当执行社会评估时,对当地经济的研究需要考虑当地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一般是小的社区或邻近街区的基础。新的大型产业或者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或者现有产业的重组对当地经济体有相当大的影响。

小企业的任何破产或者衰退都会对业主和雇员产生直接而严重的影响,而大企业不是这样,大企业的所有权和雇工分散到了许多机构和个人。而且,小企业的成功或失败与当地经济的活力关系密切,因为当地经济是它们发展的基础。在小企业数量众多的社区,如主要城区中心,社区和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更具有发散性而少有个人性。相比之下,较小的农村社区的发育能力与当地经济直接相关,相应地,当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小企业的成功。

本章小结

区域经济是资源政策分析和决策制定的重要层次。区域经济影响可以是直接的、间接的和衍生的。有许多技术可以用

来评估区域经济影响,主要有乘数和投入-产出分析,包括区域投入-产出表生成法(GRIT)。这些技术一般受到恰当的二手数据可用性的限制。

区域经济也为当地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发展背景。在当地水平,评估一般集中于小企业。小企业的基本特征变量包括营业额、雇员数量以及管理和所有权结构等。大多数小企业以传统方式经营并且在当地社区建立的时间很长。

小型社区的发育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小企业的活力,尤其是在有一个大的产业支配商业领域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社区社会结构有关键影响。小企业的运营是就业和当地经济多样性的重要源泉。

区域经济和小企业研究一般需要收集原始资料。在执行企业调查时,首先,要建立融洽的关系,保证资料的机密性,其次要将结果反馈给被访者。

第8章
社区为本和咨询技术①

Community-based and Consultative Techniques

社区为本和咨询技术是本书提出的社会评估参与方法的主要部分。这些技术对应用于社会评估过程的分析归纳法、三角测量以及资料确认至关重要(参见第5章),对第2章、第3章讨论的参与取向和使能实践的建立也同样重要。

本章首先关注参与方法的哲学和伦理学基础,考察社区的概念以指导社区为本的评估,并提供一些技术。

参与式社会评估和从业者

除了方法的需求在实践中表现强烈之外,采用社区为本和咨询技术还有其他的理由。使用这些技术的从业者相信,人们有权利参与对他们和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变迁的有关决策。另外,从业者还认识到这些决策及其后果的好坏取决于它们产生的过程。因此,目标是建立一个技术上更加胜任且符合民主和伦理精神的评估程序。

对从业者而言,这种方法包含了个人的认知:他们的观点和决策风格可能与变迁的支持者、受影响者以及评估的其他卷入者的期望不相一致。一些常常是拥有相当大权力或者关键职位者将公共咨询和社区卷入视为不需要和妨碍,或者视为对他们个人位置

①感谢新西兰基督堂市菲茨杰拉德应用社会学课题组的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对本章的贡献。我们认为本章的作者应当署名为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尼克·泰勒、科林·古德里奇、霍布森·布莱恩。

或议事规则的威胁。因此，社会评估有时需要应付或者挑战现行的规则。不过，这里有一个毫无疑问的假定前提，那就是从业者受委托的职责是推动建设性的变迁以及社区或个人的发展与增权。

从业者采用参与式方法面临不少个人挑战。在人类学中，民族志学者/田野研究者承认并能与研究对象特有的文化条件相共存是相当重要的。对作为个人变迁服务者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专家而言，一般公认的原则是首先承认和接受对方特有的心灵和行为是重要的。该原则对试图通过咨询性工作方式仔细探究利益相关者的"来源(coming from)"或者目标取向的(如第 2 章所讨论)社会评估从业者同样是重要和有益的。从业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特有的、也许扎根于哲学和伦理体系的文化或者宗教信念所型塑。这些价值观必然被咨询和社区为本的研究所考验，它们的矛盾可能于评估过程之中迸发。

使能实践的基础

社区为本和咨询方法承认收益和受损群体对提议的变迁做出反应和发言的权利。这意味着社会评估从业者获得机会在社区水平听取人们关于社区的知觉，以及诸如它的未来、问题和目前的危机等方面的讨论。这些信息可以传达给变迁的主要作用者(如工程的开发者)，并成为变迁规划和变迁管理分析的一部分。

参与式社会评估要求获得受益和受损群体以及社区积极建言，以全面界定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问题，而不仅仅是从文献和其他评论渠道收集的一般社会影响程式的翻版。参与供言要求公众能够通过适宜渠道和规定获得充足信息，并且有足够的时间消化信息和预备响应。正如富兰克林(Franklin，1991)用富兰克林支点说(Franklin's Fulcrum)所解释："尽管没有保证，公众对你工程接受的可能性和你愿意交出的控制权的大小成正比，而与你试图隐身其后的壁垒的多少成反比。"

社区为本和咨询技术有助于矫正由于缺乏影响社会变迁因素及进程的信息或对其严格控制而引起的失衡(不公正)。其方法是将有关信息及时分发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并为他们的相互商讨提供

便利。社会评估从业者也可以利用已有案例的经验以促进信息的流动。

在社区水平,当社会评估从业者分享提议变迁及其反响的信息时,社区群体也得到了增权。再通过分享当地事务如何运转的信息,从业者能够促进决策制定过程和结构的去神秘化,并因此激发有效参与。随着自身权利意识的增强并结合切身经验的价值比较,社区成员就会更加全面地考虑由发展或提议变迁带来的问题。参与带来理性而公正地考虑具体方案的利益和不当,从而创造“双赢”结果(案例研究8.1)。

案例研究8.1

两个加油站的故事

新西兰基督堂市的两个加油站是许多老式加油站的典型,提供机械服务并出售汽油及其他石油产品。两个加油站都位于从郊区到市中心的次等主干线,邻近当地的小型购物中心。在主要战略地点,拥有新的布局、自助服务气泵和“便利(convenience)”商店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加油站已经取代了大部分这种当地的加油站。

这两个加油站采用了不同方法以求扩展。一个在1972年取得了在其目前地点营业的计划许可,此处位于路的拐角,邻近10家当地商店组成的购物中心。加油站的扩展计划包括移走这些商店并占据全部的拐角。结果,该计划引起了商店的承租人和当地居民相当大的反对。当地一些个人和当地居民组织提交了许多不赞成的意见。当地议会拒绝了加油站扩展的计划许可,计划特别法庭(the Planning Tribunal)也驳回了开发商的上诉,并认为购物中心如果还存在,一定有发展潜力(Skelton, Decision C24/91:9)。开发商已经推倒了这些商店但又不能扩建加油站,场地在2004年依然荒废,居民对这种僵局感到愤怒。

第二家加油站同样位于一条路的拐角并邻近当地商店,扩展计划将占据三个邻接的住宅地,另外同样也需要移走路角一边的商店以便加油站能够在全路角都可以营业。考虑到其他公司加油站扩展面临的困难,包括上文第一家的案例,

开发商决定采用创新的工作思路，包括社区咨询的社会评估方法。

社会评估和咨询利用定位程序聚焦于当地居民和附近商店的经营者，旨在鉴定其中的关键问题，运用的技术主要有个人访谈以及与当地企业的会议。最初列示的问题包括交通量的增加及其运输量的变化、地区停车场所的不足、灯光、噪音、营业时间、机械工场的未来和区域景观。但是最激烈和最广泛的讨论集中在一座开发商拥有的内含 5 家相邻商店建筑的未来，以及它的消失对其余小购物中心的潜在影响。当地人觉得这 5 家商店的消失将影响整个购物区域的活力，特别是在面临近郊大购物中心的压力之下。居民不希望失去这些商店。

评估促使开发商修订并在几个方面加强了计划内容，其中一些变成了计划获得同意的基础，包括在所有地点建立综合景观、限制作业时段、无噪音洗车、无天然气供应、不使用旁路、为购物区提供额外停车。在这个案例中，申请方案强调了与受影响群体的协商并获得了他们的同意。最为重要的是，邻近的商店都保留了下来，而它们背后未经整理的土地得到了应用而提高了等级。购物区保持了活力中心的地位，为当地居民和过往行人提供服务，而扩展后的加油站成了它的主要一部分。

尽管有缺点，但参与式评估的优点更显而易见，包括：

- 有关效应的信息更全面，包括社会和生物-物理效应的信息。
- 使用多种当地知识和不同人群的专门技能，而不是独自依赖“专家(expert)”信息。
- 以协商为基础，如果需要，也可以调解，很少有问题需要进入费用昂贵的听证和诉讼程序。
- 更少的公众冷漠和对抗，因为人们不断卷入评估过程并没有看到令人失望的结果。
- 更多关注和建立有益的正式程序，如公众建言和听证。

- 更广泛的工程及其结果的责任共担。
- 为工程/项目运行所产生变迁的监测、治理和管理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与式评估的应用存在一些潜在的困难和缺陷,主要包括:

- 误导公众的风险,承诺可能很多但兑现的很少;变迁支持者明显缺乏通盘考虑备选方案的可能性。
- 参与者难以超越他们自己的位置思考对方的问题。
- 最小公分母决策(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decisions)的风险,一般由于缺乏各方一致同意的决策标准而引起。
- 咨询给个体、群体或社区带来负担。
- 个体或社区群体已有体验的不同决策规模和背景影响对当前工程或项目的判断。
- “吱吱叫的轮子先上油(squeaky wheels)”的可能性:个人或群体的意见主导了咨询过程。
- 咨询需要的时间较长。
- 任何在社会评估全过程内将咨询置于工作基础的失败,或者臆断公共参与就是社会评估。

社区概念

社会评估中的很多咨询出现在当地或社区水平，包括许多田野咨询工作、问题鉴定以及影响治理和管理的协调。评估工作要求了解人类交往和社会组织活动的基础，以将社会评估聚焦于当地层面。社区内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础部分。社区（Community）是社会分析的重要层面，交往规模巨大，足以包容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它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人口的和生态的分析单位。下文将阐述塑造了个体和集体行动的社会联系和交互作用，其一般规则用于社区水平的基础田野工作。

理解了社会关系形成的不同基础条件之后，就可以探索各种分离或重叠的个人和群体网络（有时被称为社区利益相关者），继而计划、执行和评价咨询性社会评估。

当地社会生活的基础知识来源于社会学关于社区的研究（Hall et al.，1983；Wilkinson，1986）、资源社区的研究以及对资源发展项目导致的变迁的社会评估（Taylor et al.，2001）。它们是分析的工具，而且因为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或者相互依赖，这些知识一般集合使用。它们在整体上解释了人际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式。它们还有助于解释社区中常见的和社会融合相对照的社会冲突悖论。

社区水平人际联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代表了个体诠释他们社会生活主观涵义的背景。例如，对血缘关系类型的分析基于家庭背景而具有主观意义，基于伙伴之情的性别分析和基于睦邻关系的接近度分析也是这样。这些知识同样为社会剖面提供了一套有意义的分类方法。

社区的基础

接　近

许多社区的一个特征是居住于此的人们之间的亲密接近

(proximity),因此接近性通常是社区最重要的基础。在有些情况下,接近性显而易见,尽管确切的社区边界并不存在。在一些农村居住地,社区唯一可见的标志可能是当地共享的设施,诸如小的学校、教堂、酒馆或者礼堂等。不过居民会乐意接受一个明确的社会边界,也通常根据地理特征进行辨认。

许多人,特别是土生土长的人们,对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及其资源以及其他自然特征存有紧密的精神链接,这就是他们或者他们亲属的居住地,这里也培育了他们的生计。

下面两个案例演示了关于接近性的社会边界。特威泽尔是一个在1970年代早期特别为一个水疗养院建设劳动力提供住房而建立的市镇,位于新西兰马更些盆地的一个田园风光之地,具有明确的物理边界。它同时也具有特别的经济和社会目的。然而,随着它的功能从原初形态扩展成为附近农村居民的中心,特威泽尔镇的社会边界变得不再清晰。它现在提供诸如学校、商店和医疗设施服务,成为交往的新窗口、就业的吸纳地、广大乡村地区旅游业的基地。同样地,崎岖不平的南岛西海岸流域由河流和山峰分割为一个个边界明显的物理空间,每个都是一个完全分开的社区。但是,良好的道路交通、当地矿业和木材加工作坊的关闭、旅游业的发展和社会服务的重组使以前的社会边界变得模糊,所以现在也不再从地形学上辨认它们。

城市通常也有代表社区所在的明显标示,一般以地形、主干道、建筑类型和商业中心等为参照。然而,和农村如出一辙,因为城区的蔓延和诸如服务更大区域的大型购物中心等新的特征的影响,城市中曾经界限分明的社区现在区分也不明显了。城市的居住地与工作区域和教育、娱乐、体育、宗教礼拜等人们集结的场所非常不同。

社会阶级

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阶级(social class)在许多社区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分割的明确依据。土地、资源、产业和企业等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界限分明。后者主要包括所有者的雇员和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工作的人群(如赤贫

者)。霍尔等说明了如何用社会阶级作为关键变量理解社区的构成(Hall et al.,1983:84)。

对社区生活中社会阶级、地位和权力的广泛分析将揭示出大量截然不同的社会分群,显现出他们住房类型和位置上的不同,以及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有的贫困者很难被确认,因为他们没有进入生活的公共领域。

社会性别

性别(sex)指男性与女性之间生物的和普遍的不同,而社会性别(gender)则更多指他们之间的社会性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随着时间流逝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有所变化。社会生活中社会性别基础上的差异包括劳动和工作实践(付薪和不付薪就业)、子女抚养和家务劳动。项目分析一般只关心男性的营利性活动,如男性从事农业劳动增加了现金收入,但是无视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只说他们在取水或砍柴禾。其实,一个工程可以给一个性别群体的劳动带来纯的积极影响,而给另一个性别群体带来纯的消极影响。在许多地方,妇女停留在糊口经济状态。女性担任户主的家庭超比例陷入贫困,由此型塑并明显限制了他们的社会生存。社会性别也对政治过程和参与,包括社区领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工 作

工作(work)是社区关系的重要基础。在农村地区,不同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不同的作业基础之上,诸如农业、林业、矿业、旅游业和渔业(Taylor et al.,2001)。有时,一个社区的主要特征由主导的工作类型决定,如矿业城镇的社区或渔村的社区。当社会关系特别围绕男性的工作塑造而成,如在伐木区或矿区,妇女和家庭的社会生活同样也成为职业社区的一部分。但在这些社区里,男性的工作地位和妇女在家中,或者在社区组织以及社会服务机构从事的无薪工作所处的地位之间一般存在明显的差异。另外,主导产业的工作也非常不同于服务业、商业或者其他少有认识的诸如户外娱乐等产业的就业。

种 族

种族(ethnicity)代表了不同群体的社会和文化身份。种族概念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不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行为模式,以至社会组织和社会地位。例如,在新西兰,为了研究土著毛利人和其他种族群体的关系,需要特别从历史中去理解"唐加塔环努瓦(tangata whenua,意思是'大地的子民')"概念。对此概念的敏感有助于提高对1840年毛利人和英国王室之间签订的《怀唐伊条约》关于资源管理的权利和参与协议的认识①。

在具有不同种族以及不断新来劳动力的农村地区,种族是社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种族同样是影响城区快速扩张的关键因素,在这里,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吸引了来城市寻求经济机会的不同种族背景的移民。扩展的家庭关系在这种类型的移民中十分重要,因为一个新地点的家庭能够从家乡地区召来更多的成员(如连锁性迁移)。它形成了城市环境中多种组织和活动的关系基础。新西兰城市最近来自国外的移民群体就是一个例证,来自太平洋岛屿和亚洲的移民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形式。

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kinship)是社会关系和网络的坚实基础。尽管霍尔等人注意到在新西兰移民社会的血缘关系并不总是具有欧洲血缘系统的丰富性,但血缘关系仍然是社区关系的主要基础之一(Hall et al. ,1983)。在毛利人的社区,以及对生活在他们部落以外的毛利人而言,血缘关系和瓦瑙(whanau,家庭)、哈铺(hapu,扩展家庭)以及依未(iwi,部落)等模式是社会交往至关重要的基础。

在许多社会里,血缘关系对家庭的位置有重要的影响。它

①毛利人的祖先在数百年前离开家乡,勇敢地越过太平洋,登陆新西兰,开拓新天地,他们是"唐加塔环努瓦(tangata whenua)",即大地的子民。1840年,毛利人与英国王室签署了《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该条约被视为新西兰的立国文献。参见新西兰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www. newzealand. com/travel/zhs/about-nz/history/history-home. cfm。——译者注

型塑着土地所有权的模式以及财富生成和传递的途径。在财富和土地通过男性或女性的继承线路向下传递的地区，血缘关系能够强化阶级和社会性别的范式。

年龄和居住时间

在不少地方，居住时间长短是社会分群的一个重要变量。年龄和居住时间(Age and length of residence)是血缘关系发展以及房产、财富和社会地位积累的促进因素。在人口快速变迁的地方，如有正在迁入的工程移民，或者即使是农村劳动力临时的季节性流动，也能即刻分出"老前辈(old timers)"和"新来者(new comers)"之间的区别。在家庭及部落交往方面，居住时间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或被称为有"根基(roots)"。不同的人群，如青年人、年轻夫妇、有孩子的家庭或者老人一般拥有不同的居住、就业和社会生活模式。

在讨论社会研究进入农村社区面临的问题时，霍尔(Hall,1987)描述了"当地的(locals)"和"非当地的(non locals)"之间的区别，这对社会评估者很有帮助。他发现这两个群体在本质上反映了"利益的焦点(focus of interest)"而不是居住时间长短。尽管如此，在许多地方，居住时间俨然是开始成为当地人的一个指标，代表着一个人享有这个特别的地方。另外，它还意味着是否拥有财产所有权的区别。土地拥有者一般是当地的，新来者如果拥有土地，就如迁入的当地人的配偶一样，一般也更加容易被接受，至少被当作"新当地人(new locals)"。在大多数农村地区，职业的和劳动阶层群体，以及因为某种生活方式而生活在某一地区的人们，在当地人看来都是匆匆过客。

宗　教

在许多西方社会，宗教(religion)对现代社区构成的影响可能大为减小，但是，在各种宗教关系是社区关系强有力基础的地方，仍然可以对时常具有种族特点的农村和城市的居住地进行区分。做礼拜的场所在社区关系中起重要作用，尽管正式的宗教参与或者去"教堂(church going)"的行为在减少。宗教群体常常为多种社会服务和志愿组织提供保护伞，从艺术创新活

动到就业创造,从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到激进的社会行动。而且,许多地方的宗教参与的复兴是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的一个要素。

咨询方法

有许多咨询技术可以运用于社会评估。咨询方法使用的最重要的技术主要来自定性研究。在其最简化的形式中,定性研究包括对个体或小型群体的个人访谈、观察以及对当地活动和社区生活的参与。定性研究可能需要采用诸如问卷调查和统计资料等定量技术进行补充。菲茨杰拉德提出了关于记录、处理和分析定性研究资料的建议(Fitzgerald,2003)。

面 访

相对于单向的结构或半结构问卷调查的资料收集,社会评估中的面访(interview)一般是动态的过程。社区成员与为提议变迁工作的任何人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一般就是面访。在其中,双方可以共享其他群体及其所思所想的信息,交换按当地方式处理事务的见解,以及对发展过程中需要卷入的正式程序提供建议。正如所指出的,当从业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当地社会,面访能够将他或她置于变迁代理机构的角色,从而体验到中介机构左右为难和选择相互冲突的处境。

面访为社会评估从业者提供了核对二手资料或其他资料(如第5章曾讨论的三角测量资料)信息的机会,也给从业者建立与社区及其成员的关系并明确和建立评估小组的角色与作用创造了条件。面访鼓励社区成员和群体参与决策制定过程,与其他当地群体和个人建立联系,并依权使用信息和其他资源。面访选择的对象一般是最受工程发展影响或卷入最深者、社区及群体成员、服务提供商等。社区成员中的访问对象最常见的是社区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关键人物,包括利益群体和组织的正式和不正式代表。典型的访问对象是:

- 当地社会服务提供者，比如老师和学校校长、幼儿园员工、公共卫生工作者及一般从业者、社区警署工作人员、社区牧师、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
- 当地社区议会和委员会成员、区和城市议会代表和官员。
- 部落或社区的长辈。
- 居民协会的代表。
- 商店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以及他们的协会和促进组织。
- 服务俱乐部和其他志愿群体的代表。
- 妇女组织。
- 体育和休闲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特殊利益群体代表（如青年、残疾人、老人群体）。

有价值的访谈对象或信息提供者还包括地区相关新来人员，具有社会科学训练或兴趣的人员、局外人，甚至是追求新异刺激的人（oddballs）。多数社会评估研究者还发现偶然的和计划外的接触可以获得十分有价值的信息渠道和见解。这种机会对澄清问题和验证其他渠道收集的信息很有帮助（参阅案例研究 8.2）。

面访给研究者提供了以下工作便利：

- 观察人们在自己环境中的表现。
- 收集社区资料（使用半结构或非结构问题设计）。
- 向社区提供有关工程的信息、以前的类似工程及其后果的资料。

需要收集的典型信息种类包括：

- 目前对变迁提案理解的评估所需要的资料（包括信息分布的范围）。
- 关于对社区结构以及它的历史、生态、经济和运作机制了解的信息。
- 鉴定目前和将来的问题，包括工程对所接触群体的影响。
- 确定人力资源及其他可利用资源的资料。
- 进一步联络和进入社区网络的信息，以便于下一步的访问和讨论。

案例研究8.2

面访

在新西兰克卢沙河谷水力发电站大坝建设提议方案的评估中,面访作为方法之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被访者家中执行面访的一个关键目的是,在河谷的广大而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识别和描述利益群体和利益相关者。该地的社区缺乏明显的接近性或者居住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特征的社会行为模式。个体面访所包括的社会活动识别、共同活动的模式、通信渠道和支持网络等内容可以在随后的面访中得到进一步核实。采用滚雪球技术(snowballing technique),从河谷区域大多数居民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关键人群中选择样本,使评估者能够识别当地各个社区的概况,描绘出当地文化的重要特征。人口统计资料和通信渠道在边界确定后进行分析。

面访同时也向居民提供了有关工程的信息,包括主要参数和组织安排。通过面访,在互动中确定了对家庭和社区能够产生影响的问题,以及他们对这些影响的应对策略。面访工作揭示出评估可以考虑在计划阶段增加对当地社区、它的历史和结构、当地农业实践以及对此的潜在影响之间的紧密内在关系进行描述。

会　议

对社区为本和咨询方法而言,参加会议无论如何是必不可缺的田野工作之一。会议(meeting)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当地群体组织的会议,主要讨论他们关心的与变迁有关的问题;另一类是作为社会评估的程序而召开的会议。这两类会议都可以观察到评估小组和当地社群双方的参与者如何交换各自的信息。

在评估的全过程都可以计划适当的会议,其中的讨论对工程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有很大意义。经过会议讨论,问题得到确认,资料得以收集、解释和提炼,结果得以证实。社会评估可以组织许多不同种类的会议和专题讨论(参见表8.1)。

小组会议

最成功的小组会议(small group meeting)一般是非正式且是半结构的。从业者一般可以通过小组会议完成访问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只不过这次是面对一个小组。因为可以观察到小组的行为动力,小组会议有利于评估人员更好地将焦点集中到具体的问题和关注目标,也为参与者向评估人员深入质询有关问题提供了机会。通过将各方成员卷入小组会议,并向特定的群体讲述了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及与其他群体互动的新方法,评估由此可以促进当地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

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机会很多,一旦出现就应当抓住。或者,会议可以由一个中间人或"关键人物(key actor)"来安排。下文通过一个煤矿开采发展项目的田野工作对小组会议技术进行演示(案例研究 8.3)。

案例研究 8.3

小组会议

为了评估新西兰西海岸一个新的煤矿开采项目方案的影响,执行了相应的田野调查。对矿工工会主席的简短访问后,2 位研究人员邀请了附近的 4 名工会委员举行小组会议。会议启动了双向的信息交换,矿工们也借此集中讨论了对他们关系重要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产生于最近政府煤矿开采部门的公司化[导致不少"临时解雇(lay offs)"]。这些问题对新工程劳动力的规划有重要意义。会议之后,研究者随后在引导下对矿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获得了传统地下采煤工作环境的极有价值的信息(新项目的地下采煤环境很可能出现彻底改变),并对矿井的经理们进行了进一步面访。

另一个有价值的会议在当地市长的推动下举行,市长很快将各大区议会官员和相邻郡县的议员召集到一起就当地的问题和对新煤矿项目方案的初步反应进行了讨论。煤矿开采项目的经理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外还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包括一次与另一个市长在当地酒馆的面谈。

随后,评估人员在研究地区通过中间人组织了邻里地区和利益群体的非正式会议,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对将要启动的治理措施以及管理战略进行了详细说明。

为达到最佳效益,小组会议一般需要5~10个参与者,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记录员。注意小组讨论的过程十分重要,这方面的继续教育文献很是丰富。小组会议需要细致筹划,要有一个焦点和清晰的目标。小组会议也需要建立会议控制的基本规则以引导讨论、调和争论以及鼓励新颖和发散的思维。这些结构性更强的小组会议常常被称为"焦点小组(focus groups)"。会议讨论的焦点通常集中在评估定位阶段所发现的有关问题。

大规模正式会议

大规模正式会议(large and more formal meetings)或者专题讨论会(workshop)需要按一定规则推进,需要来自社区的代表参加会议。它们的功能是:

- 信息传播广,特别是使用了视听演示的报告方法。
- 便于观察社区的行动,特别是有关主要利益群体的性质和权力的运行。
- 促进社区和工程双方的直接接触并有机会观察双方的互动。其中一般需要项目开发者直接应对社区的质询。

表8.1总结了专题讨论会用于问题探索和选择以及构建行动方案的技术。

"旧式(old-style)"公众会议能够提出问题,但它们一般过于结构化,常常有利于工程开发方。会议有关的个人和群体发言的议程一定是非公开的,只是在会议中才由特定的人予以披露,给咨询和推进增加了困难。有许多潜在的因素引发会议偏离原来主要的方向,如细节上的僵持、被"吱吱叫的车轮先加油(squeaky wheels)"问题所支配,或者由于对抗而受挫等。

案例研究 8.4

正式会议的运用

新西兰的奥塔哥和南部地区对褐煤发展项目的初步社会评估提供了利用会议开展参与式田野调查的案例。评估很快发现大量农民将受到提议项目的直接影响，露天煤炭开采和新的石油化工产业对农村社区和农民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潜在的意义更甚于此。农民联盟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核心组织，其官员希望研究小组能够会见他们的会员。因此，研究小组召集住在九个矿井之上和附近的有关人员举行了正式会议。

选择相关的组织参加会议具有不同区域的敏感性。例如，研究小组在一地与农民联盟开展了组织合作，但在另一地没有这样做，因为那里的农民高度独立或者是其他组织的成员。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小组就请当地的关键人物出面邀请当地社区代表并向他们推介会议。

在每次会议上，田野调查三人小组利用视听设备做了演示，描述了提议的产业项目以及截至目前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随后的讨论由研究小组引导。在会前、会后以及晚餐期间进行了非正式讨论。每次会议的参会者还填写了简短的问卷。

根据起初定位阶段面访所了解的情况，研究小组认为大多数讨论将集中在土地补偿和环境复原等问题上。但是，事实上，每个会议讨论的范围都非常广泛，为包括变迁方案的发展在内的评估提供了饶有价值的信息。

研究小组在煤矿附近的市镇和大区都召开了会议，再次由各地主要联系人(key contacts)担任每场会议的组织工作。与社会利益(social interests)有关的人士特别被邀请到会，例如，当地县规划部门官员、医生、保健护士、学校校长、警官、牧师、企业经理、工会代表等。在距离煤矿最近的城市，会议得到了延伸，从事社会-社区发展的人士和商业界人士分别举行了独立的会议，而教育、卫生、警察、贸易和当地议会以及其他组织的人士则个人选择参加。经过召开会

议,主要问题得到确认,提议的主要产业项目的影响得到全面思考。例如,假定随着工程的开工,外来劳动力快速进入城市,酗酒、新来者的融入和家庭福利等目前的主要问题在将来会变得更加严重。

围绕评估的核心问题召开了两个较大的专题研讨会,为研究小组在讨论中会晤当地人士并了解研究中有关主题的信息创造了条件。这两个研讨会相当重要,因为它们卷入并让研究地区的两个议会出任了会议的主持人,而参会代表来自地方机构的代表、政府机构、利益群体、当地专家和有利害关系的个体。第一个研讨会的重点是甄别问题,第二个研讨会的重点是修订和详细说明研究需要和进程安排。每个研讨会先由研究小组做演示和说明,接着是一个下午时间的专题讨论。

通过报纸和广播等媒体使评估获得了相关的知名度。报纸发表了研究小组起草的有关评估和会议的报告,当地电台和全国广播网络都报道了相关消息。另外,许多关于褐煤使用和研究等方面的新闻报道也见诸媒体。由此带来的对当前问题和评估小组工作较高的公众知晓率对田野调查大有裨益。例如,在会议准备和面访安排时,发现被访者通常对研究小组及其工作了解一二。媒体报道同时也将会议和研讨的信息反馈给更广范围的受众。

联络论坛

公共会议,尤其是上文描述的研讨会类,可以发展成为专家磋商会议,为社区代表和发展商提供定期的联络,新西兰怀希联络论坛(liaison forum)就是一例(案例研究 8.5)。联络论坛可以为持续的影响监测、治理和管理建立重要的支持。

案例研究 8.5
联络论坛

怀希联络会议启动于 1982 年 5 月，由新西兰科罗曼德地区马莎希尔工程的发展商怀希黄金有限公司发起。该公司及其合作者发觉有必要举行论坛以形成固定机制，“由此工程信息可以发布并得到反馈，工程的社会后果便可以弄清并得到考虑(Drury，1983:27)”。成立于工程计划早期的论坛被寄予厚望，成为建立并维系与社区关系的主要手段。事实上，论坛一直贯穿到工程建设的全阶段，证明是成功的。论坛还成为了克服环境影响报告一次性“快照(snapshot)”限制的方法，这些“快照”没有抓住社区的动态性特征，也没有考虑到任何提议变迁的可能效果。

怀希联络会议的代表组成来自怀希大区及其市郊的大多数当地社团和组织。会议对公众开放。工程计划期间每两个月至三个月召开一次的论坛，采用一般会议的程序规则，但它是非正式的，足以使公众参会者能够跟得上会议代表的步伐。论坛倾向以前期拟定的主题或问题领域为中心，通常也邀请研究地区以外的发言人/专家。社会和社区影响贯穿社区关心问题清单，至少一直到工程发展的较后阶段。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和嘲讽(难免的)，因为公司既是论坛的组织者又是信息的提供者，有能力对会议过程实施相当程度的控制。因为当地社区和论坛的一些成员热衷于从发展项目中寻求个人利益，公司被认为减少了敏感商业信息的发布。论坛的批评者认为这是有意对正当和不断增强的反对意见进行冷处理，而使其他人在不断变化的社区里难于把握发展过程的动态特征。但不管怎样，联络会议首次促使不同的群体走到一起，明显促进了对话和讨论，从而推动了社区发展。

其他咨询技术

有许多其他技术可用于激励或者执行社区咨询并获得社区在规划、决策制定和管理变迁方面的投入。其中常被提起的技术或其途径包括社区调查、当地信息办公室、工程开放日、对讲电台(talk-back radio)和模拟游戏(simulation games)(见表8.2)等。此外,还有其他技术可用于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Appraisal)领域,有时被称为参与式学习和行动(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ction,例如,参见库马尔2003年所著的综合指南,系列注释见网站 www. iied. org)。很多出版著作对此类技术做了综述和详细介绍。澳大利亚的读者可以阅读萨基斯安(Sarkissian,1997)提供的一本关于专题研讨会的手册。加拿大和美国读者可以阅读罗伯茨(Roberts,2003)以及博尔杰和罗伯逊(Burdge and Roberston,1998)提供的关于"公共卷入(public involvement)"的综述和详细描述。

案例研究8.6
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卷入

案例研究5.1介绍了社会评估应用于和汞侵入食物链有关的综合研究和政策形成过程。评估的中心所在地阿拉巴马-莫比尔河流域(Samya et al.,2003)集中了阿拉巴马州70%的人口,一个以贫困著称的地区,郡县的贫困人口比例达到20%~40%,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基础服务设施缺乏。该州钓鱼运动产业兴旺,许多居民捕捉或购买公共水域的鱼以满足营养需要。鱼体中存在高含量汞的研究发现有可能引起相关人群两极对立,从而使实施的补救政策失去功效。社会评估的首先挑战是将对政策有影响的利益相关人卷入研究过程,以避免议题讨论陷入僵局,并将生物-物理性研究发现转变为社会性成果和补救性政策。下面这些原则对实际行动有指导作用,即利益相关人:

- 有权从初期开始获得有关信息并参与对自身有影响的决策。
- 在评估过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 可以是正当的和极其重要的信息提供者。

相应地，小群体会议、非正式访谈和信息交换、研究简报和电话热线、垂钓者参与资料收集、居民专家（resident expert）知识的运用等咨询技术在生物-物理研究之前或过程之中得到应用。利益相关人包括主要的公用公司、煤层甲烷产业联合会、政府卫生部门、政府环境部门、渔场官员、环境小组、休闲性和商业性的垂钓者。

在社会蕴意方面，利益相关者从早期开始持续卷入参与研究框架设计，不仅可以避免议题的两极对立，而且能够就短期和长期的补救政策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建设性的争辩和讨论。具备研究所需的丰富知识并与政府及产业官员合作，有助于将目前的初步研究发现带入全国性“汞论坛（Mercury Forum）”。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食用产自墨西哥海湾海产品的人体中发现了高含量危险甲基汞（即有机体形式的汞）。因为这片水域是当地兴旺的休闲性及商业性渔业的基地，该议题成为了最为热门的新闻事件，汞论坛的举行，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信息，也为另外的研究筹集资金。其结果是，汞作为公共健康议题从海滨地区扩展到国家的其他淡水区域，为高风险人群提供资助的机会也相应产生。

持续推进生物-物理学的发现转变为社会性的效应能够使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进行有效互动并真正以多学科小组的优势开展工作。社会科学家帮助收集资料，生物-物理科学家以非专业语言向利益相关群体解释有关研究。工程开发方不但收到了来自科学家代表产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有价值的信息，也得到了公共水域捕鱼者对资料收集的资助以及对有关担心问题的表达。

表 8.1 咨询技术:专题讨论会/联络群体

技术	使用	优点	其他
专题讨论会、研讨会(Workshops, seminars):一般一天时间的议程,关注具体问题以及长期规划问题	适合规划人员、研究者、社区成员、政治家走到一起倾听和参与社区面临问题的讨论	聚焦于经过提炼的问题或者当地的系列议题最为有效;能够促进不同群体的聚集,交换各自观点,共同参与计划制定;形式多种多样,从以关键演讲人或论文为中心到小群体共同作业;可采用其他技术	一般适合有经验者以及愿意也能说出问题所在者;拘泥形式会打击参会者参与讨论的积极性;需要参会者有整块的时间参加会议,成本可能较高;需要有会场、扩音设备(如果有的话)、茶点及配备;全程的行政管理也是必须的
联络论坛和社区委员会(Liaison Forums and Community Committees):由组织化的、特别是半固定的来自社区组织、邻近地区的代表群体本着社区利益回顾、讨论、评价并对提议的变迁提出建议	有利于工程联络、社会监测并提供从专家到社区的信息反馈;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小组的构成、规模、立场及相对权力;能够对资源分配提供建议、警示对问题保持注意、促使集中专门知识和技能管理变迁	能够促进变迁环境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络——当地和中央政府、发展商、行政机构、社区组织和草根群体;带来当地最好的技能和经验;能够聚焦于社区的关注点和不同反应;受参与者及其委员会的立场以及他们和主要机构等的关系所影响	可能被认为不具有代表性,就像当地议会(在小社区)的复制品,如加剧了权力结构不平衡,或者追逐私利;可能难于聚焦或集中社区资源和技能;参与者可能不会真正承担义务;成员变化可能很大

脚本法评估（Scenario Assessment）：项目建议书及其备选方案的结果和影响通过脚本法进行评估；每个小组对方案脚本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比较；一般一次评估一个脚本方案；可以扩展使用问卷调查以及德尔菲法等	用于小组探索不同备选方案的影响以及训练参与者	有助于确认并聚焦影响；因为每次各个小组只评估一个脚本方案，每个方案都能得到公平对待；最终的分析决策需要技能；首选的脚本方案应当进入第二轮评估	脚本方法需要对包含的全部相关因素和假设做精心准备；可能受制于脚本准备者的个人偏见或者不充分信息的偏差；要求资料的可及性以及共享使用
角色扮演/模拟游戏（Role Playing /Simulation Games）：相互承担他人角色或者在真实的、模拟的或类似的计划情境中扮演社区以及官方的不同行动者	在小组情境中，提供设身处地体会卷入计划过程的他人的机会，包括受到的约束和影响	使人们能够接触他人的观点，促进宽容，帮助建立同情心和技能；能够创造性地选择方案	最常用于补充和完善培训和关系建构的程序；需要细致规划和分配角色；充足的信息、简明而广泛的任务报告对取得最大收益并解决所遇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一个有经验的管理者是必需的

续表

技　术	使　用	优　点	其　他
查瑞特法(Charette):集中的规划行动,参会者小组一般在几天时间内通过一系列会议讨论具体议题的相关问题,并在限定时间内取得一致认可的意见	用于集中、快速获得解决办法和一致决策;能促使深入沟通并形成良好关系;经常用于社区展望和规划讨论,但要求后续努力以保证能够执行	针对代表群体;需要全面选择代表;根据参会者的了解和关注提出问题;有助于找到解决具体问题或者处理事务的方法	要求参会者具有整块时间;但太多的专家可能抑制讨论;参会者不一定能代表社区;需要专门资金以支付合适的会场、住宿、儿童照管等费用
议题定位(Issue scoping):小组进行影响定位和评估的程序;在一个引导者帮助下,小组对社会影响进行识别、列示、网化和链化(web and chain);确定每一个影响或影响链的利益相关者;程序能被更大的小组讨论和修改;要求有主要的引导者、助手和会场	有助于咨询研究和确认议题;较大的小组(单独的或作为一个较大小组的一部分)能够快速识别和领悟一个方案或政策的影响;分担思考并且由专门小组考虑具体行动或更具体的评估;有助于建立先后次序并确认利益相关者	操作简单,不乏味,易于参与,短期产出高;有助于不同背景或不同学科的小组成员给议题排序,促进相互之间以及与变迁项目发起方的沟通;帮助对社会评估研究和有关变迁回应进行全面分析和聚焦	同时存在的小组数量受限于引导人及其助手的数量;较大的或者全员小组可能难于协调;必须设计程序保证每个人能够发言并且不为部分观点所支配

影响打分(Impact scoring):一种小组评价影响重要性的方法;小组全部人员都被提供提议方案或政策的资料;通过讨论对影响进行识别和列表;更小的小组接着根据重要性给每个影响打分并排序;每个小组的打分作为每个影响总体得分的基础	应用于小组和个体对工程等项目影响进行识别和分析以及确定它们的意义和次序	促使人们思考变迁的情境、讨论其假定条件、认识他们自身关于一个议题、地区或情境的知识,从而系统考虑变迁的影响	大的小组必须分成更小的小组(一般限于3人以下);如果没有带来对重要影响的行动或者没有对决策制定过程的进一步参与,可能导致受挫

表 8.2　咨询技术:信息共享

技　术	使　用	优　点	其　他
免费电话/热线(Freephone/hot-line):访问者/被访者利用电话为基础的系统接收或给出有关议题的信息;长途电话由赞助机构付费;电话系统可以是有人接听,也可以是自动应答	如果有人接听,电话系统可用于接收关于议题等的建议和评论;议题为大众知晓并热议,个体如果需要可以更深接触;如果是无人值守/自动应答,只能收到或给出基本信息	快捷的信息收集系统;易于使用者非正式联络,对不方便现身参与或当众说出意见者没有威胁;可以与公共信息活动协力运作	系统可能因为与议题不相关的电话而瘫痪,需要合适的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电话(费用总付)费用较高;需要处理和分析所获得信息的系统程序
信息中心/呈列(Information Centres/Displays):采用固定办公室(如街面铺房)或者流动中心(如篷车或巴士)等形式呈列有关资料;一般呈列于社区中心或会堂	用于向全体公众或具体目标群体呈列和演示有关信息并收集对提议方案的非正式反应;亦可用于议题定位和建构进一步的行动;大的机构和工程项目倾向使用这种方法	促使信息到达更多的受众,信息呈现的形式图文并茂,具有吸引力;在提案人或者研究者与社区之间提供联络点;移动或流动呈现信息能够瞄准特殊的群体和社区	需要广告、好的地点、反应灵敏的现场工作人员、适用的物资准备或交通工具以及呈列的全面准备等;不过,这些有时被认为是强权利益和统治性意见的"倾销(slick sell)",而支持者可能认为这是他们所应做的全部

广播和对讲系统（Radio and Talkback）：当地广播包括大学和社区接口的无线电台	用于准备和呈现记录、讨论和对话节目以提高社区对规划议题的知晓率以及对此做出反应	通过提供直接的公众讨论和反馈的机会，可以大范围展示将影响当地社区的议题；所有提出的意见都可以到达全体成员，其中部分成员将积极参与，因为该技术的使用一般是具有匿名性，也是非正式的	一般仅适用于浅显的、经常是单一议题“大众热点（hyped）”的讨论，听众容易迷失或者陷入混淆；个体通话者陈述他们观点的时间十分有限，其中有不少喜欢跑题；节目要求精心准备、反应灵敏的主持人以及具有社区意识电台的合作
简报（Newsletters）：采取多种形式以及任何需要的频率编辑和传送；多应用于当地政府和机构以及开发者	应用于向利益个体、群体和机构供给信息，作为与广大或者特有读者沟通的途径，激发对反馈信息或者进一步行动以及明显将到来的事件和活动的讨论	鼓励和激励公众以及特别群体认识并参与规划以及其他行动；促使广大地区的人们对主要发生事项及其反馈保持接触；易于向读者提供大量焦点信息	倾向于被认为仅是单向交流，易受编辑的偏见影响，接受者常常不会阅读；要求工作人员或研究小组进行编辑并有权使用印刷/复印设备；材料和邮寄需要成本

续表

技　术	使　用	优　点	其　他
因特网站点(Internet websites):一种公众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可以到达的信息设备;限制进入的站点被称为内联网;能提供当前所有信息和文件;一般由主页上导航,可以链接到下一个页面	对提供概要信息和详细信息都有帮助,如可提供影响报告草稿的下载;能够提供图片等	大量的技术信息随时可以提供给计算机用户而不需要得到原材料的复印本;易于浏览,通常通过搜索引擎;可以升级信息	只有拥有合适的电脑、电话线或者卫星通讯的群体才可以利用,需要快速操作互联网的能力以及其他必需的技能;通常是单向的信息流动,尽管有时也使用问卷和评论等工具
报纸(Newspapers):社区、当地和区域报纸以及专业杂志等;当地报纸经常夹带有专刊或者信息插页	可用于刊登关于规划、方案、议题的文章以及相关宣传等;可以印发简短的问卷;需要了解目标读者及其阅读习惯;是获得诸如议题、活动、俱乐部和社团、主要人物以及历史视角等研究资料的良好信息来源	利用广告、文章可以到达广大受众,反馈可以通过致编辑的信件得到;尤其适用在当地水平收集社区议题	报道形式易变且缺乏深度,特别对社区报纸而言;通过报纸收集的问卷资料用途有限;需要与媒体建构良好关系并帮助扩大发行覆盖面和更新社区议题信息;这些工作需要掌握媒体在社区的角色的知识

结　论

社区为本和咨询的社会评估包含了对社区及其成员参与有关影响社区发展决策权力的承认。社会评估从业者有责任建立双向的沟通程序并保持其方便运作，其角色因而更像一个变迁的中介机构，在社会评估过程中提供社区参与的机会。

最后一章描述的技术特别要求从业者认识到信息流动渠道的重要性以及“使能实践(enabling practice)”问题。我们认为使能实践对帮助社会评估获得“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以及用积极整合的方法改变社会评估是必要的，贯穿本书的就是这个思路。

本书提出了社会评估过程的问题导向方法，一种对工程、项目和政策变迁影响进行研究、规划和管理的思路。该方法本质上是咨询性的。对利益群体以及受影响群体的咨询从评估议题定位开始，一直贯穿其他每个阶段。咨询技术提供了关于获得议题和效应等方面定性资料的重要渠道，以补充定量数据的不足。

本章小结

社区为本和咨询的技术是社会评估问题导向方法的主要部分。然而，从业者需要理解当地社会联系的基础，诸如邻近、阶级、性别、工作、种族、血缘、宗教、年龄以及居住时间的长短。

咨询技术提供的定性资料丰富了由二手途径和问卷调查获得的定量和文件材料。它们常常形成了证实问题所要求的对信息的“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但这些技术对从业者既是个人哲学观的挑战，又是业务上的挑战。

有多种专门的咨询技术可以选择加入评估的信息库，并促进信息的流动。已经讨论过的技术包括面访，有正式和非正式

两种,访问对象是置身变迁之中的群体成员。被访者一般是关键的知情者,通过网络化的方法挑选出来。

会议是进一步可用的手段。小群体会议、讨论会和专题研讨都是特别有益的方法。大型会议使用有局限,因为它可能产生消极后果。持续的联络论坛对长期变迁影响的监测和管理则是重要的措施。

参考文献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94. Handbook for incorporation of social dimensions in projects. Social Development Unit,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Baines, James; McClintock, Wayne; Taylor, Nick et al.. 2003. Using local knowledge. Chapter 3 in Henk Becker and Frank Vancla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Baines, James and Taylor, Nick 2002. Institutionalising SIA in rapidly developing economies-the Malaysian c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15-21 June.

Becker, Henk 2003. Theory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hapter 9 in Henk Becker and Frank Vancla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Edward Elgar, Cheltenbam.

Becker, Henk and Vanclay, Frank (Eds.) 2003. Handbook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Berger, P. L. and Berger, B. 1976. Sociolog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Penguin Educational Books, Auckland.

Bowles, R. T. 1981.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Small Communities. Butterworth and Co. (Canada) Ltd, Toronto.

Bowles, R. T. 1982. Little Communities and Big Industries. Studies in the Social Impact of Canadian Resource Extraction. Butterworth and Co. (Canada) Ltd, Toronto.

Bradbury, J. H. and St. Martin, I. 1983. Winding down in a Quebec mining town: a case study of Schefferville.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17(2): 128-144.

Branch, K.; Hooper, D. A.; Thompson, J, and Creighton, J. 1984. Guide to Social Assessment.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Brown, A. L. and Therivel, R. 2000. Principle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ology, hn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18 (3): 183-189.

Bryan, C. H. 1977. Leisure value systems and recreational specialisation: the case of trout fishermen.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9(3): 174-187.

Bryan, C. H. 1979. Conflict in the great outdoors: toward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for diverse sportsmen preferences. Social Studies No. 4, Bureau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Alabama, Tuscaloosa.

Bryan, C. H. 1983.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for managing recreational conflict. In R. H. Stroud (Ed.), Marine Recreational Fisheries, Sport Training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Bryan, C. H. 1995. Social impact analysis: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Ecosystem Management, USDA Forest Service, Washington, DC.

Bryan, C. H. and Hendee, J. C. 1983. Social impact analysis in U. S. Forest Service decisions; background and proposed principles. In E. V Maurice and W. A. Fleischman (Eds.), Sociology and Social Impact Analysis in Fede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gencie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Washington, D. C.

Bryan, C. H. and Taylor, C. N. 1987. Towards an outdoor recreation resource policy. Policy Studies Review, 7(2): 349-358.

Burdge, R. 1985.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the planning process. Planning and Public Policy, 11. Bureau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llinois.

Burdge, R. J. 1991. A brief history and major trends in the field of impact assessment. Impact Assessment Bulletin, 9 (4): 93-104.

Burdge, Rabel J. 1994 (revised 1998). A Community Guide to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ocial Ecology Press, Middleton.

Burdge, Rabel J. (Ed.) 1998.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Rabel J. Brudge and Colleagues, Revised Edition. Social Ecology Press, Middleton.

Burdge, R. J. 2002. Why is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the orphan of the assessment process?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18(3): 3-9.

Burdge, Rabel J. (Guest Ed.) 2003. Special issue o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Parts Ⅰ and Ⅱ.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1 (2) and 21(3).

Burdge, Rabel J. and Johnson, Sue 1998.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developing the basic model. Chapter 2 in Rabel, J. Burdge (Ed.),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Rabel J. Brudge and Colleagues, Revised Edition, Social Ecology Press, Middleton.

Burdge, Rabel J. and Robertson, Robert A. 1998.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the public involvement process. Chapter 13 in Rabel, J. Burdge (Ed.),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Rabel J. Brudge and Colleagues, Revised Edition, Social Ecology Press, Middleton.

Burdge, R. J. and Vanclay, F. 1995.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hapter 2 in F. Vanclay and D. Bronstein (Ed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John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Butcher, G. V. 1985. Regional income, output and employment multipliers: their uses and estimates of them. Economics Divis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Wellington.

Butcher, G.; Fairweather, J. and Simmons, D. G. 199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on Kaikoura. Tourism Recre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TRREC) Report No. 8/1998. Lincoln University.

Butcher, G.; Fairweather, J. and Simmons, D. G. 2000.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on Rotorua. Tourism Recre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TRREC) Report No. 17/2000. Lincoln University.

Butcher, G.; Fairweather, J. and Simmons, D. G. 2001.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on Westland District. Tourism Recre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TRREC) Report No. 26/2001. Lincoln University.

Butcher, G.; MacDonald, G.; Fairweather, J. and Simmons, D. G. 2003.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on Christchurch City and Akaroa Township.

Tourism Recre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TRREC) Report No. 37/2003. Lincoln University.

Casley, D. J. and Kumar, K. 1987. Projec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n Agricultur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Catton, W. R. Jr. 1980. Overshoot. The Ecological Basi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Catton, W. R. Jr. 1983. Social and behavioural aspects of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In: I. Altman, I. and J. Wohlwill (Eds.), Behaviour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Vol. 6 of The Human Behaviour and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lenum Press, New York.

Catton, W. R. Jr. and Dunlap, R. E. 1978. Environment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2. 41-49.

Checkland, P. 1981. Systems Thinking, Systems Practice. John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Conland, J. (Ed.) 1985.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New Zealand-a practical approach.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Directorate, Ministry of Works and Development, Wellington.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1978. Regul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procedural provisions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 C.

Coup, Owen, et al. 1990. We are doing well, aren't we: a guide to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community project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Wellington.

Cowell, Stuart; Lane, Marcus; Burke, Bronwen and Crisp, Rosie 2001. Social assess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boriginal verses bureaucratic agency. In A.

Dale, N. Taylor and M. Lane (Eds.), Social Assessment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CSIRO Publishing, Collingwood.

Cronin, K. 1987.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social policy. People and Planning, 41: 8-10.

Dale, Allan; Taylor, Nick and Lane, Marcus (Eds.) 2001. Social Assessment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CSIRO Publishing, Collingwood.

de Vaus, D. A. 2002. Surveys in Social Research, Fifth Edition. Allen and Unwin, Sydney.

Devlin, M. 1984. The status of small business research in New Zealand.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Wellington.

Dietz, T. 1987. Theory and method i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57: 54-69.

Dillman, Don A. 2000. Mail and Internet Surveys. the Tailored Design Method. Wiley, New York.

Drury, R. G. 1983. The Waihi liaison forum. People and Planning, 27: 8-9.

Duffecy, Jennifer and Pollard, Lisa 2001. The Western Australian Social Impact Unit 1989-1993: nicety or necessity? In Dale, A.; Taylor, N. and Lane, M. (Eds.), Social Assessment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CSIRO Publishing, Collingwood.

Duncan, O. D. 1961. From social system to ecosystem. Sociological Inquiry, 31: 140-149.

Eckstein, O. 1958.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s of Project Evalu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Eggenberger, M. and Partidário, M. d R. 2000.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to assist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spatial planning.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18,3:201-207.

Ekstrom, B. L. and Leistritz, F. L. 1988. Rural Community Decline and Revitalis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Garland Publishing,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AO Investment Centre 1992.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project design. Technical Paper 9,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Fitzgerald, Gerard 2003. Computer-based qualitative data methods. Chapter 10 in Henk Becker and Frank Vancla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Fookes, T. W., Drury, R. G. and Mead, J. M. 1980. Intentions and practice of a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monitoring project: a review of the philosophy, methodology and variables used in monitoring the Huntly Power Project. Internal Technical Paper No. 20. University of Waikato, Hamilton.

Fookes, T. W.; Drury, R. G.; Porter, D. J. and Tester, F. J. 1981.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monitoring. Huntly Monitoring Project. Final report series No. 13. University of Waikato, Hamilton.

Ford, S.; Butcher, G.; Edmonds, K. and Braggins, A. 2001. Economic efficiency of water allocation. MAF Technical Paper 2001/7, MAF Policy, Wellington.

Forester, J. 1980. Critical theory and planning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6: 275-286.

Francis, P. and Jacobs, S. 1999. 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 analysis at the World Bank.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19(3): 341-357.

Franklin, Brad 1991. Community relations in support of remedial programs at historic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sites in Cana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IAIA, Urbana-

Champaign, Illinois.

Freudenburg, W. R. 1986.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451-478.

Freudenburg, W. R. and Keating, K. M. 1982. Increasing the impact of sociology o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toward ending the inatten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7:71-80.

Freudenburg, William R. and Keating, Kenneth M. 1985. Applying sociology to policy: social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Rural Sociology, 50, 4: 578-605.

Gittinger, J. P. 1972. Economic analysis ofagriculturalproject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Glasson, J. 1999 . The first 10 years of the UK EIA system: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14,3: 363-375.

Gold, U. and Houghton, R. M. 1985. Bruce County forestry employees' household spending patterns.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Otago, Dunedin.

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1989. Planning Act Amendment Act, 1989: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mendments major projects. White Paper, Adelaide.

Graetz, B. 1985. The potential of mail survey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21(3): 445-455.

Hall, R. ; Thorns, D. and Willmott, W. E. 1983.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change -a study of rural and urban localities in New Zealand. Working Paper No. 4.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Hall, R. 1987. Te Kohurau: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 New Zealand rural district: methodology.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Hawley, A. H. 1950. Human Ecology.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Ronald Press Co. , New York.

Hewings, G. J. D. 1985. Reg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

Hill, A. A. 1981. Statement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United States Senate. Council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Washington. Hill, R. 1984. Establishing valid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 empirical illustration. New Zealand Science Review, 41(4): 59-62.

Hindmarsh, R. A.; Hundloe, T. J.; McDonald, G. T. and Rickson, R. E. (Eds.) 1988. Papers on Assess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Applie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Houghton, R. M.; Caskey, M.; Gold, U. and Wilson, A. 1986a. The local impacts of the Clyde Power Project, Upper Clutha Development 1981-1985.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Otago, Dunedin.

Houghton, R. M.; Caskey, M. and Wilson, A. 1986b. Otautau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survey. A report to the Southland and Wallace County Councils.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re, University of Otago, Dunedin.

Howard, A. 1976. The great participation fallacy. The Planner, 62(6): 163-164.

Humphrey, C. R. and Buttel, F. H. 1982. Environment, Energy and Society. Wadsworth, Belmont.

Humphrey, Craig R.; Lewis, Tammy L. and Buttel, Frederick H. 2002. Environment, Energy and Society: a New Synthesis. Wadsworth, Belmont.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1994.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OAA Technical Memorandum NMFS-F/SPO-16.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2003.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USA.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1 (3): 231-250.

Jackson, M. C. 1982. The nature of "soft" systems thinking: the work of Churchman, Ackoffand Checkland.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 Analysis, 9:17-29.

Jackson, M. C. and Keys, P. 1984. Towards a system of systems methodologie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Society, 35 (6):473-486.

Johnson and Field, D. 1981. Applied and basic social research: a difference in social context. Leisure Sciences, 4 (3): 269-279.

Kilmartin, L., Thorns, D. and Burke, T. 1985. Social Theory and the Australian City. George Allen and Unwin, Sydney.

Krawetz, N. M. 1981. Intentions and practice reviewed with reference to monitoring prototypes. Huntly Monitoring Project. Final Report Series No. 10. University of Waikato, Hamilton.

Krawetz, Natalia; MacDonald, William R. and Nichols, Peter 1987. A framework for effective monitoring. CEARC (Canadian Environment Assessment Research Council), Quebec.

Kumar, S. 2003. Methods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complete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Intermediate Technologies, London.

Leistritz, F. Larry; Coon, Randel C. and Harem, Rita R. 1994-1995. A microcomputer model for assessing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Impact Assessment Bulletin, 12(4): 373-384.

Leu, W. S.; Williams, W. P. and Bark, A. W. 1997.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ree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roject Appraisal, 12(2): 89-100.

Lockie, Stewart 2001. SIA in review: setting the agenda for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Impact Assessment and Porject Appraisal, 19(4): 277-288.

Lucas, R. A. 1971. Minetown, Milltown, Railtown. Life in Canadian Communities of Singl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Marsh, K. 1982. The Survey Method.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McKean, R. N. 1958. Efficiency in Government Through Systems Analysis. Wiley, New York.

McPherson, J. 1985.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New Zealand.

Impact Assessment Bulletin, 4: 1-2. pp. 261-270.

May, Tim 2001. Social Research. Issues, Methods and Process.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Miller, R. E. and Blair, P. D. 1985. Input-Output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Extension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New Zeal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 Working Group, 1988.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social policy in New Zealand. Royal Commission on Social Policy, Wellington.

Oppenheim, A. N. 1970.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Attitude Measurement. Heinemann, London.

Park, R. E. 1936.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L11(1): 1-15.

Renouf, J. and Taylor C. N. 1984.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R/NZSA Social Policy Conference, Wellington, 31 October -2 November 1984.

Richardson, H. W. 1972. Input-output and Regional Economics. Wiley, New York.

Rickson, R. E.; Western, J. S. and Burdge, R. J. 1994.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in R. J. Burdge,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ocial Ecology Press, Middleton, Wisconsin.

Roberts, Richard 2003. Involving the public. Chapter 16 in Henk Becker and Frank Vancla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Rothman, J. 1974. Planning and Organising for Change. Action Principles fro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Samya, M.; Snow, H. and Bryan, H. 2003. Integrating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with research: the case of methyl mercury in fish in the Mobile-Alabama River Basin.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1 (2): 133-140.

Sarkissian, Wendy 1997.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practical guid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

Schnaiberg, A. 1975. Social synthesis of the societal-environmental dialectic: the role of distributional impac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6(1): 5-20.

Schnaiberg, A. 1980. 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Shell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B. V. 1996.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HSE Manual EP 95- 0371, The Hague.

Slootweg, R.; Vanclay, F. and Schooten, M. v 2001. Function evaluation as a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19(1): 19-28.

Statistics New Zealand 1995. A guide to good survey design. Statistics New Zealand, Wellington.

Statistics New Zealand 2003. Regional input-output study. Statistics New Zealand, Wellington.

Sudman, S. and Bradburn, N. M. 1982. Asking Ques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Questionnaire Design. Jersey Bass, San Francisco.

Taranaki United Council, 1986. Taranaki hill country: a study of attitudes, service provision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Taranaki United Council, New Plymouth.

Taylor, N. and Dale A. 2001. Conclusions. In A. Dale; N. Taylor and M. Lane (Eds.), Social Assessment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CSIRO Publishing, Collingwood.

Taylor, C. N. and Fitzgerald, G. 1988. New Zealand resource communities: impact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rapid economic change. Impact Assessment Bulletin, 6 (2): 55-70.

Taylor, C. N. and McClintock, W. L. 1984. Major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a regional context: a framework for a New Zealand analysi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20(3): 377-392.

Taylor, C. N. and Sharp, B. 1983. Social impacts of major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jects: concerns for research and

planning. Discussion Paper. Centre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and Lincoln College.

Taylor Nick; Fitzgerald, Gerard and McClintock, Wayne 2001. Resource communities in New Zealand: perspectives on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change. Chapter 9 in Geoffrey Lawrence, Vaughan Higgins and Stewart Lockie (Eds.),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Australasia and the America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Taylor, Nick; McClintock, Wayne and Buckenham, Brigid 2003. Social impacts of out-of-centre shopping centres on town centres: a New Zealand case study.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1 (2): 147-154.

Taylor Baines and Associates 2002. Cooperation and Commitment: The Chatham Islands Economic Review, 2002. Christchurch.

Taylor Baines and Lincoln International 1989. Review of the Chatham Islands economy. Report to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Taylor, Baines and Lincoln International, Christchurch.

Tester, F. J. and Mykes, W. 1981.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Detselig, Calgary.

Tester, F. J. 1985. The social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New Zealand case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Conference, Calgary.

Vanclay, Frank 2003.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1(1): 5-12.

Vanclay, Frank. 2002.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M. Tolba, (Ed.), 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4 of Encyclopaedia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387-393.

Vanclay, Frank and Bronstein, D. A. (Eds.) 1995.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Verberg, K. 1975.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creational lands: a

review. Occasional Paper No. I. Parks Canada Planning Div., Prairie Regional Office.

Verloo, Mieke and Roggeband, Connie 1996.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instrument in the Netherlands. Impact Assessment, 14:13-20.

Warren, Julie A.; Taylor, C. N.; Davidson, Carl and Goodrich, C. G. 1992. Social assessment and systems theo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Weber, B. A. and Howell, R. E. (Eds.) 1982. Coping with Rapid Growth in Rural Communitie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Weisberg, H. F. and Bowan, B. D. 1977. An Introduction to Survey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W. H. Freeman and Co., San Francisco.

Wildman, P. H. 1985. Social impact analysis in Australia: policy issues for the 1980s.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 (2): 136-151.

Wildman, P. and Barker, G. 1985. The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handbook. how to assess and evaluate the social impacts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on local communities. Social Impacts Publications, Armidale, New South Wales.

Wilkinson, K. P. 1985. Implementing a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Sociologist, 4(5): 348-353.

Wilkinson, Kenneth P. 1986. In search of community in the changing countryside. Rural Sociology, 51(1): 1-17.

Wolf, C. P. 1983.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 methodological overview. In K. Finsterbusch, L. G. Llewellyn and C. P. Wolf, (Eds.),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Sage, Beverly Hills.

World Bank, Environment Department, 1991.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ourcebook, Three Volumes.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umbers, 139-141, Washington, D. C.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Brundtland Commission)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专有名称汉英对照表

阿卡罗阿	Akaroa
阿拉巴马大学	University of Alabama
阿诺德·托因比	Arnold Toynbee
埃里克·泰勒	Eric Taylor
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奥塔哥	Otago
澳大利亚环境研究所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澳大利亚统计局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巴斯钓鱼运动员协会	Bass Anglers Sportsmen's Society
伯格斯特罗姆	Borgstrom
伯吉斯	Burgess
博尔杰	Burdge
布莱恩	Bryan
C. 霍布森·布莱恩	C. Hobson Bryan
C. 尼古拉斯·泰勒	C. Nicholas Taylor
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查理沃尔夫	Charlie Wolf
查塔姆群岛	Chatham Islands
达尔文	Darwin
迪·巴肯	Di Buchan
菲律宾	Philippines
弗兰克·范克里	Frank Vanclay
弗罗伊登伯格	Freudenburg
富布莱特基金会	the Fulbright
过度行动	Overshoot
格雷默斯城	Greymouth
汞论坛	Mercury Forum
国际影响评估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

哈贝马斯	Habermas
哈铺	hapu
汉弗莱	Humphrey
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亨特利	Huntly
怀唐伊条约	Treaty of Waitangi
怀希	Waihi
环境保护局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环境委员会	Commission for the Environment
环境影响报告	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s
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基督堂市	City of Christchurch
基尔马丁	Kilmartin
计划特别法庭	the Planning Tribunal
健康影响评估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 HIA
杰夫·克尔	Geoff Kerr
杰拉德·菲茨杰拉德	Gerard Fitzgerald
杰米·纽厄尔	Jamie Newell
卡顿	Catton
凯库拉	Kaikoura
坎特伯雷大学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康德	Comte
科林·古德里奇	Colin G. Goodrich
科罗曼德	Coromandel
克拉威兹	Krawetz
克卢沙	Clutha
克鲁萨河	the Clutha River
库克群岛	Cook Islands
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Oueensland
昆士兰州政府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拉巴马-莫比尔	Mobile-Alabama
拉贝尔·博尔杰	Rabel Burdge
李比希	Liebig

粮农组织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鲁南加/唐诺利	Runanga/Dunollie
鲁思·霍顿	Ruth Houghton
罗托鲁阿	Rotorua
马更些	Mackenzie
马克思	Marx
马拉西亚	Malaysia
马莎希尔	Martha Hill
玛丽·简·瑞福斯	Mary Jane Rivers
玛纳普利湖	Lake Manapouri
毛利人	Maori
毛伊岛	the Maui field
美国环境保护署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	Th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CEQ
美国林务局	the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美国人口普查局	the US Census Bureau
南·菲尔德	Nan Field
南非洲开发银行	the Development Bank of Southern Africa
尼克·泰勒	Taylor, Nick
帕特亚	Patea
茜拉·泰勒	Cilla Taylor
切克兰德	Checkland
社会影响评估:新西兰的实践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in New Zealand: a practical approach
社会影响评估指南和准则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社会影响评估指南和准则委员会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社会影响评估准则和指南国际委员会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社会政策理事会	the Social Policy Directorate
圣塔芭芭拉	Santa Barbara
施耐伯格	Schnaiberg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世界银行环境部	The World Bank Environment Department
斯宾塞	Spencer
塔拉纳基	Taranaki
塔拉纳基联合理事会	the Taranaki United Council
塔拉纳基能源监测报告	Taranaki Energy Monitor
泰勒	Taylor
泰斯特	Tester
汤加	Tonga
汤姆·佛克斯	Tom Fookes
特蕾西·威廉姆斯	Tracy Williams
特威泽尔	Twizel
涂尔干	Durkheim
瓦瑙	whanau
韦伯	Weber
韦斯特兰	Westland
沃尔夫	Wolf
沃思	Wirth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社会影响机构	the Social Impact Unit of the Western Australia Government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夏洛克·福尔摩斯	Sherlock Holmes
新南威尔士州	New South Wales
新西兰社会评估协会	the NZ Association for Social Assessment
新西兰社会影响评估工作小组	the New Zeal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Working Group
新西兰统计机构	Statistics New Zealand ,www. stats. govt. nz
新西兰影响评估协会	the New Zealand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新西兰资源管理法案	the New Zea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新西兰的社会影响评估:实践方法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New Zealand-a Practical Approach
亚拉巴马-莫比尔	Mobile-Alabama
亚洲开发银行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伊迪丝寇文大学	Edith Cowan University
依未	iwi
影响评估国际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影响评估和工程评价杂志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詹姆斯·贝恩斯	James Baines
朱莉·沃伦	Julie Warren
资源管理法案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资源规划和资源管理法案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总统环境质量顾问委员会	the President' s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万卷方法总书目

万卷方法是我国第一套系统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型丛书，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两百余名学者参与了丛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至今已出版图书近60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是2007年以来出版的新书。

2009年版

1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吴明隆 著　定价:59.8
书号:978-7-5624-4947-8

2 **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SPSS中文视窗版数据分析范例解析**
邱皓政 著　定价:49.5
书号:978-7-5624-4821-1

3 **如何解读统计图表:研究报告阅读指南**
纳迪 著　汪顺玉 等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906-5

4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个案阅读)**
列堡 著　李文茂 等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937-9

5 **客厅即工厂(个案阅读)**
熊秉纯 著　杜芳琴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886-0

6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个案阅读)**
沃尔科特 著　杨海燕 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880-8

7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艾尔维森 等著　陈仁仁 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889-1

8 **解释互动论(校订新译本)**
邓金 著　周勇 译　刘良华 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936-2

9 **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
泰勒 等著　葛道顺 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4975-1

10 **调查研究方法(校订新译本)**
福勒 著　孙振东 等译　沈崇麟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89-0

11 **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南**
赛德曼 著　周海涛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679-8

12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校订新译本)**
殷著　周海涛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78-4

13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孙振东 著　定价:38
书号:978-7-5624-4649-1

14 **参与观察法**
乔金森 著　张小山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616-3

15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
洛夫兰德 等著　林小英 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690-3

16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卡麦兹 著　边国英 译　陈向明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747-4

17 **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第2版)**
袁政 编著　定价:30
书号:978-7-5624-3640-9

18 **AMOS与研究方法**
荣泰生 著　定价:35
书号:978-7-5624-4806-8

19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格雷 著　许梦云 译　高丙中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698-0

20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普拉尼 等著　郑显兰 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720-7

21 **如何做质性研究**
希尔弗曼 著　卢晖临 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697-2

2008年版

22 **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第8版)**
赫文 著　李涤非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465-7

23 **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Version 9)**
汉密尔顿 著　郭志刚 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483-1

24 **实用抽样方法**
亨利 著　沈崇麟 译　定价:22
书号:978-7-5624-4487-9

25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 著　定价:40
书号:978-7-5624-4446-6

26 **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
陈向明 主编　定价:30

书号:978-7-5624-4462-6

27 **社会研究方法**
仇立平 著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456-5

28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第2版)**
米尔斯,休伯曼 著　卢晖临 译　定价:78
书号:978-7-5624-4426-8

29 **实用数据再分析法(第2版)**
利普西 著　刘军 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296-7

30 **质性研究的伦理**
丁三东 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304-9

31 **叙事研究:阅读、倾听与理解**
利布里奇 著　王红艳 译;定价:27
书号:978-7-5624-4303-2

32 **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第2版)**
麦瑞尔姆 著　于泽元 译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349-0

33 **爱上统计学(第2版)**
萨尔金德 著　史玲玲 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196-0

34 **复杂调查设计与分析的实用方法(第2版)**
雷同能 著　王天夫 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290-5

35 **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APA格式)(第5版)**
美国心理协会 著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130-4

2007年版

36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
欧兰德森 著　李涤非 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259-2

37 **多层次模型分析导论(第2版)**
Ita kreft 著　郭志刚 译　定价:35
书号:978-7-5624-4060-4

38 **评估:方法与技术(第7版)**
罗希 著　邱泽奇 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3994-3

39 **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第3版)**
克鲁杰 著　林小英 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990-5

40 **质的研究的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第2版)**
马克斯威尔 著　朱光明 译,陈向明 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71-4

41 **组织诊断:方法、模型和过程(第3版)**
哈里森 著　张小山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055-1

42 **民族志:步步深入(第2版)**
费特曼 著　龚建华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96-7

43 **分组比较的统计分析(第2版)**
廖福挺 著　高勇 译　沈崇麟 校
定价:35
书号:978-7-5624-3942-4

44 **抽样调查设计导论(第2版)**
扎加,布莱尔 著　沈崇麟 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3943-1

45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3851-9

46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定价:48
书号:978-7-5624-3286-9

47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定价:38
书号:978-7-5624-3948-6

48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3944-8

49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第2版)**
克雷斯威尔 著　崔延强 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644-7

50 **社会网络分析法(第2版)**
约翰·斯科特 著　刘军 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2147-4

51 **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
李钢 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50-2

2007年以前版

52 **论教育科学:基于文化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申仁洪 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41-6

53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
黄欣荣 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25-0

5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
陈向明 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89-4

55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筛选与监控(第2版)**
拉弗拉卡斯 著　沈崇麟 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441-7

56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沃恩 著　沈崇麟 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669-X

57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第6版)**
米勒 著　风笑天 译　定价:68
书号:978-7-5624-3295-1

58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第2版)**
德维利斯 著　李红 等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280-5

59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3版)**
殷 著　周海涛 译　定价:15
书号:978-7-5624-3266-1